

جوئگونئىچ چىكارا سىياسىتى

# 中國邊政

Չին-Տibet-მას რ-შ

China Border area Study



中原邊政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六月

210

## 京族簡介

京族，以前稱為越族，1958 年春正式改稱為京族，是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從事漁業，人口較少的邊疆少數民族，1982 年時僅有一萬一千九百多人，但到 2010 年中國大陸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京族人口為二萬八千二百人，增加 30%，就比率而言，相當可觀。

京族主要聚居於廣西壯族自治區防城各族自治縣的汎尾、巫頭、山心三個小島，這三個小島素有「京族三島」之稱。少數與漢族、壯族雜居在防城各族自治縣的潭吉（此係據范玉梅、吳碧雲、開斗山、游智仁、鄺東編著之《中國少數民族風情錄》，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 年，頁 678 所載，但經查中國地圖出版社 2011 年出版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手冊》廣西壯族自治區防城港市已無各族自治縣，當係已裁撤），此外，紅坎，恒望、寨頭、米漏、瓦村、三德等村落也有少許京族散居其間。

京族有其民族語言，但系屬尚未確定，絕大部分京族人都通曉漢語、漢文。京族在宗教信仰上主要是道教，並混有佛教與巫術色彩，都尊從祖先崇拜，有少數京族人信奉天主教。

在傳統上京族家庭是父系家長制小家庭，平均每戶少有超過五個人，父親是家長，掌握全家經濟，財產繼承由男子平均分配，女子沒有財產繼承權。京族婚姻為一夫一妻制，以往多由父母一手包辦，近代以來則為自由戀愛。

京族男子一般穿窄袖袒胸過膝的長衫，寬而長的褲子，腰際束帶。京族婦女習慣盤頭，穿窄袖緊身對襟無領短上衣，胸圍菱形遮胸布，下穿長而寬的黑色或褐色褲子，外出時，加穿窄袖白色長外衣，頭戴斗笠，佩戴耳環（不戴項鍊）等銀質首飾；少數長婦女還保留著染黑牙齒和結「砧顏髻」的習慣，不過時至今日，保留有這種習慣的，幾乎已經沒有了。

京族人通婚範圍以本民族內部為主，但也有不少與鄰近的漢族通婚，但同姓及五服內不能通婚，嚴禁姑表婚，如有違犯，必受懲罰。過去曾有童養媳情況，近代以來，已無此情況；夫妻如感情不睦，可以離婚，離婚手續比較簡單，雙方同離婚後，由男方出具離婚書予女方，此後男婚女嫁互不干預。

在飲食方面，京族以大米、甘薯、芋頭為主食，肉食以魚、蝦為主，尚有帶著濃厚民族色彩的漁汁、風吹米壹等食物。以往京族婦女有吃檳榔的習慣，男子則吸煙。

京族的喪葬儀式相當繁縟，沿用傳統的迷信儀式，耗費相當大，近代以來已有改善。

# 目 錄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聯結-與東埔寨經貿發展為例.....	楊克誠	1
清代臺灣文獻中的水沙連茶考—兼談同治年間 臺灣烏龍茶直銷海外 .....	郝時遠	17
中共入藏前後西藏情勢兼駁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之謬論 ...	孟 鴻	33
貢桑諾爾布、河源操子與崇正學堂 .....	劉學銚	61
《高僧傳・神異》中的西域高僧 .....	金兆鴻	85
從清初滿文創制談起 .....	張華克	105
2017年「絲綢之路今昔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記述 .....	林遙鵬	133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二十五） .....	華 華	153
稿 約 .....		158

本協會秘書長劉學銚教授新作《泛蒙古運動與內蒙古獨立》一書對一百年前（1919年）的「泛蒙古運動」雖只如曇花一現，很快就凋謝，但陰魂不散，近年以來在西方帝國主義蠱惑之下，頗有死灰復燃之勢，而大陸內蒙古自治一些野心份子竟喊出內蒙古獨立。本書對百年來泛蒙古運動與內蒙古獨立作較詳細之析敘。

如何購買？

## 【網路書店】

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

金石堂網路書店 <http://www.kingstone.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http://www.sanmin.com.tw/>

## 【實體書店】

唐山書局

10647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333 巷 9 號地下室

(1) 劃撥匯款

劃撥帳號：05878385／戶名：唐山出版社

(2) 親自來唐山書店逛逛

地址：10647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333 巷 9 號地下室

(3) 來信／來書訂書

Email : [tonsan@ms37.hinet.net](mailto:tonsan@ms37.hinet.net)

電話：02-2363-3072 (請留下您的姓名、聯絡方式和要買的書名/作者/出版社/數量)



#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聯結-與柬埔寨經貿發展為例

楊克誠  
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

## 壹、前言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大陸出發，一路從中國沿海港口通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一從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這其中穿越了東協十國經濟體的區域中，尤以中南半島越、泰、柬、緬、寮五國影響最為深遠。海上絲綢之路並非新之構想，而是建築在自古以來之現有基礎上加深且擴大，藉助科技新知進步，航海已不是危險因素不可預見之運輸方式，不但成本降低且大幅提昇貨運量。

柬埔寨作為世界上低度開發國家之一，享有歐盟免關稅及其他國家低關稅的優惠，吸引許多的外資大幅加碼的投入，近十年來經濟成長快速，GDP成長率表現亮眼，縱然09年的金融海嘯仍保持正成長，2015年的人均更已達1,168美元，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上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 貳、一帶一路概略<sup>1</sup>

一帶一路的推動必將使國際經濟版圖與策略聯盟重新劃分，但其中的困難與阻礙也非常多，不過我們以現今的情勢來看這是正確的策略。絲綢

<sup>1</sup> 一帶一路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One Belt and One Road” refers to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它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將充分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藉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無論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應對危機、加快調整，許多沿線國家同我國有著共同利益。歷史上，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我國同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歐洲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帶一路”是對古絲綢之路的傳承和提升，獲得了廣泛認同。

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是由習近平主席於 2013 年出訪時提出的經濟合作概念。總理李克強在亞洲和歐洲訪問時進一步推廣，成為中國當前對外的主要經濟戰略。“一帶一路”戰略範圍跨越 65 個核心國家，涵蓋面積約 5539km<sup>2</sup>，約占全球總面積的 41.3%；跨區內約 46.7 億人口，約占全球總人口的 66.9%；區域經濟總量高達 27.4 萬億美元，占據全球經濟總量的 38.2%。“一帶一路”所跨足的 65 國中以發展中國家居多，基礎設施建設水準普遍較差，提昇空間大。很多國家缺水、缺電、缺道路，國與國之間往來不易，發展差距頗大。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成立宗旨在促進亞洲區域內的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體現，以資金支持亞洲各國家和地區政府基礎設施建設之開發機構，並且加強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及地區的合作。總部設在中國北京，法定資本為 1,000 億美元，中國政府獨自出資 500 億美元。

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有三個走向，從中國大陸出發：

- 一、經中亞、俄羅斯到達歐洲；
- 二、經中亞、西亞到達波斯灣和地中海；
- 三、中國大陸到東南亞、南亞、印度洋；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二個走向，從中國大陸出發：

- 一、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
- 二、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無論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應對危機、加快調整，許多沿線國家同中國有著共同利益。歷史上，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中國同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歐洲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一帶一路”是對古絲綢之路的傳承和提升，獲得了廣泛認同。

## 參、柬埔寨概況<sup>2</sup>

### 一、柬埔寨簡介

柬埔寨位於中南半島西南部，佔地 181,035 平方公里，柬埔寨領土不大，全國區分為 24 省（其中 4 省鄰海），另有 3 個自治市、172 個區、1547 個地方。國家海岸線長 435 公里，並有部分尚未開發的紅樹林。柬埔寨現行的政治制度主要是由 1993 年 9 月 21 日發佈的憲法確立，為一君主立憲，民主開放的內閣多黨制制度，國王為施亞努，國王不在國內時，參議院議長任國家代元首，國王及參議院議長均不在國內時，由眾議院議長任國家代元首。

1953 年 11 月 9 日柬埔寨脫離法國獨立後，政治變遷大約可分為六個時期：

- （一）施亞努統治時期；
- （二）龍諾政府時期；
- （三）赤柬統治時期；
- （四）橫山林政府時期；
- （五）聯合國監督時期；
- （六）民主君主立憲時期；

柬埔寨的人種相當單純，高棉族人居多，柬埔寨人口近一千六百萬人，包括越南人及華人，其中，華人大都居住在城市，以從事工商業的經濟活動為主，屬於有財富的資產階級居多。在比率上柬埔寨華人雖然只有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卻支配了柬埔寨國家的政治和經濟，而目前由人民黨和奉辛比克黨組成的內閣，超過一半成員擁有華人血統。柬埔寨擁有特別的高棉文化，較接近泰國，並帶有濃厚的上座部佛教文化氛圍，可從高棉建築文化看到柬埔寨從古至今也受印度文化影響。

### 二、柬埔寨經濟發展

柬埔寨經濟在東南亞戰爭和「赤柬」（Khmer Rouge）統治期間受到

<sup>2</sup> 柬埔寨為中南半島之文明古國，有 2000 年以上之歷史。昔稱扶南，素與秦、漢通商交流。《後漢書》稱為究不事，《隋書》稱為真臘。《唐書》稱為吉蔑、閣蔑（均 Khmer 對音）。元朝稱為甘勃智，《明史》稱甘武者，明朝萬曆後，音譯柬埔寨。「究不事」、「甘勃智」，「甘武者」、「柬埔寨」實為 Kambuja 對音。

徹底摧毀。在赤棉統治和 1979 年越南入侵期間，食物極度缺乏。後來，百姓所倚賴的農業逐漸穩定復原，稻米為主要產品，另有玉蜀黍、甘蔗、樹薯粉和香蕉。1986 年採開放經濟政策，1994 年 8 月通過「柬埔寨王國投資法」，提供外人優惠投資條件。柬埔寨近 10 年經濟成長率均有 6 或 7% 之水準。近年來，柬埔寨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根據世界銀行對柬埔寨經濟增長的預測，柬埔寨被認為是經濟增長速度令人羨艷的國家。亞洲發展銀行指出，柬埔寨已從一個遭受內亂的貧困國家發展成為亞洲經濟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據預測，今後幾年柬埔寨將繼續保持每年 7% 的經濟增長率。柬埔寨洪森總理在慰問干拉省官員時表示，在世界經濟整體增速趨於下降的情況下，柬埔寨將努力保持經濟增長的良好勢頭，打造經濟發展新動力。他還期待，在「一帶一路」框架下，與中國投資者一起攜手尋求機遇，利用絲路基金，進一步發展經濟貿易，通過沿海口岸實現中柬兩國的互聯互通。

2016 年中南半島五國重要經濟指標

項目 國家	人口總數 (萬人)	GDP (億美元)	人均 GDP (美元)	GDP 成長率	通貨 膨脹率	失業率 *	貿易總 額	全球競爭 力排名
泰國	6,884	3,953	5,742	2.8%	-0.9%	0.9%	41,291	32
越南	9,168	1,915	2,088	6.7%	0.6%	2.3%	35,532	56
柬埔寨	1,554	182	1,168	6.9%	1.2%	0.4%	3,464	90
緬甸	5,185	670	1,292	7.0%	11.5%	3.3%	2,661	131
寮國	703	125	1,799	7.0%	5.3%	1.4%	667	83

資料來源：2016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柬埔寨與寮國商機探索，頁 13

柬埔寨近十年 GDP 成長統計

年份	GDP 總值 (億美元)	GDP 成長率	人均 GDP(美元)	人均 GDP 成長率
2006	72.2	10.8%	536.15	13.91%
2007	86.3	10.2%	627.78	17.09%

年份	GDP 總值 (億美元)	GDP 成長率	人均 GDP(美元)	人均 GDP 成長率
2008	103.4	6.7%	741.86	18.17%
2009	103.9	0.15	734.66	-0.97%
2010	112.3	6.0%	781.91	6.43%
2011	128.2	7.1%	877.64	12.24%
2012	140.6	7.3%	945.70	7.76%
2013	152.4	7.4%	1,010.39	6.84%
2014	167.8	7.1%	1,095.62	8.44%
2015	181.6	6.9%	1,168.04	6.61%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2016

由於多年來受到戰爭等因素影響，柬埔寨的經濟發展相對比較緩慢，每年經濟增長達 6%。近年來，隨著柬埔寨大力推動旅遊業，已取得有效的成績，並隨著政局穩定，成功吸引中國、台灣、韓國、日本等國家前往投資進駐，成為東南亞的新興投資點之一。2012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 時 09 分，隨著柬埔寨首相洪森在電視講話中，敲響股市開市鐘，是柬埔寨股市歷史上，首個交易日。雖然開市僅有金邊水務局一支股票上市，其募股總數為 1304.6 萬股，佔總股本的 15%，融資總額約在 2000 萬美元左右，但已是柬埔寨經濟發展的新一個里程碑。

### 三、柬埔寨未來機會

柬埔寨作為世界上低度開發國家之一，享有歐盟免關稅及其他國家低關稅的優惠，吸引許多的外資大幅加碼的投入，近十年來經濟成長快速，GDP 成長率表現亮眼，縱然 09 年的金融海嘯仍保持正成長，2015 年的人均更已達 1,168 美元，在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上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中國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二個走向，一、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二、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依

此戰略構想，理應與越南共同合作，利用胡志明港之目前優勢，作為通往南海與歐洲之中繼港口。卻非常弔詭的是，中國政府直接越過胡志明港，選擇柬埔寨東南邊一個名為貢布的小漁村作為中國通往南海與歐洲之中繼港口，固然中國與越南有世仇的成份在，但如今地情勢發展只能說中國與柬埔寨的合作將更進一步擴大。柬埔寨目前擁有3個國際性港口：

一是位於暹羅灣的西哈努克港；二是位於湄公河的金邊港；三是貢布港。貢布港近年來雖已沒落，但其水深條件是最好的（見表）。

柬埔寨三大港口可通行船舶數據

單位：米

港口	吃水深	船限長	船限高
西哈努克	8-8.5	超過 200 以上	超過 37.6 以上
金邊港	4.5-5.5	100-200	37.6
貢布港	10-11	超過 200 以上	超過 37.6 以上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從全球版圖來看，柬埔寨地處中南半島腹地，是東南亞地區重要交通樞紐，自古就在「海上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經貿人文交往大通道中占據舉足輕重地位。實際上，近年來，中柬兩國已經成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合作夥伴。自「一帶一路」倡議初始，東方即對倡議表示贊同和認可，並在後續推進過程中給予堅定支持。「一帶一路」倡議正與柬埔寨國家發展『四角戰略』進行有機對接。雙方在經貿投資、互聯互通、能源資源等重點領域務實合作不斷拓展。同時，西港經濟特區、國公綜合開發試驗區、機場、港口、水電站、輸變電網、高速公路等一批帶動性強且具有示範效應的重大合作項目正在推動實施。其中不少『早期收穫』項目已經啟動上馬，並將很快開花結果。」<sup>3</sup>

現在是投資柬埔寨最佳時機，國人的心目中可能都還只停留在歷史課本中所講到的紅色高棉，但現在的柬埔寨早已擺脫戰亂的陰影，並且正在全力發展經濟。有人說柬埔寨是繼越南之後在亞洲最被看好的國家，柬埔

<sup>3</sup>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24a66K.html>

寨基本上是一個小國家，天然資源是相當有限的，以發展農業為例，農業所需的農田我們預估可能在三年之內就會被分配完畢，又例如礦業的開採執照也可能在這一兩年就發放完畢，因此如果要來柬埔寨投資就要趁現在。這就好像開一家餐廳，準備的食材就那麼多，你如果晚一點來可能就點不到你要的菜。柬埔寨對於所有國外的投資其實都採取一律平等的政策。1994年所制定的投資法中就提到對於投資東南亞是不分本地人或是外國人的，唯一的限制只在於外國人不能持有柬埔寨的土地，只能長期租用，不過租金的部分還是跟本地人相同，除此之外，包括銀行、電信公司等我們都是百分之百對國外投資者開放的。

基礎建設目前是柬埔寨最歡迎的投資專案，東南亞政府鼓勵企業來設立經濟特區<sup>4</sup>，特區法也在洪森總理的催生下順利於通過，目前柬埔寨的投資狀況。

#### 柬埔寨經濟特區優惠項目

適用對象	優惠類型	內容
經濟特區開發商	獲利免稅	9年
	免進口稅及其他稅	進口用於建造經濟特區之設備與建築材料得免稅。
	免關稅	進口用於建造連接城市與經濟特區道路之機械設備等得免稅。
	暫准通關	進口用於建造基礎建設之運輸工具與機械得暫准通關。

<sup>4</sup> 經濟特區（英語：Special Economic Zone，簡稱 SEZ），是指一種地理學概念，主要由國家政府為了吸引外資或國際跨國企業入駐而設立法律比本國更為寬鬆或具有優惠條件經濟發展的區域，除有省級經濟決策權外，還可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採取更為開放的政策。特區之「特」，主要是指它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靈活的經濟措施和特殊的經濟管理體制。如減免關稅等經濟上的優惠待遇，提供理想的投資環境和組織完善的領導管理體制，以及增加外資投入和外匯收益，藉此促進該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濟特區的概念本身涵蓋範圍較為廣泛，更細微具體的區分為出口加工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s），自由區域（Free Zones），自由港（Free Ports），自由貿易園區（Free Trade Zones），都會企業區和工業區（Industrial Estates）等等。

適用對象	優惠類型	內容
	土地特許	在符合《土地法》情況下得獲土地特許，在邊境或獨立區域建造經濟特區，而且得租用土地給經濟特區之投資人。
	關稅獎勵	有權享有與免關稅相同之投資條例。
經濟特區投資人	免增值稅	0%

資料來源：柬埔寨發展委員會(Council for Development of Cambodia : CDC)

## 肆、台灣經濟政策

台灣早在 1993 年至 2003 年 11 年間三波推動南向政策，對於與東南亞國家實質關係之發展，有顯著的影響。由於東南亞資源豐富、人口眾多且具地緣鄰近性之條件，政府因而鼓勵臺商踴躍前往開拓市場。此外，在台灣政府大陸政策大幅度開放，兩岸經貿交流日益頻繁，且我國對外投資有明顯轉移大陸趨勢之情況下，為避免對大陸過於經濟依賴，而圖以南向政策減輕我對大陸之經濟依賴<sup>5</sup>。

立基於上述背景，台灣政府於 1993 年夏天由時任經濟部長的江丙坤先生宣布要將東南亞國家列為未來加強投資的地區，同年 11 月公布「南進政策說帖」。南向政策當初計畫是 1993 年起以三年為期，但在第一階段後於 1996 年底經過評估決定再延長三年，並擴大範圍；之後又為了因應東協整合趨勢，為了保持在東南亞的競爭力又再度延長了三年。

2002 年陳水扁政府上台後也對南向政策有重啟的努力，2002 年副總

<sup>5</sup> 鑑於新南向政策的啟動是我國重新定位國家在亞洲發展重要角色，尋求新階段經濟發展新方向與動能，創造未來價值的重要經貿戰略一環。蔡英文總統特於 105 年 8 月 16 日召集「對外經貿戰略會談」，並在會中通過「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明確揭示新南向政策理念、短中長程目標、行動準則及推動架構。未來將據以引領政府施政方向，凝聚民間各部門力量，同時也向國際社會尤其是東協及南亞國家等傳達我國願意推動各項合作、展開協商和對話的誠意與努力，為全面啟動新南向政策奠定堅實基礎。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全文如後：新南向政策是整體對外經貿戰略的重要一環，作為亞洲及亞太地區的重要成員，台灣必須因應全球情勢變化及區域整合趨勢，作出相應的調整。啟動新南向政策，是為我國新階段的經濟發展，尋求新的方向和新的動能，並重新定位台灣在亞洲發展的重要角色，創造未來價值；同時，亦藉此開啓我國和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廣泛的協商和對話，期能建立緊密的合作，共創區域的發展和繁榮。

統呂秀蓮以私人旅遊名義到印尼峇里島會晤商界人士。2006 年 5 月總統陳水扁在出訪友邦的回程，在印尼巴淡島停留過境並會晤當地剩下的 10 餘家台商。然而南向政策實質效果卻不如預期。目前東南亞國家中僅越南因為地理因素有較多台商設廠，但廠區中也雇用許多中國大陸幹部主管，很多台商是投資大陸後將越南視為副廠或減低人工成本的衛星工廠在經營<sup>6</sup>。

2008 年國民黨馬英九再度贏得總統選舉，馬英九政府雖然不以「南向政策」為名，但在做法上，其實與前面兩屆政府並無太大差異，經貿投資仍然掛頭牌。差異最大的或許在於該政策政治意涵的降低，因為在「活路外交」的政策指導下，臺海兩岸外交惡鬥的情況已然減少，其他的零星衝突亦少浮上檯面，因為雙方均無意因為外交議題而影響兩岸正常的交流<sup>7</sup>。

2016 年台灣政黨輪替後，執政的蔡英文政府重新提出新南向政策，對於經濟發展強調要展望東南亞市場，並且於總統府新設了「新南向辦公室」<sup>8</sup>在過去三位總統任內，均有東南亞投資的政策，但設立專屬辦公室則是首次，但只提撥了 42 億新台幣的推動費用，實杯水車薪令人懷疑蔡政府的決心。

隨著全球供應鏈重整，東協及南亞國家等新興市場國家迅速崛起，而同為亞太地區的重要成員，臺灣的經濟發展與區域內許多國家具有高度關聯性，尤以近年來東協國家已穩居我國第二大出口市場與第二大對外投資目的地，我國與東協國家間之雙邊關係更已延伸至科技、觀光、教育、勞工、文化等多重領域。面對區域經貿整合趨勢，以及整體對外經貿策略考量，行政院依據總統發布「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提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全方位發展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的關係，促進區域交流發展與合作，同時也打造臺灣經濟發展的新模式，並重新定位我國在亞

<sup>6</sup> 陳錫藩，2002，《扁政府外交的新招》，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評論」，國安(評)091-591 號

<sup>7</sup> 黃奎博 周容卉，2014，《我國「南向政策」之回顧與影響》，展望與探索「臺商轉進越南與東南亞的挑戰與前景」座談會，頁 61-69

<sup>8</sup> 徐遵慈，2016，《新南向政策的變局與機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電子報第 520 期，頁 3

洲發展的重要角色，創造未來價值。這樣的重新定位新南向政策也讓部分人士認為，過去八年國民黨主政下，長期倚靠大陸的經濟市場模式將會發生轉變。蔡英文政府對此表示，「東南亞是不可放棄的經濟新興市場，但並不會取代大陸市場」，強調南向政策的獨立性。而對於台灣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企業界與學者雖有期許但也有懷疑。

## 伍、台灣與柬埔寨的發展機會

2017年2月4日由柬埔寨中國協會 Cambodian-Chinese Association ) 4日舉辦「與柬華人華僑共享團結飯」晚宴，柬埔寨總理洪森應邀出席發表談話表示：柬埔寨歡迎台商來投資，但柬埔寨遵守「一中原則」，禁止升起台灣國旗。中央社報導，洪森表示，尊重中國主權意味要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因此台灣的旗子不應該在國慶日升起。已領導柬埔寨 30 年的洪森表示，這一向是他的政策，他以往也曾拒絕台灣在柬埔寨設立官方代表處，他在演說中重申此一立場<sup>9</sup>。這種現實面的經濟與政治脫鉤也不正是台灣目前所應該做的嗎？

### 2015 年台灣對柬埔寨貿易統計

單位：萬美元

國家	貿易總值		出口		進口		貿易差額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柬埔寨	744.46	0.92%	678.03	-1.8%	66.43	40.735	611.60	-4.93%

資料來源：<http://cus93.trade.gov.tw/fsci/>，中華民國國際貿易局進出口貿易統計。

### 近十年台灣對柬埔寨投資趨勢

單位：萬美元

年度	柬埔寨來台投資		台灣對柬投資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sup>9</sup> 2017年02月07日 中時電子報 張達智／綜合報導

年度	柬埔寨來台投資		台灣對柬投資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2006	0	0	1	1,919
2007	0	0	3	15,052
2008	0	0	2	10,561
2009	0	0	1	36
2010	0	0	0	0
2011	0	0	0	299
2012	0	0	2	2,510
2013	2	411	7	94,140
2014	2	17	2	91,152
2015	0	0	6	20,532
合計	4	428	24	236,201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向東國投資委員會取得之數據

## 一、台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 (一) 台商於 1989 年正式進入柬埔寨市場，但多為中小企業，主要投資項目有房地產及土地開發、農業開發、木材加工、紡織成衣、製鞋業、旅遊業及娛樂業。
- (二) 目前柬埔寨紡織成衣業經營主要銷售區為歐盟與美國，不受配額限制，由於是低度開發地區，因此享有歐盟零關稅或低關稅待遇。
- (三) 在金融業方面，1998 年第一商業銀行於金邊設立分行，俾協助台商取得融資及押匯等業務，在 2014 年起陸續有兆豐、國泰世華、上海商銀、台灣企銀等多家銀行進駐柬國，並均派有台籍幹部。
- (四) 依據柬埔寨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16 年，台灣係柬埔寨第七大外人投資國，總投資金額為美金 11.06 億美元（不包括第三地與轉投資）。
- (五) 1996 年 9 月 1 日柬埔寨台商協會正式成立，俾加強台商彼此間之連繫與協調，提供台商一般性之協助與諮詢服務，目前會員有廠商會員 114 家，個人會員 108 家，涵蓋有製衣、製鞋、旅遊、房地產、農產加工、醫療服務、木材加工等行業。

(六) 柬埔寨雖然具有許多投資的優勢，但也不諱言它也存在許多的問題，如，一、受限於內需市場小，重工業與基礎建設嚴重不足，過度的依賴觀光、農業與天然資源而導致不易轉型發展製造業，因此，目前僅有紡織成衣業等極少數製造業，而觀光業為其主要依賴經濟來源之一，產業結構的失衡，實為柬國持續發展之重要瓶頸；二、台灣與柬埔寨貿易金額甚小，近年來工資的大幅成長與工會運動，亦限縮了台商投資的意願！而柬對中華民國的政治現狀不承認，更使台商及國營事業無法大舉南進。

## 二、投資機會

- (一) 柬國係低度開發國家中第一個加入 WTO 的國家(於 2003 年 9 月加入)，在該國投資設廠者輸往其他 WTO 會員國之進口關稅適用優惠關稅，加上美、日等 29 國給予柬國 GSP 優惠關稅及免配額優惠，使在柬國投資設廠者，增加產品價格競爭力，以往多數台商係因為該等因素前往柬國投資。
- (二) 柬國近年來與越南簽訂邊境合作協議，興築邊境道路，除台商美德向邦集團在柬越邊境地區投資開發特別經濟區外，亦有數位投資者開發邊境土地。
- (三) 由於柬國除製鞋及製衣工業外，幾乎沒有其他工業，所有民生用品均仰賴進口，因此對於外資投資之產業項目幾乎完全沒有限制，爰我商任何產業均有機會前往柬國投資，其中又以勞力密集產業最佳，可運用柬國充沛之人力資源，將產品輸往東協國家和美、日等給予 LDC 待遇的國家，享有優惠關稅待遇，具有價格競爭優勢。

## 三、台商投資之曼哈頓經濟特區

由美德醫療集團主導進軍柬埔寨成立的曼哈頓經濟特區，成功創造亮麗產值，目前規劃進行第三輪募資，並籌建 10M 太陽能電廠，吸引國內金融業積極參與投資。



韓森總理為曼哈頓經濟特區揭牌典禮



曼哈頓經濟特區鳥瞰圖



主題公園京杭大運河



磅礎紡織園區



2027 曼哈頓經濟特區十萬人進駐示意圖



曼哈頓酒店大門/特區大門示意圖

## 陸、結論

21世紀海洋絲綢之路，雖為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所提之經濟戰略，但也應為我國對外經貿策略採用重要的參考。政府應秉持「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核心理念，將政治與經濟議題脫鉤，整合中央、地方政府、民間企業與團體以及友我第三國的資源與力量，藉由資源、人才、市場和技術面的互聯、互通，共享跟鏈結，與東協、南亞次大陸經濟絲綢之路涵蓋之國家協力，共創區域的發展與繁榮，也為臺灣打造經濟發展的新模式。長期以來普羅大眾對柬埔寨可能都還只停留在歷史課本中所講到的紅色高棉，不但戰亂且落後。但如今的柬埔寨卻早已擺脫過往烽火連天陰影，現在上至總理下至一般民眾皆全力發展經濟為唯一目標，藉以改善東國生活水準，是亞洲繼越南之後最被看好的國家。從全球版圖上看，柬埔寨地處中南半島腹地，鄰近泰國灣可穿越麻六甲海峽，是重要的交通樞紐，自古在海路絲綢之路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東國總理洪森更是大陸所提一帶一路發展的重要支持者。

本人所經營的美德向邦集團，早在 18 年前已經看出台灣的經濟策略，必須向南亞等地發展，也就是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向西發展，因此 1998 年洪森總理邀請我至柬埔寨投資時，我也深諳此發展趨勢並致力佈局柬埔寨，目前已初具成效，今後當繼續努力，深耕柬埔寨與東協國家，以期在一帶一路經濟戰略中創造雙贏策略。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 人把地種好，地把人餵飽。（維吾爾族）
- 火煙不出屋，場上別晒穀。（黎族）
- 早霧晴，晚霧雨。（白族）
- 螞蟻出洞，小雨不停；長蟲出洞暴雨淋淋。（彝族）
- 兩人相好，六十年嫌短；兩人不合，十六年嫌長。（侗族）
- 相愛才交友，合意才聯親。（水族）
- 不作異鄉人，不知故土親。（維吾族）
- 馬馳千里，總想著群體；人走千里，總想著故里。（哈薩克族）
- 人老思鄉，人老思林。（藏族）
- 山是柯爾克孜人的父親，水是柯爾克孜人的母親。（柯爾克孜族）
- 秋天不積草，來年無春羔。（蒙古族）
- 拿弓的人忘不了箭，騎馬的人丟不了鞍。（滿族）
- 勤堵水有魚吃，勤種田有飯吃。（傣族）
- 男兒莫閑坐，少女少串門。（回族）
- 不出力鋤，怎挖得根。（瑤族）
- 一年辛苦，十年幸福；前人辛苦，後人幸福。（壯族）
- 人不學落後，刀不磨生鏽。（回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清代臺灣文獻中的水沙連茶考—兼談 同治年間臺灣烏龍茶直銷海外

郝時遠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

在臺灣茶業發展史的研究中，溯及臺灣茶葉源頭者，無不提及內山“生番”之地的水沙連茶；而論及臺灣茶業興盛者，也都以同治八年（1869）臺地烏龍茶直銷海外為標誌。其實，臺灣“茶葉源頭”與“茶業興盛”是兩個話題，前者為臺灣本土野生茶，後者指閩地移植臺灣的商品茶，兩者在臺灣茶業發展中並無品種、產出和供銷的承襲關係。但是，兩者的共性則彰顯了海峽兩岸互動交流的茶葉之道。如果說，嘉慶年間柯朝氏將武夷山烏龍茶種引入臺灣是真（連橫所說）；那麼，乾隆年間臺灣水沙連茶傳入大陸則是實（史料所載）。這正是本文在臺灣茶業史研究領域幾無縫隙可乘情況下冒昧涉足的原因。同時，清代臺灣烏龍茶直銷海外，昭示臺灣作為清代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的意義，亦是本文涉及的內容。

## 一、“生番精華之地”

清代文獻中的水沙連之地，是臺灣原住民最有特色的聚居地之一。水沙連一名，首見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臺灣府志》（蔣志）所記，即木排田“在諸羅縣水沙連社，四面皆水，中一小洲。其土番以大木連排盛土，浮之水上，耕種其中。”<sup>1</sup>水沙連社，實非一社。考求文獻，水沙連地之番社，大則三十六社、中則二十四社，小則埔裡六社，微則水（裡）一社，均為水沙連番社之屬，文獻所載見諸社名者以水沙連二十四社、埔裡六社為多。以水沙連的地理位置而言，地處臺灣中部內山，“埔裡六社居全台心腹，為中樞扼要之區”，<sup>2</sup>標誌是臺地最大的淡水湖——日月

<sup>1</sup> 康熙《台灣府志》卷之十，《台灣文獻叢刊》所附一种。另高志卷九、周志卷九所記“木排田”則為“在諸羅縣半線社”，不確。蔣志所記即為水沙連之地的日月潭及番社“浮田”，此為後人亲历所記述。

<sup>2</sup> 《台灣輿地繪鈔》《台灣文獻叢刊》第二十六種。

潭，其景致冠蓋全台、盛名蜚聲海外，實為臺灣的風水寶地。

康熙三十六年（1697），鬱永和赴台查尋硫磺礦產，率先記錄了水沙連番社之地和山水景觀。即“水沙廉雖在山中，實輸貢賦。其地四面高山，中為大湖；湖中複起一山，番人聚居山上，非舟莫即。番社形勝無出其右。”<sup>3</sup>五十六年，《諸羅縣誌》將“水沙浮嶼”列為臺地形勝六景之一，即“嶼在水沙連潭中浮出”。<sup>4</sup>六十年（1721），清軍平定朱一貴事變，藍鼎元隨軍進入水沙連之地，留下《紀水沙連》之名篇，稱“其水四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入，匯為潭。……中間突起一嶼。山青水綠，四顧蒼茫，竹樹參差，雲飛鳥語；古稱蓬瀛，不是過也。”<sup>5</sup>向世人展示了環湖番社林立、禾稻浮田、鱗甲往來、挾弓射魚、番民高歌、家藏美酒的一派“世外桃源”景象。

當時，藍鼎元因擁兵前往，攬勝心境“於情弗暢”，故建言官府服教該地“生番”，以“使人人皆得宴遊焉”。此後，凡官吏巡視、文人遊歷于此，無不為水沙連潭（日月潭）之美景所感慨，方志、遊記、詩文、賦言中，多有“比諸武陵人誤入桃花源”的讚譽。<sup>6</sup>據考，日月潭之名應出現在道光年間，<sup>7</sup>《彰化縣誌》記稱“水裡社潭：一名日月潭，在水沙連內。潭中水色，兩邊不同”，<sup>8</sup>即“分丹、碧二色”，故名之。<sup>9</sup>當地番社，亦以日月潭之美景為傲，故官員巡視至此，有社番“爭請乘船遊覽”之舉。<sup>10</sup>

水沙連之地不僅有洞天美景，而且土地富饒、資源豐富，多有獨特物產，若“大松樹生水沙連，合抱成林”；<sup>11</sup>千年松脂琥珀“惟水沙連內山有此”；<sup>12</sup>臺地黃羊，亦僅產自水沙連和紅頭嶼（蘭嶼）；<sup>13</sup>自雍乾起

<sup>3</sup> 郁永和：《裨海紀游》，《番境補遺》，《台灣文獻叢刊》第四十四種。

<sup>4</sup> 康熙《諸羅縣志》卷一，《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种。后，道光《彰化縣志》將其列為“邑中八景”之一，稱“珠潭浮嶼”；光緒《云林縣采访冊》則將其列為“云屬八景”之一，稱“珠潭映日”。

<sup>5</sup> 藍鼎元：《東征記》卷六，《紀水沙連》，《台灣文獻叢刊》第十二種。

<sup>6</sup> 邓傳安：《蠡測彙鈔》，《遊水裡社記》，《台灣文獻叢刊》第九種。

<sup>7</sup> 李宜靜：《清代文獻中的水沙連印象》，《康寧學報》第17期，2015年。

<sup>8</sup> 道光《彰化縣志》卷一，《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五六種。

<sup>9</sup> 邓傳安：《蠡測彙鈔》，《遊水裡社記》，《台灣文獻叢刊》第九種。

<sup>10</sup> 丁曰健：《治台必告錄》卷三，《奏勘番地疏》，《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七種。

<sup>11</sup> 康熙《諸羅縣志》卷十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种。

<sup>12</sup> 康熙《諸羅縣志》卷十，《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种。

<sup>13</sup>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三，《赤崁筆談·物產》，《台灣文獻叢刊》第四種。

“彰化更有水沙連社糯米之征”；<sup>14</sup>又，臺灣原住民最著名的織品“達戈紋，出水沙連”。<sup>15</sup>史稱“其番善織罽毯，染五色狗毛雜樹皮為之，陸離如錯錦，質亦細密；四方人多欲購之，常不可得”。且當地番社“能勤稼穡，人皆饒裕”。<sup>16</sup>除了“架竹木藉草而殖五穀”的浮田外，<sup>17</sup>水沙連內山亦是臺地耕役黃牛馴養、輸出之地，即“產野黃牛，千百為群，諸番取之，用以耕田駕車”。<sup>18</sup>嘉慶二十年（1815）移民侵墾水沙連之地，引發衝突，水裡、埔裡等社遭焚毀，社番遁入內山、流徙他社。墾民則“得番串鼻熟牛數百，未串鼻野牛數千，粟數百石，器物無數。”<sup>19</sup>足見該地番社之殷實、資產之龐大。

總之，以日月潭為中心的水沙連之地，自然環境、經濟物產、社番生計可謂天時地利。故史稱：“水沙連者，在嘉、彰內山，為生番精華之地”。<sup>20</sup>

## 二、“品茶誰譜水沙連”

考求荷蘭殖民佔領臺灣時期的文獻可知，《熱蘭遮城日誌》中雖有水沙連番社酋長被傳召出山參加長老集會之事，但荷蘭人卻並未進抵“萬山之內，有如此水；大水之中，有此勝地”的日月潭。<sup>21</sup>否則，如此獨特的自然景觀和豐富的土特物產，對精細記錄日誌和每一筆貨品的荷蘭人來說，絕不會筆下留情。不過，在臺灣茶業史研究中，都會提及《巴達維亞

<sup>14</sup> 丁绍仪：《东瀛识略》卷二，《税饷·粮课》，《台湾文献丛刊》第三种。

<sup>15</sup> 道光《彰化县志》卷九，《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五六种。

<sup>16</sup> 郁永和：《裨海纪游》，《番境补遗》，《台湾文献丛刊》第四十四种。

<sup>17</sup> 道光《彰化县志》卷十二，《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五六种。

<sup>18</sup> 朱仕玠：《小琉球漫志》卷七，《海东剩语(中)·野牛》，《台湾文献丛刊》第三种。

<sup>19</sup> 姚莹：《东槎纪略》卷一，《埔里社纪略》，《台湾文献丛刊》第七种。

<sup>20</sup> 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附录一，《上制府请经理台湾后山番地》，《台湾文献丛刊》第三〇八种。另，清代水沙連之地的特殊性，还在于其地与台湾的诸多重大事件相关。诸如康熙一统台湾时，明郑残部曾遁入水沙連并挑唆三十六社抗清；平息朱一贵、林爽文、戴潮春三大事件，都波及水沙連之地；期间“番汉”冲突、土地侵垦、官府弹压、熟番迁入、流匪窜扰等事件亦多有发生。水沙連社番，虽称康熙年间即已内附，或称“熟番”，但事实上始终游离于“生番”、“化番”之间，在与官府、移民、“熟番”互动中迁徙流散、番社重组频繁。有清一代，水沙連之地是清廷“理番”施政的“问题”之地，多次用兵、几度议开。及至同光开山抚番，其地已是物是人非。除必要的背景交代，本文不涉及此类内容。

<sup>21</sup> 蓝鼎元：《东征记》卷六，《纪水沙連》，《台湾文献丛刊》第十二种。

城日記》中記載了“茶樹在臺灣也有發現”一說，<sup>22</sup>所據為何無從考究。但巧合的是，清代文獻所記臺灣物產之茶也出自水沙連。

康熙五十六年（1716）成書的《諸羅縣誌》記：“水沙連內山，茶甚夥，味別，色綠如松蘿。山谷深峻，性嚴冷，能卻暑消脹。”<sup>23</sup>其後，藍鼎元在《東征記》中記稱：“水沙連內山產土茶，色綠如松蘿，味甚清冽，能解暑毒，消腹脹，亦佳品雲。”<sup>24</sup>六十一年，首任漢族巡台禦史黃叔璥亦記述：“水沙連茶，在深山中。眾木蔽虧，霧露蒙密，晨曦晚照，總不能及。色綠如松蘿，性極寒，療熱症最效。”<sup>25</sup>此後，有關水沙連茶的類似記述轉輾抄錄於清代臺灣各類文獻。

從康熙年間所記可知，水沙連茶雖“色綠如松蘿”，但屬野生茶且性極寒，其醫藥功效顯著。清代文獻中雖無原住民飲用或醫用此茶的記載，但卻有“番不敢飲”的記錄。雍正年間，福建海防同知吳廷華赴臺灣檄查倉廩，寫下一組描述番社生產生活的“社寮雜詩”，其中一首為“纏過穀雨覓貓螺，嫩綠旗槍映翠蘿。獨惜未經嫋茗戰，春風辜負採茶歌”，並注稱：“貓螺，內山地名。產茶，性極寒，番不敢飲”。<sup>26</sup>既不敢飲，當然也不會去採摘和焙制。乾隆三十七年（1772），海防同知朱景英記稱：臺地不產茶，“水沙連一種，與茗卉相類，產野番叢箐中，曦光不到之處，故性寒可療熱症，然多啜恐胃氣受傷。”<sup>27</sup>其茶性之生硬可見一斑。

臺地飲茶之俗，源自大陸移民的生活習慣。故水沙連茶“解暑毒，消腹脹”的藥用功效，當為大陸移民所認知，且有“亦佳品雲”的評價。《諸羅縣誌》記稱：“北路之產，有台、鳳所無者。如水沙連之茶，……皆其美者也。”<sup>28</sup>其說表明，水沙連茶在臺地物產中亦屬佼佼者。故有“沙蓮茶，香韻獨絕，何讓九曲櫈槍”的評價。<sup>29</sup>大陸移民對水沙連茶藥用功效的認知和需求，使該茶成為“番漢交易”的土產之一。但因進入

<sup>22</sup> 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二冊，郭輝中譯，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年，第456頁。

<sup>23</sup> 康熙《諸羅縣志》卷十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种。

<sup>24</sup> 藍鼎元：《東征記》卷六，《紀水沙連》，《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二种。

<sup>25</sup>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三，《赤崁筆談·物產》，《台灣文獻叢刊》第四种。

<sup>26</sup> 道光《淡水厅志》卷十五，《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种。

<sup>27</sup>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三，《記土物》，《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九种。

<sup>28</sup> 康熙《諸羅縣志》卷十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种。

<sup>29</sup> 道光《彰化縣志》卷十，《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五六种。

內山道路艱險，加之“又畏生番，故漢人不敢入采”。<sup>30</sup>

水沙連各番社，康熙年間內附歸化。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變時，“阿里山、水沙連各社乘亂殺通事以叛”。<sup>31</sup>次年平撫後，阿里山、水沙連諸社雖名義上再度歸附，雖有“化番”之名，但基本回歸“生番”之屬。是故，才有黃叔璥的“每年通事於各番議明，入山焙制”水沙連茶之說。<sup>32</sup>可見，對水沙連茶的市場需求，並非可有可無，當時已產生了“若挾能制武夷諸品者，購土番采而造之，當香味益上矣”的開發願望。<sup>33</sup>雍正年間，吳廷華“社寮雜詩”中貓螺山處的“春風辜負採茶歌”意境，或可視為“通事於各番議明”、“購土番采而造之”的社番勞作情景。

在臺灣茶業史的研究中，大都認為水沙連茶作為野生之物並未進入市場。但事實上，在大陸茶葉植根臺灣之前，水沙連茶作為“番漢交易”的一種物產，在臺灣漢人社會已屬常見飲品。早在乾隆十七年（1752），《重修臺灣縣誌》所錄王必昌的《臺灣賦》中，“更有番茶作飲”一句，<sup>34</sup>當指水沙連茶，而“更有”之說頗具“幸甚至哉”之意，暗合藍鼎元“亦佳品雲”之譽。在大陸茶葉作為貨品供給臺灣極其有限的情況下，水沙連茶無疑是內地移民求索的茶飲佳品。

水沙連茶除“番茶”之稱，亦稱“苦茗”。《番社采風圖考》記：“彰化水沙連社，……社出苦茗，性極寒。”<sup>35</sup>道光二十七年（1847），閩浙總督劉韻珂在覆勘臺灣水沙連六社番地的奏摺中提及，臺地間有產茶之地，“皆葉粗味苦”，<sup>36</sup>即此苦茗。其茶雖苦，但消暑祛癆、消食去熱的功效，卻頗得讚譽。在一些文人墨客的詩文中體現尤多，若“一甌苦茗三升酒，消受文人日又昏”；<sup>37</sup>“多烹苦茗清詩思，好對冰壺洗俗腸”；<sup>38</sup>“泉清烹苦茗，籟靜撫焦琴”；<sup>39</sup>“頻喚山妻烹苦茗，一庭明月

<sup>30</sup> 康熙《諸羅縣志》卷十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种。

<sup>31</sup>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六，《番俗六考·北路諸羅番七》，《台灣文獻叢刊》第四种。

<sup>32</sup>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三，《赤崁筆談·物產》，《台灣文獻叢刊》第四种。

<sup>33</sup> 康熙《諸羅縣志》卷十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种。

<sup>34</sup> 乾隆《重修台灣縣志》卷十三，《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一三种。

<sup>35</sup> 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台灣文獻叢刊》第九〇种。

<sup>36</sup> 丁曰健：《治台必告錄》卷三，《奏勘番地疏》，《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七种。

<sup>37</sup> 陳肇興：《陶村詩稿》卷七，《消夏雜詩》，《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四种。

<sup>38</sup> 道光《彰化縣志》卷十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五六种。

壓闌幹”；<sup>40</sup>甚至佛門之地亦“臘僧煮苦茗，殷勤吐樸質”。<sup>41</sup>足見水沙連茶流布之廣。

水杉連茶產自內山“生番”之地且“甚夥”（茶樹多），但交通不便、關隘阻隔、得之不易、交換也難得經常，其產量應該有限。加之茶性極寒，酷暑之季需求最旺，故其轉輾交易，價格亦應不菲。道光年間，有詩文稱：“品茶誰譜水沙連，辟暑亦供石鼎煎。廿四社番阿堵處，追幽鑿險利無邊”。<sup>42</sup>其中“辟暑亦供石鼎煎”，彰顯了其季節性的需求；而“追幽鑿險利無邊”，則反映了雖然得之不易但獲利頗豐的市場價值。<sup>43</sup>作為臺地物產，水沙連茶不僅在乾隆朝官修方志中已列入“貨之屬”，<sup>44</sup>而且作為茶葉產品已經與大陸茶葉沒有區別，即“茶，出水沙連山，能卻暑消瘴。其餘武彝諸品，皆來自內地。”<sup>45</sup>

水沙連茶產自內山“生番”之地而“番不敢飲”，但這不意味著原住民沒有茶飲之需求。自雍乾時期，鹽、茶、布帛即是溝通內山番社的必須貨物，官府招撫亦多以鹽、茶賞慰。乾隆五十三年（1788），協助追剿林爽文有功的番社首領人等赴大陸京城朝覲，<sup>46</sup>清廷內務府確定的“居住供支”專案為：“臺灣生番來京，每十人日給羊一，每人日給鹽一兩五錢、醃菜二兩、對茶麥面一兩六錢、牛乳四兩，每四人茶一包，燭共四十二枝；均給好米。”<sup>47</sup>及至清末開山撫番，官府亦“以生番所喜茶、煙、鹽、布等物恣其交結”。<sup>48</sup>原住民所喜之茶乃大陸所產，而大陸移民所求之茶則為水沙連之“番茶”，正是在這種兩岸民間各取所需的互動中，水

<sup>39</sup> 林占梅：《潛園琴余草簡編》，《台灣文獻叢刊》第二〇二種。

<sup>40</sup> 许南英：《窺留園草》卷一，《乙酉十首》，《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七種。

<sup>41</sup> 施士杰：《后苏龕合集》，《后苏龕詩鈔》卷二，《古今体詩一百三十四首》，《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一五種。

<sup>42</sup> 道光《彰化縣志》卷十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五六種。

<sup>43</sup> 李宜靜：《清代文獻中的水沙連印象》，《康寧學報》第17期，2015年。

<sup>44</sup> 乾隆《重修台灣府志》卷十七，《台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五種。

<sup>45</sup> 道光《彰化縣志》卷十，《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五六種。

<sup>46</sup> 見拙文：《清代台灣原住民赴大陸賀壽朝覲事迹考》，《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

<sup>47</sup> 《清會典台灣事例》，《事例》（二），《禮部》（下），《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二六種

<sup>48</sup> 羅大春：《台灣海防并開山日記》附錄一，《上制府請經理台灣后山番地》，《台灣文獻叢刊》第三〇八種。

沙連茶在乾隆年間傳入大陸。

### 三、水沙連茶入中華本草藥典

對大陸來說，茶業歷史悠久，茶品多樣豐富，絕無對“皆葉粗味苦”之茶的需求。但水沙連茶的藥用功效，卻聲名遠揚、無可替代。因此，自乾隆年間始，臺地“凡客福州會城者，會城人即討水沙連茶，以能療赤白痢如神也。”<sup>49</sup>可見，閩地雖屬茶葉之鄉，但卻稀罕水沙連茶的特別之處。值得重視的是，水沙連茶傳入大陸不僅為閩地民間求索，對中國傳統醫學藥典亦有貢獻。

乾隆三十年（1765），錢塘中醫世家趙學敏編修完成《本草綱目拾遺》初稿，其序稱“且其時不惜工費，延天下醫流，遍詢土俗。遠窮僻壤之產，險探仙麓之華。”臺灣獨特草藥亦為其重視，水沙連茶之藥用功效也為其所關注。該書卷六“木部”開列了水沙連茶一目：“產臺灣，在深山中，眾木蔽虧，霧露密，晨曦晚照，總不能及，色綠如松蘿，……性極寒，療熱症最效，能發痘。”<sup>50</sup>該書收錄產自臺灣的若干本草等，參考書目包括了方志《琉球國志略》、《諸羅縣誌》、《臺灣府志》，雜誌《海東劄記》、《臺灣采風圖考》、《台海使槎錄》等。<sup>51</sup>而水沙連茶一目釋文，無疑錄自黃叔璥所記：“水沙連茶，在深山中。眾木蔽虧，霧露蒙密，晨曦晚照，總不能及。色綠如松蘿，性極寒，療熱症最效。”惟多了“能發痘”一句。這應是趙學敏從醫家眼光對水沙連茶藥用功效的補充詮釋。

相關研究認為，光緒十七年（1891），唐贊袞在其《台陽見聞錄》中述及水沙連茶之藥用功效，博采了前人諸種記述，“可謂水沙連茶療效之集大成”，其中“末句‘能發痘’則為新增”。<sup>52</sup>因關涉水沙連茶的諸多研究中，均未涉及《本草綱目拾遺》一書，所以也使諸多學人難以全面、準確解讀清代臺灣文獻中的相關記載。所謂“能發痘”一說，並非唐贊袞所“新增”。正如趙學敏參考了黃叔璥的《台海使槎錄》一樣，唐贊袞博采了前人諸種記述，不過是包括了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而已。

<sup>49</sup> 朱仕玠：《小琉球漫志》卷六，《海東剩語（上）·水沙連茶》，《台灣文獻叢刊》第三種。

<sup>50</sup> 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卷六，《木部》，國學大師網

<sup>51</sup> 李超霞：《〈本草綱目拾遺〉引用書名探討》，中國中醫科學院 2012 級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

<sup>52</sup> 李宜靜：《清代文獻中的水沙連印象》，《康寧學報》第 17 期，2015 年。

總之，臺灣內山“生番”之地的水沙連茶，傳入大陸不僅為民間所知曉和求索，而且以其醫藥的功效進入中華本草典籍。這是考察水沙連茶價值不可忽視的因素，也是清代海峽兩岸互動交流中見微知著的佳話。

#### 四、“無齒及水沙連者矣”

道光末年，丁紹儀在台遊歷時曾留意過黃叔璥所記水沙連茶，然“未之見也”。時隔二十餘年，同治十年（1871）丁氏追記其事時又稱：“茶固閩產，……比聞臺北居民，亦多以茶為業，新辟埔地，所植尤繁，其味不減武夷；無齒及水沙連者矣。”<sup>53</sup>的確，同治年間大陸茶葉移植臺灣已根深葉茂，且遠銷海外，故無人再提及水沙連茶也不奇怪。但是，這是否意味著水沙連茶已經銷聲匿跡？其實不然。

咸豐二年（1852），歷經 20 年的《噶瑪蘭廳志》付梓。其中《物產·貨幣之屬》中記：“茶：土產特多，焙制尚未得法，能避暑消瘴；其餘武彝諸品皆來自內地。”<sup>54</sup>這一記載傳遞的資訊有四：一是指噶瑪蘭或臺地土產茶特別多；二是焙制尚不得法；三是有避暑消瘴之功效；四是不同於來自內地的武夷等茶。顯然，這是水沙連茶無疑。

噶瑪蘭之地，于嘉慶十五年（1810）設廳之後，清廷在臺灣東部之治“遂及山后，增幅員百里”，<sup>55</sup>通達內山。道光年間，水沙連、噶瑪蘭之地的開墾及其“番漢分界”格局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漢人“入山採伐木植”、“入山煎煮樟腦”已屬常態。<sup>56</sup>若此，採摘水沙連茶已無“每年通事於各番議明”之需，只是野生茶之焙制之法尚不得要領而已。

同時，水沙連之地的開墾也以展開。同光之際開山撫番，夏獻綸周巡內山之地，成“埔裡社圖”等一系列臺灣輿圖。奏稱水沙連之埔裡社地開墾形勢：六社之地“已開墾者約有三分之二”，其中“向居六社歸化者，現有六百餘名”，自道光年間遷入駐屯“熟番”達六千余名，“漢民在六社耕墾者，有二千六百餘名”。<sup>57</sup>而述及物產：則“樟腦以外，惟茶為

<sup>53</sup> 丁紹儀：《東瀛識略》卷五，《海防·物產》，《台灣文獻叢刊》第三種。

<sup>54</sup> 咸丰《噶瑪蘭廳志》卷六，《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六〇種。

<sup>55</sup> 姚莹：《東槎紀略》卷一，《埔裡社紀略》，《台灣文獻叢刊》第七種。

<sup>56</sup> 姚莹：《東槎紀略》卷四，《答李信齋論台灣治書事》，《台灣文獻叢刊》第七種。

<sup>57</sup> 《劉銘傳撫台前后檔案》，《檔案》（一），《台灣府轉行臬道夏獻綸查勘中路埔裡各社籌辦事宜》，《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七六種。

多。惜栽蒔、焙制之法未諳，致非佳品。”<sup>58</sup>由此可知，其地受同治初年臺灣茶業大興、茶葉利厚的影響，亦栽種茶樹，而且很可能是因地制宜培植野生水沙連茶樹，以圖馴化。

當時，臺北地區烏龍茶種植已呈一派繁榮景象，若論茶樹栽培、茶葉焙制技藝已經不成問題。是故，臺北以外地區亦爭相植茶。如恒春縣，

“光緒元年，知縣周有基購茶，令民試種”。<sup>59</sup>而且其茶“其味清香，倍於他處，惜未能推廣焉。”<sup>60</sup>恒春地處臺南之地，亦可引進大陸茶種，且清香“倍於他處”，而為何水沙連種植的茶葉“致非佳品”？所謂“惜栽蒔、焙制之法未諳”，很可能是茶種問題。也就是以當地野生茶馴化培植，不僅需要過程，而且其茶樹栽培、茶葉加工技藝不同於引進移植的大陸茶種。

水沙連茶為內山所獨有，且其功效特別，始終存在著民間市場需求，故其地墾民或珍視其資源而欲開發之，採種植苗亦在情理之中。夏獻綸巡視之際亦商地方官“擬在彰化一帶招雇良農數名入內，教以耕作；並雇茶匠二名，教以藝植、焙制；俾民生日裕，風氣日開。”<sup>61</sup>也是扶持其地的茶葉生產。其後，水沙連茶之名似不見史籍，水沙連之地所產茶葉並非無人“齒及”。

## 五、沙連堡之凍頂烏龍

光緒二十年（1894），雲林縣訓導倪贊元編輯採訪冊，記沙連堡嶺頂山之地：居民數十家，“多植茶樹。昔藍鹿洲游台，曾到沙連，稱此茶為佳品；謂氣味清奇，能解暑毒、消腹脹，邑人多購焉。”沙連堡，即“舊生番水沙連社”。<sup>62</sup>而倪氏所識“多植茶樹”即康熙末年藍鼎元所記水沙連茶。如果上述推測水沙連之地已人工培植水沙連茶，那麼光緒二十年倪氏所見仍屬“其種茶之地不少”的面貌。他述及藍鼎元“稱此茶為佳品”一句的茶之功效，為水沙連茶所特有，其話語轉述前人所記無疑。但“邑

<sup>58</sup> 夏獻綸：《台灣輿圖》，《埔里社圖》，《台灣文獻叢刊》第四五種。

<sup>59</sup> 光緒《恒春縣志》卷二，《建署·羅佛山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七十五種。

<sup>60</sup> 光緒《恒春縣志》卷十四，《藝文·羅佛仙庄》，《台灣文獻叢刊》第七十五種。

<sup>61</sup> 《劉銘傳撫台前后檔案》，《檔案》（一），《台灣府轉行臬道夏獻綸查勘中路埔里各社籌辦事宜》，《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七六種。

<sup>62</sup> 倪贊元：《雲林採訪冊》，《沙連堡》，《台灣文獻叢刊》第三七種。

人多購焉” ，則前人從未提及，應系其實地採訪所得。若此，著名的凍頂烏龍茶似與水沙連茶產生了淵源關係。

臺灣學界的相關研究認為，“凍頂茶的來源有三種可能：其一，是土生土長者；其二，是林鳳池自福建移來者；其三，是早期的拓墾先民移來者。臺灣土生土長的茶樹，水沙連茶早在道光年間，隨著臺北茶葉的崛起而沒落。凍頂茶的種植，以林鳳池舉人自福建武夷山移入茶種，由林三顯種於凍頂，或凍頂蘇家祖先將茶種引進來種植的，這兩者最為可能。”<sup>63</sup>雖然此觀點基本排除了“土生土長”的水沙連茶淵源，但是所謂“早期的拓墾先民移來者”亦無任何證據可循。而“林鳳池自福建移來者”則為凍頂烏龍茶研究普遍的認知，幾成共識。

相關研究多稱：“清咸豐乙卯年（1855），林鳳池氏自福建引入青心烏龍種茶苗，種植於凍頂山，相傳為凍頂烏龍茶之起源。”<sup>64</sup>此說在兩岸茶文化推介、傳播中影響廣泛。林鳳池系沙連堡大坪頂人，祖籍福建龍溪。咸豐五年（1855）中舉，八年例授內閣中書。同治初年在清廷平息戴潮春事變中，于沙連堡“招集鄉壯義民，約以聯莊拒賊”，立有軍功，賞帶藍翎。<sup>65</sup>但清代文獻中並無林氏從閩地帶回茶苗之事，只是民間傳說之一種。

在臺灣，有關沙連堡凍頂烏龍茶之由來尚有其他傳說，如 1932 年亦有“臺灣舊志所謂沙連種者，即指此也”之說；1974 年又有道光十一年（1831）林鳳池由福建武夷帶回茶苗之論。<sup>66</sup>根據史料所示，林鳳池咸豐五年中舉，同治四年因功受獎入仕，“後卒于天津會館，年四十九歲”。<sup>67</sup>即便其同治五年去世，上溯道光十一年也年僅 13 歲。故這些說法都不足為訓。對此，有臺灣學者認為，有關林鳳池咸豐年間從大陸移植茶苗成就沙連堡凍頂烏龍茶之說，不能成立，只是一個“美麗的神話”。<sup>68</sup>

<sup>63</sup> 林劭宇：《冻顶乌龙茶发展史之研究》，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学位论文，2011 年。

<sup>64</sup> 宋时磊：《中国台湾茶叶国际贸易及其茶文化的历史变迁》，《台湾农业探索》2015 年第 1 期。

<sup>65</sup> 倪贊元：《云林采访册》，《沙连堡·兵事》，《台湾文献丛刊》第三七种。

<sup>66</sup> 陈哲三：《从水沙连茶到冻顶乌龙茶——鹿谷冻顶乌龙茶移入传说考》，《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 16 期，2008 年 6 月。

<sup>67</sup> 倪贊元：《云林采访册》，《沙连堡·兵事》，《台湾文献丛刊》第三七种。

<sup>68</sup> 陈哲三：《从水沙连茶到冻顶乌龙茶——鹿谷冻顶乌龙茶移入传说考》，《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 16 期，2008 年 6 月。

因此，光緒二十年倪氏所記沙連堡之茶，是否隨著水沙連“生番化熟”而野生茶亦“熟化”為凍頂烏龍茶？仍有可追溯和想像的空間。連橫說：“臺灣產茶，其來已久。舊志稱水沙連之茶，色如松蘿，能辟瘴卻暑。至今五城之茶，尚售市上，而以嶺頂為佳，唯所出未多。”<sup>69</sup>此說並未將水沙連茶與凍頂烏龍直接聯繫在一起，但有意思的是，清末水沙連之地所植之茶因品質不佳“故產不甚旺”，而連橫說“以嶺頂為佳，唯所出未多”又似相合。兩者無論劣質或優良，產量不多是為共同之處。而鹹同之際，臺灣茶業已經興起，“淡水之種茶也，始于同治初年。嗣洋商有到該處販賣出洋者，茶價驟高；農民趨之，競植以為利。”<sup>70</sup>其規模和產量誠如丁紹儀所說已呈“日增月盛”之勢，而動力“亦無他，其利厚也”。<sup>71</sup>而水沙連之地的“茶”無論優劣，其“所出未多”自然無利可圖，但在民間仍有廣眾之銷路，即民眾飲“茶則用土產，性寒味苦，不及武彝之甘；富者皆用武彝、福寧諸種。”<sup>72</sup>可見，閩地武夷等茶種傳入臺灣並形成規模產業後，雖然臺北地區烏龍茶名聲大噪、傳播海外，但“性寒味苦”的臺地土產茶並未被淘汰，水沙連茶歷經培育和焙製成就凍頂烏龍茶似不無可能。<sup>73</sup>只是其“苦茗”的野性“化熟”之後，其口味和功效有所改變而已。<sup>74</sup>

## 六、臺灣烏龍茶從淡水到紐約

同治八年（1869），兩艘外國商船從臺灣淡水港啟航，目的地是美國紐約。這是清代海上絲綢之路溝通東西方的一次茶葉之旅，當時被命名為福爾摩薩茶（Formosa Tea）的中國臺灣烏龍茶，實現了對外貿易的海路

<sup>69</sup> 連橫：《台灣通史》卷二十七，《農業志》，《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二八種。

<sup>70</sup> 《清季台灣洋務史料》，《閩浙總督文煜奏請派葉文瀾駐台督辦煤場並察看硫礦礦油樟腦茶叶各情形設法開採折（光緒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七八種。

<sup>71</sup> 丁紹儀：《東瀛識略》卷五，《海防·物產》，《台灣文獻叢刊》第三種。

<sup>72</sup> 鄭鵬雲、曾逢辰纂輯《新竹縣志初稿》卷五，《考》一，《風俗·閩粵俗》，《台灣文獻叢刊》第六一種。

<sup>73</sup> 本文所述以清代台灣文獻為據，既未涉及台灣野生水沙連茶的植物學歸屬，亦為考究日本殖民占領台灣時期對茶葉的研究、開發中的相矣線索，故文中判斷多有局限，惟拋磚引玉爾。

<sup>74</sup> 查今之凍頂烏龍茶功效，多為护肤、抗癌、通絡、瘦身等，尤忌空腹飲用，似其茶性中仍有消食泻火之功，可謂“好對冰壺洗俗腸”。

直銷。操持此事的英國蘇格蘭商人約翰·杜德(John Dodd)與中國買辦李春生，也因此被稱為臺灣的“茶葉之父”。臺灣茶業由此興盛，誠如連橫所說：“夫烏龍茶為臺北獨得風味，售之美國，銷路日廣，自是以來，茶業大興，歲可值銀二百數十萬圓，……臺北市況為之一振。”<sup>75</sup>臺灣茶業之興，實為大陸茶種引進。連橫所說嘉慶年間柯朝氏肇啟，無據可循。而“初，茶葉出自淡水，山民多以植茶為業。道光年間，茶葉皆運福州”一說，<sup>76</sup>似說明道光年間茶業已成規模。然“淡水之種茶也，始于同治初年”，<sup>77</sup>又是臺灣茶業興起的共識。

康熙末年，黃叔璥記兩岸貿易稱“海船多漳、泉商賈”，並開列來自漳、泉、興化、福州等地的各種貨品，其中“建寧則載茶”，返回時則臺灣米、麥、黑白糖、番薯、鹿肉等，售於廈門、運至上海，區區“海壩彈丸，商旅輻輳，器物流通，實有資於內地。”<sup>78</sup>臺灣的茶葉靠大陸商賈供給、人員往來攜帶，自不待言。但自道光年間，“淡北石碇、拳山二堡，居民多以植茶為業。道光年間，各商運茶，往福州售賣。”<sup>79</sup>臺灣茶葉開始回銷大陸，並經廈門轉口運往香港、澳門、東南亞、乃至美西國家。

“自同治二年起，淡水滬尾、雞籠二口，與外國通商，就地買葉，從此鮮運福州。”<sup>80</sup>而臺灣土產“皆葉粗味苦”之水沙連茶，“俱非外夷所珍惜”，<sup>81</sup>自然不在其列。

臺灣茶業興起，受茶葉之利影響為最，“茶亦利溥，實始教種于同治初間”。<sup>82</sup>同治四年（1865），有“英人鼓吹種植臺灣茶葉”者，<sup>83</sup>即“臺灣茶業之盛，始於讓獨獨唱之。獨獨，英國探險家也。來遊臺灣，試得本島茶種之美；運出海外，甚為世人所共賞，由是而茶業興焉。”<sup>84</sup>對

<sup>75</sup> 連橫：《台灣通史》卷二十七，《農業志》，《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二八種。

<sup>76</sup> 光緒《新竹縣志初稿》卷二，《台灣文獻叢刊》第六一種。

<sup>77</sup> 《清季台灣洋務史料》，《閩浙總督文煜奏請派葉文瀾駐台督辦煤場並察看硫磺礦油樟腦茶葉各情形設法開採折（光緒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七八種。

<sup>78</sup>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二，《赤崁筆談·商販》，《台灣文獻叢刊》第四種。

<sup>79</sup> 同治《淡水廳志》卷四，《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種。

<sup>80</sup> 唐贊容：《台陽聞見錄》卷上，《籌餉·茶厘》，《台灣文獻叢刊》第三〇種。

<sup>81</sup> 丁曰健：《治台必告錄》卷三，《奏勘番地疏》，《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七種。

<sup>82</sup> 夏獻綸：《台灣輿圖》，《淡水縣圖》，《台灣文獻叢刊》第四五六種。

<sup>83</sup> 許南英：《窺園留草》，《附錄·窺園先生自定年譜》，《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七種。

<sup>84</sup> 王松：《台陽詩話》下卷，《台灣文獻叢刊》第三四種。

此，連橫所述更詳：“時英人德克來設德記洋行，販運阿片、樟腦，深知茶業有利。四年，乃自安溪配至茶種，勸農分植，而貸其費。收成之時，悉為採買，運售海外。”<sup>85</sup>是故才有了同治八年臺灣烏龍茶自淡水直銷美國紐約之舉。而且，當年也並非只有兩船烏龍茶運銷美國。據統計，當年英、德、美、法等國商船 18 艘，運載了茶葉 5 228 190 磅，其中烏龍茶 4 975 351 磅，坑固茶 252 839 磅。<sup>86</sup>因此，同治八年一事，不過是臺灣烏龍茶銷售海外的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時間節點。在此之前臺地茶葉多需運至廈門、福建加工包裝，而英人杜德在臺灣推動種植的同時，亦從大陸請來茶師就地加工，其相繼在艋舺、大稻埕“設一茶館試行粗茶的精製，……這是臺灣茶葉精製的濫觴。”<sup>87</sup>

臺灣茶葉直銷海外，是清代中國對外貿易的組成部分，茶葉出口由來已久，大陸茶葉始終為主體，自不待言。僅就茶葉出口而言，康熙六十一年至乾隆四年（1722—1739）為 102 795 擔，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增至 807 193 擔，增加七倍多；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四年（1780—1789）增至 1 885 443 擔，又增長一倍多；嘉慶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10—1829）增至 3 242 874 擔，再增長近一倍。<sup>88</sup>而西方人對茶葉的嗜好，以英人為最。1800—1850 年，英國人均消費茶葉由 1.5 磅上升為 2 磅，雖增幅不多但因期間人口增長迅速，茶葉的總消費量實際上翻了一番，而“幾乎所有這些茶葉都來自中國”<sup>89</sup>。道光二十年（1840）的鴉片戰爭，即是中英貿易逆差導致英國大規模輸入鴉片的結果。

康熙末年，藍鼎元稱鴉片“傳入中國已十餘年，廈門多有，而臺灣特甚，殊可哀也！”<sup>90</sup>甚至也禍及了原住民，“手操鱗甲（獨木船名）吸鴉片”<sup>91</sup>。這種“鴉片和茶葉的互換貿易對中國來說是一場災難”<sup>92</sup>。臺灣

<sup>85</sup> 連橫：《台灣通史》卷二十七，《農業志》，《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二八種。

<sup>86</sup> 《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論台灣府城及打狗地方通商馬頭貨額》，《台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

<sup>87</sup> 《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台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

<sup>88</sup> 黃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歷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

<sup>89</sup> 【英】羅伊·莫克塞姆：《茶：嗜好、開拓與帝國》，畢小青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年，第 62 頁。

<sup>90</sup> 藍鼎元：《平臺紀略》，《附錄目次·與吳觀察論治台灣事宜書》，《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種。

<sup>91</sup> 連橫：《台灣詩乘》卷二，《台灣文獻叢刊》第六四。

<sup>92</sup> 【英】羅伊·莫克塞姆：《茶：嗜好、開拓與帝國》，畢小青譯，第 79 頁。

茶葉出口與洋貨易入，亦不可避免鴉片之毒，若海關統計中“到台貨物，如三號鴉片”（三船），等等。<sup>93</sup>這是那個時代中西貿易的歷史悲劇。當時，有人論及英人鴉片與中國茶務時，曾有過天真的良好願望：“且英國為馳禁黑奴之事，捐銀千余萬以成善舉。今以毒物貽害中國，自問想亦不安。似可一面遣公使與該國主及上下議院婉詞理論、耐心堅持，但求異日之有濟，不望速效于一時；並由商民常刻洋字新聞紙，公佈各國，訴以中國受鴉片煙之毒為至慘、至酷；其國內雖重利而外亦好名，或不至漠然無所動於中也。抑或由公使攜帶桑、茶種各若干，贈其國主，勸令將印度種煙之地試種桑、茶，彼以毒物來，我以美物往，或使之內愧乎。”<sup>94</sup>殊不知，無需“我以美物往”，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英人即成立了茶葉委員會，派出其成員戈登到中國收集茶樹和茶種，以期在印度培植。<sup>95</sup>

不過，就臺灣茶業的發展而言，自同治八年以後，已形成“南路多糖油，北路則茶菁礦煤樟腦尤盛”之勢。<sup>96</sup>其中，茶葉“產大坪山、大屯山、南港仔山及深坑仔內山最盛”；<sup>97</sup>“台陽歲出烏龍茶十余萬箱，大都皆系附近北路所產”；<sup>98</sup>而且，因“茶價驟高，農民趨之，競植以為利”，<sup>99</sup>“由淡北遞及新邑內山一帶蔓延數十裡，皆鋤雜穀而種茶葉”。<sup>100</sup>以致到了臺地糧食不能自給的地步。先是，閩地、臺地茶葉貿易均無茶引、茶厘之制，同治十年（1871）始“每擔酌收厘銀一圓”，<sup>101</sup>又“光緒十六年，巡撫劉銘傳劄飭委員會同新竹知縣就北城外水田街開設局卡，每細茶百觔抽厘一圓五角、粗茶八角。”<sup>102</sup>就在中國茶葉貿易設關抽稅，提

<sup>93</sup> 《台湾番事物产与商务》，《论台湾府城及打狗地方通商马头货额》，《台湾文献丛刊》第四六种。

<sup>94</sup> 邵之棠编《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百，《通論部一·海防條议》，上海寶善齋石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

<sup>95</sup> 【英】羅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第89页。

<sup>96</sup> 林豪：《東瀛紀事》卷下，《丛談》下，《台湾文献丛刊》第八种。

<sup>97</sup> 同治《淡水厅志》卷十二，《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七二种。

<sup>98</sup> 《清季申報台灣紀事輯錄》，《台灣北路生番亟宜招撫及招商開墾論》《台灣文献丛刊》第二四七种。

<sup>99</sup> 《清季台灣洋務史料》，《閩浙總督文煜奏請派葉文瀾駐台督辦煤場並察看硫礦礦油樟腦茶葉各情形設法開採折（光緒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台灣文献丛刊》第二七八种。

<sup>100</sup> 光緒《新竹縣志初稿》卷二，《台灣文献丛刊》第六一种。

<sup>101</sup> 同治《淡水厅志》卷四，《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七二种。

<sup>102</sup> 光緒《新竹縣志初稿》卷二，《台灣文献丛刊》第六一种。

高交易成本之際，英人福瓊蒐發留辯、偽作華人，在大陸多年尋覓（竊取）茶種和植茶、植茶技術，異地栽培的實驗業已完成。<sup>103</sup>期間，英人“複以重貲雇我皖人出洋，為之教導，盡得其法。印度茶業遂盛。”<sup>104</sup>

1873 年（同治十二年），印度茶園達到 304 平方公里，產茶 1 500 萬磅，1880 年（光緒六年）茶葉種植面積達到 843 平方公里（四分之三在阿薩姆），產茶 4 300 萬磅。“對中國茶葉來說，印度茶葉有一個巨大的優勢：前者需要交納 35% 的進口稅，而後者則是免稅的。另外，印度茶的總體品質也高於中國茶。”及至 1888 年（光緒十四年），印度茶葉產量上升到 8 600 萬磅，“英國從印度進口茶葉的數量第一次超過了從中國進口茶葉的數量。”<sup>105</sup>至此，“中國茶業日衰，則印度茶業日盛”。

<sup>106</sup>最終“中國茶業衰殘極矣，出口之數日差月減，其故何也？蓋以印度錫蘭之茶製造新法，外觀有耀、價值合宜，中國之茶遂為所掩，中國之利遂為所奪。”<sup>107</sup>

中國茶葉貿易總體形勢如此，臺灣茶葉貿易也於光緒二十年（1894）達到強弩之末。當年，臺灣出口的烏龍茶為 136 825.79 擔、包種茶 17 176.83 擔，貿易額超過了臺灣糖業而位居第一，<sup>108</sup>從數量上仍處於同治八年以後臺茶產量持續攀升所及巔峰。不過，這也是斷崖式的拐點，甲午之年對大清王朝、對臺灣之地都是一個極度屈辱的年份，臺灣茶業由此也淪為日本殖民掠奪的資源。民國初年，有人遊歷臺地記：“過安平驛，日本臺灣制茶株式會社在焉。聞系專造紅茶，年約四十萬觔左右，多輸運俄國。”<sup>109</sup>臺灣茶業為其壟斷，可見一斑。

<sup>103</sup> 1848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羅伯特·福琼到中國尋找優良茶種，其剃髮留辯偽裝成中國人深入產茶內地，他往印度送回 2 萬種茶樹樣本，並招募了 8 名茶藝專家返回印度。【英】羅伊·莫克塞姆：《茶：嗜好、開拓與帝國》，畢小青譯，第 110-111 頁。

<sup>104</sup> 陳忠倚編《皇朝經世文三編》卷三十一，《戶政九·商務三·通商四大宗論》，上海書局石印，光緒二十八年（1902）。

<sup>105</sup> 【英】羅伊·莫克塞姆：《茶：嗜好、開拓與帝國》，畢小青譯，第 112-113 頁。

<sup>106</sup> 麥仲華編《皇朝經世文新編》（1898），《論中國茶葉之衰應如何設法補救》，上海大同譯書局刊。

<sup>107</sup> 甘韓編《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卷七，《農政中·論中國茶業之失以及補救之法》，商絳雪齋書局印，光緒二十八年（1902）。

<sup>108</sup> 阮思華：《清代台灣農業經濟研究（1683—1895 年）》，暨南大學學位論文，2003 年。

<sup>109</sup> 《台灣游記》，張遵旭《台灣游記》之“四月九日至十一日”。《台灣文獻叢刊》

贅言：今日臺灣南投茶業，鹿谷凍頂烏龍堪稱臺地茶中之聖，而日月潭紅茶亦頗具盛名。昔日水沙連之地出產野生茶的傳統，可謂得到了現代的傳承。而水沙連茶“皆葉粗味苦”的特點，也在南投埔裡的苦茶產業中延續其意蘊，以苦茶籽油為代表的產品，作為健康養生之物，似在昭示水沙連茶的藥用功效。時過境遷，水沙連茶已成歷史（亦或早已華麗轉身），但兩岸交流即如同南投縣農會每年從湖南臨澧進口 70 噸左右苦茶籽一樣，繼續著昔日凡有客自台抵福州“會城人即討水沙連茶”的故事。同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國際社會普遍回應和繼續推進全球化進程的發展動力，並在一系列沿線國家和地區漸次落地。此情此景、今非昔比，誠如清人王松所言：“世界翻新古不同，爭能競智西複東”。<sup>110</sup>在新的海上絲綢之路開啟進程中，中國海峽兩岸經濟交融、文化交流應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開創新的認同境界。

---

第八九種。

<sup>110</sup> 王松：《台阳诗话》下卷，《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四种。

# 中共入藏前後西藏情勢兼駁夏格巴 《藏區政治史》之謬論

孟鴻  
前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 摘要

1949 年國共內戰勝負已分，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在英印政府黎吉生操作下，驅逐民國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人員及在拉薩所有漢人，西藏等於脫離中華民國，而中共尚未宣布建政，此一時西藏形成權力真空，在英人時任印度在拉薩商務（貿易）代表黎吉生鼓動、搨惑下，西藏地方噶廈政府諸親英分子遂認為在此時情況下，乃是「搞」西藏獨立之大好機會，及至是年十月一日中共正式宣布建政，並聲言西藏為中國領土，將派軍「解放」西藏，將外國帝國主義勢力逐出西藏，而西藏地方則透過拉薩電台宣稱中國與西藏僅是施主與福田關係，西藏根本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更詭稱在西藏沒有外國帝國主義勢力。茲就中共軍隊入藏前後在西藏所發生之若干事件擇其要者三數事加以敘述。

**關鍵詞：**驅漢事件、夏格巴·旺曲德典、供施關係、大西藏

## 壹、驅漢事件

自清末宣統派軍入藏，十三世達賴逃往印度，稍後武昌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肇建，由於入藏川軍既無軍紀在拉薩為非作歹，為藏人所怨忿，而又內訌，遂為藏地軍民所驅逐，此為第一次驅漢事件，川軍既已離藏，十三世達賴自印返藏，未幾即宣稱獨立，更與外蒙古簽訂兒戲式所謂

互相承認彼此獨立的《蒙藏條約》<sup>1</sup>，此後西藏地方即與中央失去聯絡，及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奠都南京，翌年設立蒙藏委員會，國民政府一時具中興氣象，末幾派劉曼卿女士到拉薩面見十三世達賴喇嘛，曾有兩度晤談，由是西藏地方與中央恢復部分聯繫，設立西藏駐京辦事處，及至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十三世達賴圓寂，中央派大員黃慕松率團入藏致祭，西藏地方依傳統習俗推舉熱振呼圖克圖為攝政，熱振活佛深以前此噶廈政府一面倒向英印，任由英印擺佈，實屬不智之舉，因此當黃慕松專使一行到達拉薩後，熱振活佛展現與中央和睦的誠意，當黃慕松完成任務離藏時，留下少許幾人在拉薩，作為西藏地方與中央接觸的窗口，也為後來蒙藏委員會設立駐藏辦事處奠下基石。

十三世達賴喇嘛既已圓寂，就必須尋找其轉世靈童（呼畢勒罕），在熱振呼圖克圖主持下，依藏地喇嘛教傳統習俗，派出多批人員，到各地尋覓十三世達賴之呼畢勒罕，最後以青海所尋到之靈童特具靈異，認係十三世達賴之轉世靈童，依照清代規定如尋獲兩名以上靈童，須將其姓名寫於籤上放入由清廷所頒之「金奔巴」瓶內，經活佛誦經後，抽出其中一人，報請清廷核准，始正式成為前一世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如僅尋獲一名靈童，照清廷規定，也須入瓶掣籤，將該靈童姓名寫於籤上，另放一空白之籤入瓶，經同樣程序如抽出空白之籤，則須重新尋找靈童，但尋找靈童既費事又費時，因此往往由西藏地方攝政及噶廈政府備文經駐藏大臣轉呈請准免予掣籤，即行認定，如十二世達賴圓寂後，僅尋獲一名靈童，經請求駐藏大臣轉奏中央請准免予掣籤，經清光緒帝於其三年（1877年）三月批示：

「工噶仁青之子羅布藏塔布克甲木錯即作為達賴喇嘛之呼  
畢勒罕，毋庸掣籤。」<sup>2</sup>

從而可見達賴喇嘛轉世靈童之認定，權在中央政府，這是無可否認的

<sup>1</sup> 關於《蒙藏條約》共有九款，詳情可參見王光所譯《西藏外交文件》，另劉學銖《中英有關西藏之條約》蒙藏委員會，1988年，也錄有條約全文。

<sup>2</sup> 見《清實錄·光緒朝》卷五十二，第二頁，但此處係轉引自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頁540。

史實，但是夏格巴的《藏區政治史》<sup>3</sup>中則扭曲史實杜撰了以下的說法：

「說關於（十二世達賴）轉世問題，攝政和噶倫極為負責的進行了無以復加的考察，西藏天人均一心一意真誠地認定降生於下塔波朗敦家的靈童就是（十二世）達賴喇嘛的轉世，故無需進行金瓶掣籤節外生枝之事項，即能完全認定，火牛年（公元 1877 年）九月初一日，召開西藏會議擴大會議，公布喜訊。同時，布告公眾，此時駐拉薩的滿洲安班松（淮）和桂（豐）二人表示極為不悅（按安班，係指清朝所派駐藏大臣），但為了遮羞，又說北京清廷皇帝降旨，對朗敦·袞嘎仁欽之子洛桑塔克嘉措可以認定為（十二世）達賴喇嘛的最上化身，無庸金瓶掣籤考察。這樣，實際上不得不予以承認。」<sup>4</sup>

看這一段文字，似乎是否認中央有認定轉世靈童之權，但又說「無需進行金瓶掣籤」，我們不禁要問「金瓶掣籤」之制是誰定的？且看在清廷制定「金奔巴瓶」掣籤制度以前，西藏、蒙古地區許多喇嘛教位階較高的呼圖克圖、活佛，往往轉世在藏、蒙地區貴族家中，乾隆對此深不以為然，因此於其五十七年（1792 年）下旨設立「金奔巴瓶」掣籤制度，「金」指黃金，「奔巴」係藏語，意為瓶，「金奔巴」即黃金製成之瓶，其上諭全文如下：

「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二大喇嘛乃西方布行黃教，掌管佛法之宗，但南北所有地方一切事務僧俗人等，皆係達賴喇嘛管轄，必須聰慧有福相之人，方能護持佛法而有裨益於黃教。從前認呼畢勒罕，皆恃拉穆吹仲看龍單于此，拉穆吹仲或受賄恣意舞弊，或偏庇親戚妄指，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暗中受意，令其指誰，此等皆有之事，朕悉知之，而與法教中甚為無益。即令達賴喇嘛一家之中，大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出

<sup>3</sup> 關於夏格巴及其所撰《藏區政治史》詳情，可參看張云所著《評夏格巴的〈藏區政治史〉》，該文輯入張著《西藏歷史問題研究》，該書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該文列頁 302~322，且稱在英譯過程中有美國人介入，英譯本與原意已有出入。

<sup>4</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40，此書係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年，屬內部資料。

有數人，而此輩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又係拉穆吹仲之外孫，即如內地漢僧等傳衣鉢，皆各傳各弟子，相沿已久，竟成蒙古王公、八旗世職相同。如此謀利舞弊，則不但不能振興黃教，而反致於壞其教。何則出家之人，當萬慮皆空，無我無人，淨持佛教。昨據生擒之廓爾喀賊供稱，沙瑪爾巴呼圖克圖，即前輩班禪額爾德尼之兄。而班禪額爾德尼遺留物件，伊亦有分，是其所供，皆為爭財。此次廓爾喀賊搶掠後藏之事，皆伊誘唆所致者，即是不慎認呼畢勒罕之明徵也，有郡王桑齋多爾濟尚然具奏，嗣後請一阿哥作為呼畢勒罕之語。朕彼時將桑齋多爾濟訓誠責斥。以此觀之，不拘何人均可以謂之呼畢勒罕。諾果呼畢勒罕者，必能前世所誦經典，認記所持過物件，則始可以謂之呼畢勒罕。倘惟計其親屬，徇其情面，即作為呼畢勒罕，焉能振興黃教以服眾心哉。今朕送去一金瓶，供奉前藏大昭寺內。嗣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卜尊呼圖克圖等圓寂，出有呼畢拉勒時，禁止拉穆吹仲看龍單，著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將所出呼畢勒罕有幾人，今將伊等乳名各書簽放入瓶內，供於佛前虔誠祝禱念經，公同由瓶內掣取一簽，定為呼畢勒罕，如此佛之默祐，必行得聰慧有福相之真呼畢勒罕，能保持佛教。朕尚且不能主定，拉穆吹仲更不得從中舞弊，恣意指出，眾心始可以服。欽此。」<sup>5</sup>

從這項上諭中明白看出「金奔巴瓶」掣籤制是清廷皇帝所訂設若西藏地方、內、外蒙古不屬於中國，則清廷憑什麼推行「金奔巴瓶」掣籤制，而西藏、內、外蒙古又為何要接受此一制度，夏格巴書中一再指稱西藏自古就是一個國家，純屬謠言。

回頭看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既經尋獲，接著經由政府一再宣稱轉世靈童之認證無需經過中央，而其坐床大典也無須有人主持，姑且相信其所謂坐床典禮並無主持人之說為真，然則清代有關皇帝實錄所載核定各世達賴轉世靈童之記載，均屬偽造之史？顯然夏格巴之說大有問題。對十三

<sup>5</sup> 見吳豐培校訂之《番僧源流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世達賴轉世靈童坐床一事，國民政府相當重視，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率團入藏參與坐床大典，經與西藏地方攝政熱振呼圖克圖及噶廈政府洽商，留下部分人員在拉薩成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其規模、威權雖無法與清代駐藏大臣衙門相提併論，但其為中央派駐拉薩辦事單位，則兩者並無差異，時為 1940 年（民國二十九年）。

駐藏辦事處秉承蒙藏委員會綜理藏務，設處長、副處長各一人，均為簡任，處下設兩科，第一科掌文書、印信、出納、庶務、人事等項；第二科掌政治、宗教、教育、建設、調查、宣傳等事項。每科設科長一人，均薦任，科員四人（委任）、辦事員四人（委任），並得酌用雇員若干人，另置漢文、藏文秘書各一人（後又曾置英文秘書一人、秘書均薦任）、會計員一人、醫師一人，另成立衛隊。駐藏辦事處成立後，該處工作人員與拉薩僧俗相處融洽，西藏地方與中央關係漸趨和睦，但也因此引起帝國主義者英印政府的不愉，而攝政熱振呼圖克圖在政治上開始清除親英分子，更激起英印政府的不安，西藏內部新舊勢力對立，已然暗潮洶湧，親派分子在英印政府支持下，獲得勝利，熱振呼圖克圖最後被毒害而死，親英分子重新掌握藏地政治權力，其時國共內戰大致已定勝負，國民政府失去對大陸之統治，已成定局，但當時西藏地方噶廈政府與駐藏辦事處人員尚無不和，但駐拉薩印度商務代表黎吉生（此人原為英國駐拉薩商務代表，印度獨立後，受印度政府聘用，成為印度駐拉商務代表）從中挑撥，揚言駐藏辦事處人員中有共產黨，如不驅逐，將引致中共軍隊入藏，並以國民政府即將喪失政權，中共雖操勝券，諒其尚無力進軍西藏，此際實為西藏邁向獨立之良機，此一說法打動噶廈政府親英分子，遂有驅逐駐藏辦事人員、拉薩小學教職員、醫院、無線電台等所有在拉薩之漢人，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於 1949 年七月八日致電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說明此事，項該電文全文如下：

「李大總統宗仁鈞鑑：徑啟者，西藏全體噶倫致函電，今據全藏民眾大會呈稱：『茲因中央國民黨與共產黨發生內戰，至今尚未平息。中央官兵所在之處無不發生有共產黨之宣傳與鼓動，故中央駐藏各機關人員等，亦難保無其人，現更傳藏境及拉薩區內，增加潛雜共產黨嫌疑分子者，有中國人及巴安人

等等之說，而難於分別指定。至於本地，乃佛法弘揚聖地之西藏，甚恐受其惡黨之侵蔓與毒害，現全藏人眾發生無限恐怖憂愁。而我中藏之悠久檀越情感，內部並無分毫革（隔）閼。為我中藏政局及內部安寧起見，不得不驅盡代（帶）有共產嫌疑之秘密工作人員。因又無法檢查分別，更為杜絕潛雜之計，將駐藏中央辦事處、無線電台、學校、醫院及其他有嫌疑之人員等，應請限期離藏，各回原籍。等情。』茲准將各機關人員由拉（薩）至印境之沿途旅費及一切烏拉支應、護送官兵，由本政府備有特別從優隆厚待遇外，其他所有嫌疑之中國人及巴安人等，亦派有護送軍隊，即回原籍。該事均已接洽聲明矣。希我中央政府請祈俯念重于實為安靖，並非罔法孟浪，願諒幸甚，感之不盡也。特此草函。恭候國安。

附阿喜哈達以佐蕪函

西藏全體噶倫叩  
藏已丑五月十三日 」<sup>6</sup>

這就是所謂驅漢事件，從驅漢事件之後，西藏地方與國民政府斷了一切溝通平台，對於驅漢事件以雲淡風輕的方式作了如下的描述：

「國民黨以『學經』為名向三大寺和札什倫布寺等派遣了很多漢藏混血兒的僧人特務，在拉薩市內也住有一些挂名商人的漢人。早就想借故把他們驅逐出去。恰好在中國內部，紅漢人共產黨勢力大發展，逐步占領了北京、上海等地。當國民黨政府自身難保之際，在拉薩的國民黨工作人員和特務中混進了共產黨特務的傳言，在中國人內部也議論和懷疑開了。攝政和噶倫們借國民黨工作人員之口，說共產黨軍事力量有進藏的危險，共產黨特務說不準會給西藏政局帶來多大危害，就此作了研究，向西藏會議進行徵詢後，于土牛年（公元 1949 年）六月三日將國民黨駐拉薩辦事處的陳錫章等人及其電台以及住在寺

<sup>6</sup> 見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蒙藏委員會檔案，藏曆已丑年五月十三日，係 1949 年 7 月 8 日，此處係轉引自祝啟源著、趙秀英整理《中華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40。

廟裡和城裡的全部特務和被懷疑是共產黨特務的巴塘人彭錯旺杰，經印度遣返回中國。」<sup>7</sup>

「驅漢」是重大政治事件，但在夏格巴筆下竟如此輕描淡寫帶過去。

## 貳、供施關係

自從十三世達賴喇嘛於 1912 年流亡印度後，宣稱西藏地方與中央或中原王朝的關係為「供施行係」，所謂「供施關係」是正統佛教用語，喇嘛教能否稱為佛教還有疑問<sup>8</sup>，就濫用正統佛教術語，「供施關係」又稱「檀越關係」，也就是施主與福田的關係，也就是說出家佛教僧人為人們講經說法，在心靈上給予解脫，而人們則在物質上給予饋贈，此因僧尼不事生產、食、衣、住、行……等無不仰賴信徒的供養、施舍，基本上兩者立於平等地位上，是各取所需，沒有從屬關係，這種關係被西藏某些有心人利用，認為西藏地方與中央王朝的關係，特別是元朝與清朝時，就是供施關係，何以特別指元朝與清朝跟西藏是供施關係？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只有元、清兩朝將西藏納入版圖，確確實實統治著西藏，所以刻意將這兩朝與西藏的關係說成是供施關係，以為如此就可以證明西藏不屬於中國，但是忘了元朝只是把吐蕃十三萬戶的稅賦賞給薩迦派的法王，試問如果當時吐蕃（就是後日的西藏）不是中國元朝的領土，元朝憑什麼可以把吐蕃劃為十三萬戶？又憑什麼可以把吐蕃十三萬戶的稅賦賞給薩迦派法王？更何況當時格魯派還沒有誕生。至於中國清朝，在雍正以前確實尚未實質統治西藏，尤其入關之前皇太極眼見蒙古各部迷信喇嘛教，覺得可以利用喇嘛教以綏服並弱化蒙古，古往今來政治領袖如果智慧充沛，往往利用宗教以強化其對人民的統治；反過來如果宗教領袖智慧超過政治領袖，

<sup>7</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27。其中末句提到的彭錯旺杰，或作平措旺杰，漢名平汪，為巴塘地下黨黨員，曾入南京中央政治學校蒙藏班就讀，後被退學，其為共產黨無疑，但與駐藏辦事處毫無關聯。中共建政後簽定《十七條協定》時平汪為翻譯人員，中共軍隊入藏時，渠也為首批入藏中共官員，有關此人詳情可參見梅·戈爾斯坦、道樟喜饒、威廉司本石初著，黃瀟瀟譯《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時代和政治生涯》一書，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 年。

<sup>8</sup> 關於此點可參見筆者所撰《且說喇嘛教》一文，文載《中國邊政》季刊第 203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2014 年 9 月，之後加以增補，輯入《掀開喇嘛的神秘面紗，看清達賴的真實面目》，台北知書房出版社，2017 年。

則往往把政治領袖玩弄於股掌之上，翻開中外歷史其例枚不勝枚舉，皇太極以及清初諸帝對喇嘛教應作如是觀，且看皇太極如何看待喇嘛教，皇太極曾說：

「喇嘛等口作訛言，假以供佛持戒之名，潛肆淫邪，貪圖財物，悖逆造罪，又索取生人財帛、牲畜，詭稱人免罪于幽冥，其薰誕妄為尤甚，喇嘛等不過身在世間造作罪孽，欺誑無知之人耳。」<sup>9</sup>

皇太極以這種心態、眼光看待喇嘛及喇嘛教，除了利用喇嘛教外，何來所謂的「供施關係」？皇太極口中的「潛肆淫邪」，乃是自元朝吐蕃喇嘛教喇嘛到內地後的荒誕行為，據元末明初時人記載元時吐蕃番僧（即喇嘛）之行為：

「都下受誠，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下戒師（元時尊喇嘛教薩迦派法王為帝師），於帳中受藏，誦咒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間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泆，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流風之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兩廡。」<sup>10</sup>

再看康熙皇帝如何看待喇嘛教（其時喇嘛教格魯派五世達賴喇嘛已握有極大權力），康熙曾說：

「若蒙古等惑予喇嘛，室中所有為之罄盡，此皆係愚人崇信禍福之說，而不知其終無益也。」<sup>11</sup>

康熙對喇嘛教、喇嘛是如此態度，所謂「室中所有為之罄盡」，正是皇太極所稱：「（喇嘛）又索取生人財帛、牲畜……」，皇太極、康熙祖孫是以這種心態看待喇嘛教，請問其對喇嘛教達賴、班禪示好，究竟是在運用喇嘛教以綏服、馴化蒙古，還是真心在以布施種福田？相信讀者自會

<sup>9</sup> 見《清實錄·太宗朝》卷二十八，天聰十年（1616年）三月庚申。

<sup>10</sup> 見元末明初時葉子奇所撰《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四之下，頁84。

<sup>11</sup> 見《康熙起居注》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初六日，但此處係轉引自余梓東《清代民族政策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年，頁289。

判斷。康熙最寵愛之孫弘曆，也即後來的乾隆皇帝，他是如何看待喇嘛教的，乾隆帝於其五十七年（1792年）為了制定「金奔巴瓶」掣籤制度，而親自作了一篇《喇嘛說》（通稱《御制喇嘛說》），全文頗長，但系統性闡述其對喇嘛教的政策，以及之前活佛轉世的若干亂相，為免斷章取義，特將此篇《喇嘛說》全文予以引錄如下：

「佛法始自天竺，（即厄納特珂克部，其地曰痕都斯坦）東流而至西番（即唐古特部，其地曰三藏）。其番僧又相傳稱為喇嘛。喇嘛之字，漢書不載，元明史中，或訛書為刺馬（陶宗儀《輟耕錄》載元時稱帝師為刺——讀作拉，下同——馬。毛奇齡《明武宗外紀》又作刺麻，蓋係隨意對音，故其字不同）予細思其義，蓋西番語謂上曰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即漢語稱僧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稱黃教，蓋自西番高僧帕克巴（舊作八思巴），始盛於元，沿及于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元世祖初封帕克巴為國師，後復封為大寶法王，並尊之曰“帝師”。同時，又有國師者亦封帝師，其封國師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國師、大國師，不過四五人。至永樂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外，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間，益不可勝記。）我朝惟康熙年間，只封一章嘉國師，相襲至今。（我朝雖興黃教，而並無加崇帝師封號者。惟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圖克圖為灌頂國師，示寂後，雍正十二年乃照前襲號為國師。）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號，不過沿元明之舊，換其襲敕耳。（黃教之興，始於明，番僧宗喀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曰達賴、曰班禪喇嘛。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羅倫嘉穆錯，世以化身掌黃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錯，三世曰索諾木嘉穆錯，即明時所稱活佛鎖南堅錯也，四世曰雲丹嘉穆錯，五世曰阿旺羅卜藏嘉穆錯。我朝崇德七年，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遣使貢方物。八年，賜書達賴喇嘛及班禪呼圖克圖，蓋仍沿元明舊號。及定鼎後，始頒給敕印，命統領中外黃教焉。）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

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問。如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正衡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專席於坐隅，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怙勢恣睢氣焰薰灼，為害四方，不可勝言。甚至強市民物，摔捶留守與王妃爭道，拉毆墜車，皆釋不問。並有民毆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斷舌之律。若我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蒙古奉佛信喇嘛，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其呼圖克圖之相襲，乃以僧家無子，授之徒，與子何異，故必覓一聰慧有福相者，俾為呼必勒罕。（即漢語轉世化生人之義）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圖克圖。此亦無可如何中之權巧方便耳，其來已久，不可殫述。孰意近世其風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則與世襲爵祿何異，予意以為大不然。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圖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從前達賴喇嘛示寂後，轉生為呼必勒罕。一世在後藏之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後藏大那特多爾濟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對嚙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寨地方，六世在里塘地方，現在之七世達賴喇嘛在後藏托卜扎勒里岡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況一族乎？自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爾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皆以兄弟叔侄姻姪遞相傳襲，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親族，幾與封爵世職無異。即蒙古內外各扎薩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近亦有各王公家子弟內轉世化身者，即如錫呼圖克圖，即系喀爾喀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叔，達克巴呼圖克圖即系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子，諾顏綽爾濟呼圖克圖即系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卜諾們汗札木巴勒多爾濟之呼必勒罕即系圖舍圖汗車登多爾濟之子。似此者難以枚舉。又從前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後，因圖舍圖汗之福晉有妊，眾即指以為哲布尊丹巴

呼圖克圖之呼必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更屬可笑，蒙古資為談柄，以致物議沸騰，不能誠心皈信。甚至紅帽喇嘛沙瑪爾巴垂涎札什倫布財產自謂與前輩班禪額爾德尼及仲巴呼圖克圖系兄弟，皆屬有分，唆使廓爾喀滋擾邊界，搶掠後藏，今雖大振兵威，廓爾喀畏罪降順，匍匐請命，若不為之剔除積弊，將來私相授受，必致黃教不能振興，蒙古番眾猜疑輕視或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隨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誦經，將各行指出呼必勒汗之名，書簽貯於由京發去之金奔巴瓶內，對佛念經，令達賴喇嘛或班禪額爾德尼同駐藏大臣公同掣簽一人，定為呼必勒罕，雖不能盡除其弊，而較之從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間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將所報呼必勒罕之名貯於雍和宮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內，理藩院堂官會同掌印之札薩克達喇嘛等公同簽掣，或得真傳以息紛競。)去歲廓爾喀聽沙瑪爾巴之語，劫掠藏地，已其明驗，雖興兵進剿，彼即畏罪請降，藏地以安。然轉生之呼必勒罕出於一族，是乃為私，佛豈有私，故不可不禁。茲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於凡轉世之呼必勒罕，眾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掣簽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後可。予若不習番經，不能為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為過興黃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且後藏煽亂之喇嘛，即正以法。(上年廓爾喀之侵掠後藏時，仲巴呼圖克圖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齊仲札蒼等遂托占詞為不可守，以致眾喇嘛紛紛逃散，於是，賊匪始敢肆行搶掠，因即令將為首之濟仲拿至前藏，對眾剝黃正法，其餘札蒼及仲巴呼圖克圖等俱拿解至京治罪安插。較元朝之于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國政。況敢執之以法乎？我朝雖護衛黃教，正合于王制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惑眾亂法者，仍以王法治之，與內地齊民無異。試問自帕克巴創教以

來，曆元明至今五百年，幾見有將大喇嘛剝黃正法及治罪者？

天下後世豈能以予過興黃教為譏議乎？）元朝曾有是乎？蓋舉大事者，必有其時與其會，而更在乎公與明。時會至而無公與明以斷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斷而非其時與會，亦望洋而不能成。茲之降廓爾喀，定呼必勒罕，適逢時會，不動聲色以成之，去轉生一族之私，合內外蒙古之願，當耄近歸政之年，複成此事，安藏輯蕃，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予幸在茲，予敬益在茲矣。

乾隆五十有七年歲次壬子孟冬月之上浣御筆 」<sup>12</sup>

從乾隆帝這一篇《喇嘛說》掀開了多少以往大活佛、呼圖克圖轉世的不堪過程，如文中提到：「自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現在之達賴喇嘛（按係指第六世班禪羅桑貝丹耶歇及第八世達賴降貝嘉措）與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及喀爾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丹巴呼士克圖降以兄弟叔侄姻姪遞相傳襲，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親族，幾與封爵世職無異。」，從此可看出喇嘛教的活佛轉世制度，充滿算計與權謀；再看清初之所以尊崇喇嘛教，乾隆在《喇嘛說》中很直白的說出：「興黃教（指喇嘛教格魯派而言，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章嘉等皆屬格魯派），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可見清之興黃教（喇嘛教格魯派）實出於政治考量，與「供施」根本扯不上關係，乾隆這一篇《喇嘛說》等於是中國清朝中央對西藏喇嘛教（內外蒙古也多崇奉此教）的政策宣示，其對喇嘛教的具體措施，則見於《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sup>13</sup> 《大清會典》等於清朝的《六法全書》，其中《理藩院則例》就是掌理蒙、藏、回各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法典，相當齊全，現僅就其中有關管理喇嘛教及喇嘛的規定，擇出數條如次：

<sup>12</sup> 見張羽新著《清政府與喇嘛教》所附《清代喇嘛教碑刻錄》，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但此處係轉引自趙志忠《清王朝與西藏》，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年，頁28~30。

<sup>13</sup> 《理藩院則例》屬於《大清會典》之一部分，自康熙二十五年（西元1686年）至光緒二十五年（西元1899年）曾五度修訂，已增列漠北外蒙古有關規章；乾隆二十九年時三修，嘉慶、光緒時四、五修，後理藩院改為理藩部，此法典改名為《理藩部則例》。

「乾隆五十七年，高宗純皇帝平定廓爾喀後，整飭藏務，斥拉穆吹忠之妾，特頒奔巴金瓶一于布達拉大昭（大昭意為大廟，布達拉大昭，即布達拉宮），凡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西藏、蒙古各處已出數輩之呼圖克圖圓寂後，將報出之呼畢勒罕（轉世靈童）數人名字生辰，繕簽入奔巴金瓶內，令喇嘛等唪經，駐藏大臣監看，掣出一人以為呼畢勒罕。復設奔巴金瓶一于雍和宮，其內外扎薩克等所奉之呼圖克圖，如力不能赴藏識認者，即令盟長擬定報（理藩）院繕簽入雍和宮奔巴金瓶內，令掌印扎薩克大喇嘛等唪經，理藩院大臣監掣。其王公扎薩克等子弟指為呼畢勒罕及呼畢勒罕復出於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本族者，概行禁止。」<sup>14</sup>

「喇嘛服色，順治十二年（1655 年）題准，喇嘛格隆服用黃紅色，非奉上賜，不許用五爪團龍。班第用黃帽、紅衣。」

「康熙六年（1667 年）題准，喇嘛等許服金黃、明黃、大紅等色，班第等許服大紅色，其餘不得擅服。曾蒙恩賞賜者，各色均准服用，違者，大喇嘛罰牲一九，班第以下鞭一百」<sup>15</sup>

「喇嘛禁例，順治十四年（1657 年）題准，格隆、班第等如為人治病，必告知大喇嘛，即定日期，昔有私往違限，並擅宿人家，或借端留婦女於寺廟者，均依律治罪。再游方之徒不得擅留，違者亦治罪。」

「（康熙）五年（1666 年）題准，在京喇嘛等奉使達賴喇嘛地方，擅帶彼處班第等回來者，罪之。」（同註 15，頁 122）「（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諭：喇嘛每說念經可救生靈凡爾等念經殺牲供食者，豈非生靈，爾等若能不食，並傳內外寺廟眾喇嘛俱照此例，一年可活二三十萬生靈。如此乃合喇嘛之道，爾等會議具奏。京城喇嘛張家庫土克圖（按即章嘉呼

<sup>14</sup> 見嘉慶朝《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中心出版，1988 年見 84~85。

<sup>15</sup> 以上兩則見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頁 119~120。

圖克圖）、阿王巴爾柱爾庫土克圖、阿王札木素格隆等，遵旨議准，嗣後凡進內地念經，及佛生日朔望等日與往人家念經，俱停止食肉，傳知盛京、五台山、歸化城、察哈爾八旗、西安等處眾寺廟住持喇嘛一體遵行。」<sup>16</sup>

「以黃教行於蒙古、唐古特者曰喇嘛（唐古特僧宗喀巴，始以黃教授其弟子達賴、班禪，後其教遂盛，蒙古番族無不崇拜。）凡喇嘛，有駐京喇嘛（有關駐京喇嘛名號，位階等皆略），有藏喇嘛（西藏喇嘛，自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外，尚有第穆呼圖克圖，……以下略）、有番喇嘛（按指甘肅、青海、四川、雲南一帶之喇嘛）、有游牧喇嘛（說明略）凡喇嘛有行者，能以神職轉生子世曰呼畢勒罕，皆入名於奔巴金瓶而掣定焉。」<sup>17</sup>

以上只是略舉《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中極少數幾則有中國清朝對喇嘛及喇嘛的管理措施，大到對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章嘉呼圖克圖等位階極高的活佛之轉世靈童的生產方式與確認，小到喇嘛的衣著顏色，到人家中辦法事時應禁止食肉，都以法律予以規定（《大清會典》就是清代的法典），我們要問西藏流亡政府、夏格巴乃至西藏流亡政府所聘雇的洋人法律顧問范普拉赫等到底有沒有看過《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就信口開河說：

「中國和西藏僅僅是施主和福田關係，西藏根本不是中國的一部分。」<sup>18</sup>

設若中國清朝與西藏的關係，果真只是施主和福田的關係，那麼何以中國清朝也就是藏獨分子或西藏流亡政府所說的施主，可以規定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轉世靈童要按照中國中央政府所頒布的金奔巴瓶（掣簽產生），據既有文獻所載，中國清代歷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經過

<sup>16</sup> 以上見雍正朝《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

<sup>17</sup> 見嘉慶朝《大清會典·理藩院則定》

<sup>18</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30，此段話為 1949 年十月拉薩廣播電台之說詞，從此成為流亡政府作為藏獨的「理論」基礎，並用以欺騙美歐人士。

金奔巴瓶掣簽、或僅覓「靈畢特著」而特准免予掣簽者，其情形如下：

九世達賴隆朵嘉措	嘉慶皇帝頒旨免予金瓶掣簽
十世達賴楚臣嘉措	道光二年在布達拉宮掣簽
十一世達賴凱珠嘉措	道光二十一年在布達拉宮掣簽
十二世達賴成烈嘉措	咸豐八年在布達拉宮掣簽
十三世達賴土登嘉措	光緒皇帝頒旨免予金瓶掣簽
八世班禪丹白旺修	咸豐七年在布達拉宮掣簽
九世班禪曲吉尼瑪	光緒十四年在布達拉宮掣簽 <sup>19</sup>

這些都是不容否認的既成歷史，那些藏獨分子眼見史實俱在無從抵賴，於是以巧言令色的說詞，作了以下的解釋：

「西元 1791 至 1793 年之間，廓爾喀（尼泊爾）軍隊入侵西藏，當時，西藏政府請求滿清政府派兵支援；驅逐廓爾喀軍隊之後，滿清官兵以完善西藏行政為藉口，制定所謂的《二十九條章程》，要求以“金瓶掣簽”認定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其他呼圖克圖的轉世。八世達賴喇嘛江白嘉措還特別著述金瓶掣簽的修法儀軌。然而，透過金瓶掣簽認證的只有幾位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以及部分其他喇嘛。即使頒佈這樣的規則，第九世、十三世，以及十四世達賴喇嘛均未通過金瓶掣簽；十世達賴喇嘛的認定，也未經過金瓶掣簽，但為了照顧滿清政府的面子，對外宣佈以金瓶掣簽認證的消息。」

實際上，使用金瓶掣簽認證的只有十一世和十二世達賴喇嘛，其中，十二世達賴喇嘛在金瓶掣簽之前，已經認定確立。所以，真正經過金瓶掣簽認證的達賴喇嘛，其實只有一位。同樣，在班禪喇嘛的傳世系統中，只有第八世和九世班禪經過金瓶掣簽的程序。」<sup>20</sup>

<sup>19</sup> 見趙志忠《清王朝與西藏》，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 年，頁 25。

<sup>20</sup> 見 2011 年 9 月 24 日，在印度達蘭沙拉西藏流亡政府所發布之《達賴喇嘛尊者關於

當史實擺在眼前無從抵賴時，只得選擇性的作部分接受，所以只承認「實際上，使用金瓶掣簽認證的只有十一世和十二世達賴喇嘛，……在班禪喇嘛的傳世系統中，只有第八世和九世班禪經過金瓶掣簽的程序。」吾人當知中國清朝既頒下金瓶掣簽之法，西藏地方接受了這項金瓶掣簽產生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轉世靈童，就足以證明西藏地方是中國領土的事實，這項金瓶掣簽是中國清朝的國內法，國內法當然只施行於國家領土之內，「智廣如海」的達賴喇嘛豈能不知道此一簡易邏輯，但他仍高喊西藏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種說法既不合邏輯，也違背史實，騙騙外國人可以，想騙天下蒼生，恐怕不容易。請問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或洋人法律顧問范普拉赫，施主是否可以決定喇嘛教格魯派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轉世靈童的產生方式？明乎此，則所謂「施供關係」根本是信口開河一派胡言。

再從小的角度來看，喇嘛服飾的顏色，豈是施主可以決定的，如果有不遵守規者，「大喇嘛罰牲一九，班第以下鞭一百」，請問施主可以這樣種福田的嗎？除非十四世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或那洋人范普拉赫能提出中國清朝的《大清會議》是偽法典，否則「供施關係」說法就是無稽之說。

## 參、參加國民大會

國民大會是中華民國最高政權機關，其代表之產生兼顧到各省（直轄市）、各民族、各行業、婦女保障名額……等，青海、西康固然有藏族國民大會代表，西藏地方也經中央與西藏噶廈政府協調後，由噶廈負責推薦後，將名單提報全國選舉總事務下轄之蒙藏選舉事務所，其實具體工作都是由蒙藏委員會負責，西藏地方之國民大會代表，原噶廈政府提報十三名代表為土丹桑布、土丹策丹、絳巴阿旺、丹巴彭措、丹增唐格、絳巴扎喜、來希嘉措、瑣朗旺堆、班覺陳列、貢布策林、恪登班巴、凱卓坦巴、生格達結等<sup>21</sup>，另有翻譯葉肱、尼瑪、但丹三人，其後因故，西藏地方

轉世的公開聲明》

<sup>21</sup> 見祝啟源著・趙秀英整《中華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北京中國學出版社，2010年，頁315，另蒙藏委員會1971年出版之《蒙藏委員會簡史》，頁111所列名單相同。

噶廈政府只派出土丹桑布等六人參加國民大會，此六人詳細簡歷如下：<sup>22</sup>

姓名	年齡	籍貫	學歷	經歷	證書字號	備註
土丹桑布	37	拉薩	布達山大學	歷任特宗宗本及後藏糧台，現任堪穹及西藏地方政府駐京代表	藏國字 25	
土丹策丹	40	同	同前	歷任甲隅及工布宗本，現任達賴佛卓尼及西藏地方政府駐京代表	藏國字 26	
絳巴阿旺	29	同	同前	歷任羌宗及江宗宗本，現任羅札及西藏地方政府駐京代表	藏國字 27	
丹巴彭措	24	同	大吉嶺學校	西藏駐京辦事處科長	藏國字 28	
丹增唐格	32	同	同前	西藏駐京辦事處藏文秘書	藏國字 29	
絳巴扎嘉	41	同	攀布學校	西藏駐京辦事處科長	藏國字 30	

上表這六人的年籍、學歷經歷若非自行填寫，則必為噶廈政府代為填寫，而且必須向國民大會報到後始能拿到國民大會代表證書，這些都是簡易的推理，西藏地方確有推薦國民大會代表，且參與第一屆國民大會會議，此乃無可更易之史實，而且以上六人從其經歷看，幾乎都有在內地居住、生活的經驗，對漢語理應已有相當掌握，此所以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推派其為國民大會代表的原因。按漢、藏語言同屬「漢藏語系」，互相學習並無太大難處，以近一、二十年有相當多旅居尼泊爾、印度之西藏喇嘛來台「弘法」，經過三個月漢語訓練，大多已會簡單會話，這是實例。以上西藏所派六位國大代表，其能通曉漢語應屬無庸置疑者，因此可以確定西藏地噶廈政府確實曾推派六位西藏地方藏族為國民大會代表，而此六位藏族國民大會代表參與國民大會，並無語上的障礙，凡此都是不可更易的史實。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於 1946 年五月一日閉幕，共歷時三十四天，而此時國共內戰已熾，國內可說已是遍地烽火，國民政府已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撲滅戰火惟恐不及，因此這次國民大會不可能對蒙藏問題提出任何具體建議，事實雖則如此，西藏地方之有國民大會代表，並參與國民大會

<sup>22</sup> 見祝啟源著・趙秀英整理之專著頁 316。

之運作，仍是不可否認的史實。但夏格巴在其所撰《西藏政治史》中，卻罔顧史實，作了如下的記載：

「那時（係指國民大會開會期間），正在籌備召開叫“國民大會”的全國大會。蒙藏委員會說：“你們要能參加大會將很有好處。”對我們進行勸說和鼓吹。我們說，除商務外我們沒有受命參加什麼會議而拒絕了。而且，中國人準備的巴塘、理塘、波密、鄧柯、朱倭等作為康區的百姓代表的很多康巴人已經抵達南京。四品官邦達養璧動員、爭取他們大多數人不要出席。拉薩發來電報，命令向當選為總統的蔣介石和副總統李宗仁祝賀。在對電文詞句加以潤色後，西藏政府駐南京辦事處的代表堪布、淮涅和譯員三人前去祝賀。」<sup>23</sup>

看看這一段話，夏格巴輕輕鬆鬆的否定了已經發生過的事，再看夏格巴書另一段關於西藏地方是否有國民大會代表參與國民大會一事的說法：

「這時——火狗年（公元 1946 年）公歷 5 月，召開了叫“國民大會”的中國全國會議。國民黨等中國方面說：他們參加了會議，在中國人的報紙上也登載了這個消息。那時，西藏政府噶廈說：“這同西藏政府的文告和證件等命令無關。他們是不會隨便行動的。”土豬年（公元 1959 年），在印度的穆蘇里，國際法庭代表向扎薩克凱墨巴·索朗旺堆本人問起這事。札薩克凱墨巴·索朗旺堆本人作了書面答復說：“我們西藏政府只是派我們去祝賀勝利，沒有給我們參加中國大會的任何囑託和證件。那時，把扎什倫布寺的拉丈隨從和幾個康巴人說成是西藏參加大會的代表，這是偽造的。聽說他們要參加大會，為了看看他們說些什麼，我們裝著前去旁聽，被記者照了相。但根本沒以代表身份出現，對會議的決議和新憲法等沒蓋任何手印。”」<sup>24</sup>

這一段話只要稍具思考能力的人，就會發現純屬胡言亂語，試想國民

<sup>23</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33。

<sup>24</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16。

大會議場何其莊嚴，如無適當證明身份證件，如何能夠「我們裝著前去旁聽。」這分明是哄小孩的說辭，早在 1996 年，大陸西藏自治區《西藏政治史》評註小組，就對西藏地方是否派出國民大會代表，以及到京參加國民大會實際情形提出評論，茲為避免失真，將之引錄如次：

「1946 年底召開的『國民大會』上，當時的西藏地方政府早已確定派札薩凱墨·索朗旺堆、札薩喇嘛絨白倫·土丹桑培等僧俗代表十名的情況；國民黨政府的指令下，西藏地方政府在大會召開前很早就把西藏代表們途經印度加爾各答乘飛機派往南京的情況，西藏辦事處的“原任官員孜諱土丹參列、翻譯土丹森格、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的官員等到機場迎接”的情況<sup>25</sup>；甚至“西藏代表及隨從和嘉洛頓珠、平措扎西（前一人為十四世達賴之二兄，後者為達賴之姐夫，此二人均曾就讀於南京中央政治學校蒙藏班，上世紀六十代後均曾多次前來台灣）、原任辦事處兩名官員同駐藏大臣（應為駐藏辦事處處長）沈宗廉一起安置在市北面鼓樓附近一座獨院裡，並派了一位在西藏多年名叫益西白珍的漢族女士為翻譯等”情況詳盡地記載在許多漢藏原始檔案裡。只要我們從中引出幾段，以證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參加了『國民大會』的事實。」<sup>26</sup>

從而可見夏格巴所說西藏地方從未派出國民大會代表或雖派出國大代表（因為事證俱在，無可抵賴），卻狡辯「但根本沒以代表身分出現，對會議的決議和新憲法等也沒蓋任何手印。」夏格巴可以欺騙自己、可以自我麻醉，但無法纂改史實，可惜美、歐、日許多所謂「藏學學者」往往不肯深入查尋相關文獻，再加上其潛意識分化、裂解中國的立場，因此片面以為夏格巴所說者為真，盲目的支持藏獨，當然也有立場較為客觀的學者（注意，僅僅是較為客觀而已），如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於其所著《喇嘛王國的覆滅》（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一書中提到

<sup>25</sup> 原書加註稱見《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藏文版頁 11。

<sup>26</sup> 編寫組《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與西藏歷史的本來面目》，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 年，頁 170~171。

嘉樂頓珠、平措扎西以及經印度要到南京參加國民大會的代表，受到印度駐錫金政治專員霍普金森（A.J. HOPKINSON）的刻意阻擾，意在阻止渠等能及時到達南京，之後在中國駐印使館協助下，於 1946 年四月七日到達南京，受到了西藏駐京辦事處的兩名官員、國民大會秘書處及蒙藏委員會官員歡迎和接待（梅·戈爾斯坦自注係參考強俄巴·多吉歐珠《西藏代表出席國民代表大會親歷記》）<sup>27</sup>，試問這些到南京的西藏人，如不是國民大的代表，則國民大會秘書處豈會出面歡迎和接待，可惜仍未使用國民政府官方文獻，對這些西藏國大代表有否參加國民大會仍然語焉不詳。

此處且再用一分西藏駐京辦事處 1946 年一月三十一日，為西藏出席國民大會代表起程事，致蒙藏委員會代電，代電稱：

「西藏新派慶祝勝利並出席國民大會……率同隨員共約四十餘人，行將起程來京……」<sup>28</sup>

西藏駐京辦事處是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在首都所設的辦事單位，明白提出「西藏新派慶祝勝利並出席國民大會……共約四十餘人……」其有國民大會代表是鐵一般的事實，夏格巴狡猾地只承認其為祝賀勝利之代表，從而可知《藏區政治史》所敘西藏與中央關係均不可信。

#### 肆、所謂大西藏

吐蕃自松贊剛布統一諸部，並與唐朝聯姻後，吐蕃帝國確實趨於強大，唐高宗李治及武后時（西元 650~704 年）更與唐朝爭奪西域安西四鎮，唐玄宗李隆基（西元 712~756 年）末年有安史之亂，唐朝業已就弱，吐蕃大盛，占有今甘肅西部（河隴地區）、新疆天山以南各綠洲、甚至西入中亞東部地區，更一度攻陷長安，這都是史實，無需隱諱更無法否認，由於吐蕃帝國勢力之擴張，在上述地區有吐蕃人移居，也屬事實，但有吐蕃人居住之地，並不等於該地方就屬於吐蕃，我人需知古往今來從無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到這世界來時，曾帶來寸土尺地，一粒泥沙都

<sup>27</sup> 見梅·戈爾斯坦著，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北京時事出版社，1994 年，漢譯本下冊頁 568~571。

<sup>28</sup> 見中國二史館藏西藏駐京辦事處檔案 40405014 號，但此處係轉引自註 26 所列書頁 173。

不曾帶來，土地先人類而存在，土地是不動的，而人是會遷徙的，只有人屬於土地，土地從不屬於人，說某地屬於某人或某一民族，都是無稽之說，明乎此談人與土地的關係才有意義。

吐蕃王朝時期吐蕃人（即今之所謂西藏人）確實分布很廣也很零星，吐蕃王朝崩潰後，吐蕃部落林立互不統屬，因此蒙元興起後，始稱之為圖伯特，圖伯即吐蕃之另一音譯，而「特」乃蒙古語複數詞語尾綴音，證實當時康青藏地區有許多吐蕃（圖伯）部落存在，彼此既不連成一氣，而且各自為政，不僅如此，其夾雜許多其他較藏族歷史更悠久的民族，而且不僅如此，而且還曾建立政權，如早在四世紀時鮮卑族慕容部（初作東部鮮卑）之吐谷渾，即曾在今青海一帶建元立號，其後鮮卑禿髮部的南涼、鮮卑乞伏部的西秦、氐族的前秦、羌族的後秦等都曾立國或統有今甘、青地區，及至隋、唐，都納入中國版圖，自是不免有隋、唐之人移居青、康地區，唐季又有拓跋思恭一族崛起，其統治階層或與鮮卑有族緣上的關聯，但被統治階層則為党項（宕昌）羌族，其後建立西夏王朝，自元昊正式稱帝，至被蒙古成吉思汗鐵木真滅亡，享祚近二百年（西元 1032~1227 年），其統治地區正在甘、寧、青一帶，除了上述源於中國本土各民族人居甘、青、康地區之外，蒙古統治時期，曾派蒙古軍進駐西藏，即後日所謂達木蒙古。原在天山北部之衛拉特（即清代之額魯特或厄魯特蒙古）蒙古率部進入青海駐牧，除此之外，尚有來自今中亞地區為數眾多的穆斯林遷到甘、寧、青、新地區，由於為時已久，都已經成為甘、青地區的世居民族，也即都成為屬於甘、青地區之人，當然甘、青地區也有藏人，但是沒有一個民族能成為土地的主人，都只是土地的過客，土地從來不屬於人。

自 1959 年三月，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武裝的「康巴」四水六嶺衛教軍」擁簇之下（擁簇有時含有挾持之意），離開拉薩逃往印度而康巴四水六嶺衛教軍又接受美國情報單位支助<sup>29</sup>，當十四世達賴與其親屬、官

<sup>29</sup> 四水六嶺衛教軍接受美國情報單位支助一事，可參見厲聲、孫宏年、張永鑾《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四川知識出版社，2011 年，頁 193~197。另 2012 年 6 月 8 日《南德日報》以《神聖的表象》為題之報導，於 2012 年 12 月 10 日台北《世界論壇報》以《達賴喇嘛的真實形象》為題摘譯刊於第四版，此外，2012 年 3 月 6 日台北《自由時報》也有相關報導。

員、衛教軍一行六百多人，於 1959 年四月十八日到達印度提斯浦爾火車站時，十四世達賴喇嘛發表了一篇談話，在這篇談話的末段很突兀的出現一段強調其所以出逃是同意西藏地方官員的請求（刻意不提四水六嶺衛教軍，但沿途保護他的卻是衛教軍），「而不是被反動分子劫持。」<sup>30</sup>這一句「而不是被反動分子劫持」，充滿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味。從此達賴及其流亡政府在美、英、印政府操作下，走向藏獨的不歸路。十四世達賴聰明黠慧，深知從此寄人籬下必須仰人鼻息，而且在流亡政府運作下，不得不高喊西藏獨立，這是美、歐、印、日喜歡聽的口號，光喊藏獨，未必能討得美歐印日的歡心，必須把西藏範圍無限擴大，只要擴大了西藏範圍，而又訴求西藏獨立，這就等同縮小了中國（指歷史、文化的中國，不僅指今日的中共），這符合了美歐印日的潛在欲望，黠慧的達賴便提出吐蕃帝國盛時的疆域，或有藏人分布的地區為「大西藏」，但卻很技巧的避開了曾開曾經服屬於西藏的不丹、錫金、達旺、克什米爾、南疆各綠洲，乃至今中亞東部地區，如此既不得罪印度、新疆及中亞的穆斯林，又能討得美歐日的歡心，其手腕之高明，無愧於「智廣如海」達賴的名號。

1987 年九月二十一日，十四世達賴在美國華盛頓對美國國會人權小組發表演講，全世界很多人有資格談人權，但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西藏地方為了給這個十四世達賴念經祝壽，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有關部門，給熱布典頭目的一分公文，稱為了給達賴祝壽，下密院全體人員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為完成此次佛事，需於當日拋食急需濕腸一副、頭顱兩個、多種血、人皮一張，望立即送來。」<sup>31</sup>這種「法事簡直類同黑巫的巫術，執行這種儀式的「下密院全體人員」應該都是出家的喇嘛，以及經由這種有人頭、人皮、濕腸……儀式，祈求長壽者，是不是也有資格談人權。十四世達賴在這個小組的演說中，提出所謂「五點和平計畫（或方案）」，其中第一項為：「將整個西藏轉型為和平地區」，為此他進一步說明：

「我建議將整個西藏，包括東部的康和安多地區在內，轉

<sup>30</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307~308。

<sup>31</sup> 見中共 2015 年《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

型成為『阿含沙區（Ahimsa）』，這在印度語的意思就是一種和平而沒有暴力的境界。

這個和平區的建立符合西藏的歷史性角色，就是一個和平而中立的佛教國家，在這塊大陸上的強權之間做為緩衝區。」<sup>32</sup>

這就是所謂「大西藏」說，但十四世達賴刻意避開被英、印強行占領，而完全是藏人聚居的達旺地區，也不提錫金、不丹（都是說藏語、信奉喇嘛教的山間小邦，以往都向西藏地方噶廈政府繳納稅賦），因為他怕引起印度、美、歐的不愉，可見他寧可喪失西藏固轄地（如達旺），慎小謹為地不要惹得外國的不悅，但對中國大陸則大剌剌地要求將青海、康區併入大西藏，因為此舉可以討得美、歐、印的歡心，其善於察言觀色、先意承旨，也可算是蘭心慧質，但是他不知是忘了，還是史盲，歷史曾有多少非西藏人在青海建立過政權，或統治過青海，而且目前青海仍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區，豈能獨歸西藏所有，或許大西藏之說過於荒誕，在前一任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仁波切是尊稱，他自稱仁波切，也頗怪異，或許西藏僧俗高層從來不知謙虛之故），曾在新德里就「大西藏」一詞，作一場專題演講，其本意是想撇清「大西藏」並無放大西藏之意，可惜他不但對中國歷史所知有限，連對近代與西藏有關的中英有關西藏交涉過程，也幾乎茫然不知，茲且引一小段如次：

「1949 年之前的中華民國官方用語中將蒙古分為內、外蒙古，這也引用到西藏，用『內藏』和『外藏』來區分西藏的不同地區。『內藏』是指當時在中國統治下的西藏地區，『外藏』是指獨立或自治的西藏，這些用語在藏中英三方簽訂的《西姆拉條約》（1913~1914 年）文件中也曾被使用。」<sup>33</sup>

這短短的一百多字充分呈現桑東對歷史的無知，所謂「內、外蒙古」，是清康熙（1662~1722 年在位）於擊退準噶爾後，漠北喀爾喀蒙古三汗主動歸服中國清朝<sup>34</sup>，清廷遂以大漠為界，分為內、外蒙古，明載

<sup>32</sup> 見《1987 年達賴喇嘛在美國演講五點和平計畫》全文。

<sup>33</sup> 此篇演講稿可在網路上看到。

<sup>34</sup> 見張穆《蒙古游牧記》、魏源《聖武記》。

於清代法典稱：「大漠以南曰內蒙古，為部二十有四，為旗四十有九。……逾大漠曰外蒙古，喀爾喀四部附以二，為旗八十有六。」<sup>35</sup>並不是中華民國時期創下的「官方用語」。至於「內藏」、「外藏」二詞，則是民初英帝國想沿外蒙古被俄國挾持宣稱獨立，而創造出「內、外藏」二詞，何況所謂《西姆拉條約》中華民國始終沒有簽字，根本是一分不存在的條約<sup>36</sup>，桑東居然引用西姆拉會議中英帝國所界出的「內藏」、「外藏」，顯然是心存藏獨想法，在中國任何文獻中從未出現這兩個詞稱，桑東卻將之作為說詞，關這一點夏格巴倒說了一些真心話，他說：

「雖然中國代表陳貽範草簽了《西姆拉草約》，但（他）收到中國政府不在正式條約上簽字蓋章的命令，故未簽字。」<sup>37</sup>

可見桑東比夏格巴要差了一截。夏格巴於 1950 年九月八日拜會了印度總理尼赫魯，夏格巴說：「木虎年（1914 年）《西姆拉條約》談判時，英藏雙方單獨簽的條約規定，取消中國政府在西藏境內的一切權力，就是取消了所謂宗主權，迄今西藏享受著獨立自主。」尼赫魯總理說：「那種所謂“單獨簽的約條”不存在，中國人不接受《西姆拉條約》，在中國看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在西藏看由於中國人不接受《西姆拉條約》，故單獨簽一個條約，就算是獨立，這就導致了那時未能得到明確解決的毛病……」（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第二冊頁 235），從此可看連印度尼赫魯也認為《西姆拉條約》未經中國政府正式簽字，根本就是無效的條約，而桑東竟然拿這個無效的條約中的所謂「內藏」、「外藏」來作為「大西藏」的依據，桑東應該好好讀一些有關中英有關西藏交涉的文獻。再看桑東在這演講中明白的說出：「達賴喇嘛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把所有藏族自治區域都置於一個自治機構的管轄下。真正實施《憲法》賦予的民族區域自治權。」現在且看在中國大陸除了省級的西藏自治區外，在鄰近的青海、四川、甘肅、雲南等省還有屬於省而與藏

<sup>35</sup> 見清嘉慶朝重修《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按《大清會典》等於是清代法典彙編。又、三音若顏部（不稱汗）係雍正時增設。

<sup>36</sup> 關於《西姆拉條約》詳細情形，可參見羅家倫（曾任駐印度大使）所撰《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此文完稿於 1950 年 9 月 22 日，此文輯入羅氏《交響樂的震盪》（1），台北雲天出版社，1971 年，頁 59~87。

<sup>37</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163。

族及其他民族合設的自治州，或者雖是藏族自治州，但州內又有其他民族自治縣，或者雖以藏族為名的自治州，但藏族人數較其他民族人數少，茲將各自治州情況及其面積以表列方式呈現如下：

省名 /自治州情況	自治州名稱	州以下其他民族自治單位	面積（平方公里）
青海省	海北藏族自治州	門源回族自治縣	39354
	海南藏族自治州		45895
	黃南藏族自治州	河南蒙古自治縣	17921
	果洛藏族自治州		76312
	玉樹藏族自治州		188794
四川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325785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84242
	甘孜藏族自治州		152629
甘肅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		40201
雲南省	迪慶藏族自治州	維西傈僳族自治縣	23870
備註	以上資料係錄自北京中國地圖出版，2011 年出版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手冊》。		

以上四個省份裡有關藏族的自治州（其中居民並非全為藏族，不僅有其他邊疆少數民族，當然也有漢人），共有十個，合計其面積廣達九十九萬五千零三平方公里，幾乎有三十個台灣大，桑東說：「達賴喇嘛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把所有藏族自治區域都置於一個自治機構的管轄下。」請問這不是「大西藏」嗎？，達賴喇嘛何以不向印度討回純藏人聚居的達旺地區？只向中共要求把所有藏族自治區域都置於一個自治機構的管轄下，顯然不脫其藏獨意識，西藏流亡政府或十四世達賴如果真要搞藏獨，應該像老台獨史明所說的：「西達賴回去西藏打游擊，西藏獨立才會成功。」<sup>38</sup>史明這話說在刀口上，不論搞獨立或鬧革命，不是在境外找洋人喊喊就可以達到目的。

<sup>38</sup> 見 1997 年 3 月 25 日，台灣《台灣日報》

## 伍、結語

吐蕃（即西藏）在七、八世紀時，確實有一個很強盛的國家，曾兩度與唐帝室聯姻，吐蕃與大唐是甥舅關係，但彼此均無統屬關係，及至吐蕃朗達瑪滅佛，吐蕃王朝隨之崩潰，部落林立各自為政且互不統屬，及至蒙元崛起，降於蒙元，納入中國元朝版圖，元朝中央設立總制院（稍後改為宣政院）管理今西藏、康區及青海等地之地方行政事務，管理今西藏地方的機構稱烏思藏宣慰司，另以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吐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分別管理朵甘思與脫思麻地區（此兩處約略為後日之西康、青海地區），這三個機構平行分列，統屬於中央的宣政院（約略等於清代的理藩院），西藏、青海、西康屬於中國元朝，是無可置疑的史實。中國明朝確實未曾實質統治今西藏地方，這也是無可諱言的史實，但西藏地方噶舉派，薩迦派高位階的喇嘛，都接受了中國明朝給予的封號，這些封號一直沿用到今天，如噶舉派的大寶法王，至今已傳了十七世；此外，中國明朝在朵甘思地區設立朵甘指揮使司（後升格為朵甘都指揮使司）<sup>39</sup>，這也是無可爭議的既有史實，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政府在海外經常宣稱：西藏自古以來就「主權」獨立的國家（按「主權」一詞乃近代歐洲民族國家興起後，始有之詞彙，西藏自古以來怎可能擁有未曾出現的「主權」？），我們且看和碩特蒙古固始汗（或作固實汗、顧始汗）率兵入藏之後，喇嘛教格魯派五世達賴喇嘛他說：

「壬午年（按係 1642 年，明朱由檢崇禎十五年，後金皇太極崇德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藏地所有木門人家王臣上下，均改善傲慢之容，俯首禮拜，恭順歸順，……汗王（按係指固始汗）即成為全藏三區之主（按三區係指衛藏即西藏地方、康區及安多）之主，王令如大白傘，覆蓋於三界之頂首。」<sup>40</sup>

五世達賴喇嘛乃是喇嘛教格魯派最有名氣之喇嘛，他稱固始汗是全藏三區之主，王令如大白傘，覆於三界之頂首，十四達賴只是他第九世化

<sup>39</sup> 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一《百官志》三《宣政院》

<sup>40</sup> 見五世達賴喇嘛著、劉立千譯注《西藏王臣記》，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年，頁 128，按本書原名《天神王臣下降雪域（西藏）陸地事迹要記——圓滿時節，青春喜筵之杜鵑歌聲》，因書名太長，遂簡化為《西藏王臣記》。

身（如果轉世之說為可信），是則何來「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之說，除非先要證明五世達賴喇嘛說的是謠言，否則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政府就應收回上項說詞。現在且看進一步看，固始汗只是衛拉特蒙古（入清後作額魯特或厄魯特）四部中和碩特部之長，論實力較準格爾部的巴圖爾鴻台吉或僧格要差一大截，更不是全蒙古的汗，因此才要遣使到盛京（今遼寧瀋陽）向後金（即稍後的清朝）進貢示好，西藏如何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及至順治入關，改國號為清，成為中國正統王朝之一，順治、康熙之時（1644~1722 年）容或未曾真正統治西藏，因此對五世達賴喇嘛進京（北京）給予優越的禮遇，此乃有其政治目的，正如本文前段所乾隆御撰《喇說》中所稱：「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但到雍正時（1723~1735 年在位）正式將西藏納入版圖，並在拉薩設立駐藏辦事大臣衙門，派大臣駐藏辦事<sup>41</sup>，雍正四年（1726 年）中國清朝中央政府因西藏地方發生動亂，遂直接調整西藏與其與周邊四川、雲南、青海等省區的行政區劃，將巴塘一帶劃歸四川，將靠近中甸（今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縣），原屬巴塘之奔雜拉（奔子欄）、祁宗、喇普、維西（今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維西傈僳族自治縣）、阿墩子等處劃歸雲南省<sup>42</sup>；設若西藏不屬於中國，清朝中央政府豈能如此調整地方行區劃，可見所謂「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說法，只是夢幻般的囁語，也只是自欺欺人，完全經不起檢驗；這些地方被劃歸四川、雲南至今（2016 年）已經兩百九十年，比美國立國還久，而今西藏流亡政府或十四世達賴竟想將這些地方恢復為「大西藏」，怎有可能。

當然中共入藏前後，西藏情勢絕不止以上四項，限於篇幅本文僅就以上四項加以敘述，以後如得暇，當另行撰文予以評敘。

<sup>41</sup> 關於何時設置駐藏辦事大臣及其職權為何，可參見趙志忠《清王朝與西藏》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 年，另也可翻看《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

<sup>42</sup> 見張云《再論西藏行政區劃與大西藏問的》一文，該文輯入張著《西藏歷史問題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頁 278。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木雕的雄獅，雖兇誰又怕（藏族）

吹得比山還大，做得比羊還小（藏族）

內奸作怪，外敵得逞（白族）

吃家裡的飯，敲廟裡的鼓（僥倖族）

老鼠替貓生崽（毛南族）

外患易治，家賊難防（蒙古族）

積累財產，不如積累知識（烏孜別克族）

知識是燈，不撥不亮（維吾爾族）

羊靠草原，人靠知識（塔吉克族）

武器越擦越亮，道理越辯越明（壯族）

一株榕樹九百條根（侗族）

滿樹的紅果，不是一朝的露水（維吾爾族）

井水不出魚，枯樹不開花（蒙古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貢桑諾爾布、河源操子與崇正學堂

劉學銚  
前輔仁大學兼任教授

## 摘要

貢桑諾爾布為清季民初內蒙古「名王」首開辦學之風，且曾聘日本女子河源操子為教師，此女乃是日本間諜，在日俄戰爭時，為日本提供頗多情報；辛亥武昌首義之後，貢桑諾爾布也曾想搞內蒙獨立，嗣袁世凱任之為蒙藏事務局、蒙藏院總裁，從此不再談內蒙獨立。崇正學堂，毓正學堂培植不少蒙族俊彥，就培植蒙古人材而言，貢桑諾爾布居功闕偉，本文擬就貢王其人、河源操子及崇正學等相關事宜，就既有資料加以敘述。

**關鍵詞：**貢桑諾爾布、蒙藏院、河源操子、崇正學堂

### 一、貢桑諾爾布

貢桑諾爾布，號夔盦（音癸庵），又號樂亭，生於清同治十年（1871年），卒於民國十九年（1930年其圖像所見附圖，此圖係採自《內蒙古近現代王公錄》），得年六十歲。提起蒙古喀喇沁部，頗有來頭，喀喇沁部姓烏梁罕氏（全稱為烏梁罕濟爾默，不可與林木中百姓混為一談，而烏梁海有三部，曰唐努烏梁海、曰阿爾泰烏梁海、曰阿爾泰淖爾烏梁海；與烏梁罕濟爾默氏完全不同，前三者係蒙古別支，也即原非蒙古而歸於蒙古者，而烏梁罕濟爾默氏乃是本支），雖非「黃金氏族」的博爾濟錦氏（或作博兒只斤代），卻是勸助成



貢桑諾爾布（青年時）

吉思汗鐵木真大有功者，《蒙古源流》一書稱：鄂爾多斯部為成吉思汗守禦八百室之人，而烏梁罕氏則為成吉思汗守金穀倉庫之人。可見成吉思汗時代喀喇沁部先祖就極受成吉思汗之重視與信任。當時其人為烏梁罕濟拉瑪，七傳至和通，有部六千戶，駐牧額沁河一帶，號所部曰喀喇沁。

濟拉瑪十四世孫蘇布地，於後金（即後來之清）皇太極天聰初（天聰共十年，1627~1636 年）因不堪察哈爾林丹汗之虐用其眾（林丹汗為最後一位蒙古大汗），蘇布地率同族色棱及所部歸降後金（清），後金將之編為三旗，不久，蘇布地卒，天聰九年（1635 年）以蘇布地之子固嚕思齊布掌右翼（右旗），授扎薩克，皇太極崇德元年（1636 年，係天聰十年改元崇德元年），封固嚕思齊布為固山貝子（按清朝爵位分：親王、郡王、貝勒、貝子、輔國公及鎮國公六等），賜多羅杜棱號；入關改國號為清（事在順治元年，西元 1644 年），順治九年（1652 年）晉爵貝勒、固嚕思齊布卒，其子圖巴色棱、班達爾沙、扎什相繼襲扎薩克及貝勒職爵，康熙七年（1668 年），追敘蘇布地率先來降之功，晉班達爾沙為郡王，世襲罔替（即所謂「鐵帽子王爺」，也就是不因承襲世代而降其爵位等級），從此代代承襲，傳至十二代時為旺都特那穆濟勒，除擁有郡王爵位外，還是卓索圖盟右旗扎薩克並兼盟長，而且還娶滿清皇室禮親王之妹為福晉（夫人），因此又得到「御前行走」的頭銜，每年需晉京值班，以是與朝廷王公貴戚過從頗密，染上當時滿族高層的許多習俗，尤其酷好京劇（初稱皮黃），不惜巨資在王府偏院修建一座富麗堂皇的戲園子，題其額曰《燕貽堂》，更從北京聘京劇師父，琴師到王府教授蒙人平民子弟演唱京戲，這些蒙人小孩連漢語都說不流利，要他們唱唸咬字特殊的京劇戲文，有其相當難度，可以想見這些被選來學戲的蒙古孩子，在學戲過程中，肯定很受了些皮肉之苦，不過京劇四大名鬚生中的馬連良就是蒙古族（見郭卿友主編《中國歷代少數民族英傑傳》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旺都特那穆濟勒郡王似乎有虐待狂，每當用餐時，一定要將伺候的奴婢打得頭破血流，他才吃得下飯（見吳恩和、邢復禮《貢桑諾爾布》，文載《內蒙古文史資料》第一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01~117），這不僅是怪癖，已經是變態了。

貢桑諾爾布生長於這種家庭中，理應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然而不然，旺都特那穆濟勒郡王他個人雖然沈緬於戲劇且有虐待狂，但對兒子的教育卻極重視，在貢桑諾爾布六歲那年，就從山東聘請一位丁姓舉人為其子的啟蒙老師，教以漢文典籍，又從喀喇沁中旗請蒙古學者伊成賢教授蒙文、滿文，而貢桑諾爾布雖非天資敏慧，但卻沒有染上乃父的習尚、嗜好，他循規蹈矩朝乾夕惕，孜孜不倦努力向學，十四、五歲時已經熟讀四書五經及一些古典詩文，也能作八股文、試帖詩；此時其父又要他師從一位在西藏住過多年的喇嘛學習藏藏文經卷，不僅如此，其父又從直隸請來一位武術名家（直隸，即後來的河北省），教他武術與騎射，因此，貢桑諾爾布在十四、五歲時，可說是通曉漢、蒙、滿、藏四種文字，熟讀傳統經典，而又練就武術騎射，不只文武兼質，而他天性不善侈糜浮華，可稱得上品學皆優的青年才俊。

貢桑諾爾布十六歲，蒙朝廷重視，承清朝建國以來所秉持的「滿蒙聯姻」的「國策」，把肅親王的第三女善坤格格（依清制郡王、親王之女，可稱格格）嫁給他。婚後貢桑諾爾布仍常在外書房練習書法（貢王書法如附圖，頗具名家架勢，本圖採自《內蒙古近現代王公錄》）、繪畫，同時研究詩賦的音韻與格律，許之為多才多藝，絕不為過。據傳說貢桑諾爾布的婚姻生活並不十分美滿，因為肅親王的三格格善坤，自恃高貴，相當驕縱，對貢桑諾爾布有時不免頤指氣使、妄自尊大，貢桑諾爾布雖心中不滿，但懾於岳家的地位與聲望，也只好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形之於色。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卓索圖盟盟長旺都特那穆濟勒因病辭世，翌年貢桑諾爾布晉京並正式承襲喀喇沁郡王爵位、右旗扎薩克職位，時年二十七歲，返回喀喇沁右旗後，對其父生前的一些苛刻措施，立即予以改善，取消了王府裡下人每人每天只有兩杓小米飯的秕政，也減免了旗民無限制的差徭，而改善定額制，雖然仍屬剝削，但對旗民而言已經是莫大的「仁政」了，同時貢王也解散了戲班子，把那演員都資遣回家，使喀喇沁右旗有了一股新氣象，而旗民也可以好好喘口氣，旗民對這位年輕的貢桑諾爾布王爺有了良好的印象。



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由於義和之亂，引起美、日、英、俄、法、德、葡、義等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失守，慈禧太后、光緒帝蒙塵西去西安避難，北京圓明園遭到毀滅性的破壞，貢桑諾爾布得知深感朝廷已不足恃，必須自行設法，始能保護自身、地方及旗民的安全，於是興起練兵圖存念頭。八國聯軍之役，後來在清廷大量賠款之下（以歲在庚子，故稱庚子賠款，民國肇建仍在支付此項賠款），總算退出北京。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貢桑諾爾布（以下均簡稱貢王）又晉京，會見了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透過袁世凱之介紹，以重金禮聘保定武備學堂畢業的周春芳為軍事教官，與之一起返回喀喇沁右旗，貢王將王府內的衛兵、青壯差役，以及在旗內挑選一批青年，交由周春芳訓練，由於有了統一的服裝、槍械，在周春芳嚴格訓練之下，成了一支小規模「現代化」軍隊，這一支軍隊後來在保衛地方治安、剿滅土匪等方面，發揮了相當的功能。其後周春芳可能辭去教官職務，貢王於光緒三十年冬（1904 年）利用其三叔（俗稱宮城三爺）在王府西邊大西溝門的舊官邸，設立了守正武備學堂，選拔喀喇沁右旗官員子弟三十人入學，透過日本福島中將介紹，延聘日本陸軍大尉伊藤柳太郎、陸軍少尉吉原次郎為正副教官，又聘能說日語的浙江錢塘人姚子慎為翻譯官，完全抄用日本陸軍操典，這個守正武備學堂，可以說是完全日本化的軍校。

貢王之所以認識福島鞏將，是緣於前一年（1903 年，光緒二十九年）秋，日本神戶舉辦博覽會，經過日本駐華公使內田藤哉的邀請，貢王與外蒙古三音諾彥部（注意此部不稱汗，其所以有所謂「三音諾彥汗」者，是五世達賴喇嘛，以此部之長圖蒙肯護持喇嘛教格魯派，予以賽音諾彥之號，此係蒙語，意為好長官，要該部蒙人奉之如三汗，三汗指漠北車臣汗、土謝圖汗及扎薩克圖汗，詳見張穆《蒙古游牧記》，蒙藏委員會 1981 年校訂再版，卷八頁 163）駐京代表那彥圖親王之子祺承武，肅親王善耆之長子憲章等一批貴胄，各帶僕從，在未經朝廷許可下，私自從天津搭船前往日本，在日期間與日本朝野頗有接觸，特別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次長福島中將建立了頗密切的關係，按日自明治維新以來，野心勃勃，不僅要侵占我國東北、內蒙古，更志在吞併整個中國，貢王一行既到日本，則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豈有不善加接待（利用）者？與外國官員來往，絕無

私人感情因素，此所以次年（1904 年）貢王設立守正武備學堂時，託福島中將推薦教官，立即推舉了大尉伊藤柳太郎及少尉吉原次郎二人，而這兩個日本軍官和河原操子一樣，都負有間諜的任務，貢王府成了日本間諜潛伏中國的大本營。

貢桑諾爾布郡王深感蒙古人知識落後，因此決心興學，先後興辦了崇正學堂及毓正女子學堂（詳下文），同時又辦報刊名曰《嬰報》隔日出刊一大張，除報導國內外重要新聞外，也刊載科學常識、蒙古各盟部旗動態（當時察哈爾、呼倫貝爾、東、西布特哈都是部）及時事評論，以贈送方式大量散發，此一舉措就當時而言，是相當先進的作法，令人欽敬，除此之外貢王也創辦郵電、開工廠、設商店等「現代化」措施，更在貢王府內建置類似圖書館的藏書室，不惜巨資在北京購買《圖書集成》、《佩文韻府》等大部頭珍貴書籍，備供他所創辦幾個學校師生閱讀，這種情形可說是空前的，即使時至今日，兩岸的中等學校書圖館恐怕還未必會有《圖書集成》這一類大部頭叢書，從而也可以看出貢王的眼光，當然這些「壯舉」的出發點是貢王不是守財奴，古往今來有錢人從來沒少過，但是卻很少人肯拿出錢來為眾人鄉里做些有益的事，貢桑諾爾布之所以成為清末名王，應是實至名歸。辦理這麼多事業，當然都要有預算支持，貢王縱然富有，要支付這麼多的開銷（三個學堂學生的食宿服裝書籍、教師薪資、報紙……），兩三年之後已經捉襟見肘，既無從節流，則只有設法開源，起初貢王把王府珍藏的古玩字畫拿到北京去賣，但是所得無幾，這種一次性的收入，對源源不絕的財政缺口毫無幫助，為解決財政危機，想出了要把旗若干荒地招募漢人前來開墾，按畝收租，以地租收入彌補財政缺口，雖然旗下官員多不贊成，但貢王還是決定要這麼做，唯其如此，那幾所學堂才得以繼續辦下去。

光緒三十二年（1906 年）理藩部（原理藩院，光緒推行「新政」時，改稱理藩部）尚書肅親王善耆（也是貢王的岳父）奉旨為欽差大臣巡查邊境，善耆從北京出發，先到喀喇沁右旗貢王府，任貢王為欽差大臣的隨員，與欽差大臣肅親王一起視察了卓索圖、昭烏達、哲里木三盟的若干旗，在與各旗王公接觸中，讓貢王對地方實情有較深刻的認識。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先後崩殂，溥儀入承大統，改元宣

統，軍諮府大臣貝勒載濤奉命建立皇宮禁衛軍，命貢王協助召募旗兵，貢王從旗中精選三百名青壯送入宮中，編為禁衛軍馬隊第三營，貢王因此為任命為「御前行走」，也因此必須在京「當差」，屬於駐京蒙古王公班列。喀喇沁右旗旗務則交由協理台吉希理薩拉代理。

此時國內已是革命浪潮洶湧，宣統三年（1911 年）歲次辛亥，武昌槍響革命成功，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此時清廷北洋大臣袁世凱手握新軍，孫中山先生為免南北對峙而使生靈塗炭，原意讓出臨時大總統之位予袁世凱，換取清帝宣佈退位，且袁氏必須在南京就職，並實行責任內閣制，但袁氏狡猾逼迫宣統退位後，藉口北方不靖必須在北京就職，際此朝代更迭之時，外蒙古在俄國誘撫蠱惑之下，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布獨立，並發函漠南內蒙古王公響應其獨立，此時貢桑諾爾布郡王心中不免有所震動，也想有所作為，民國元年（1912 年）正月，貢王向北京日本正金銀行貸款銀元三萬兩，並與日本泰平公司簽訂購買槍械彈藥的合約，言明這批槍械彈藥在南滿鐵路鐵嶺車站交貨，由貢王派人點收，不久貢王與逗留北京的巴林旗王爺扎嘎爾，回到喀右旗，準備以購來的這一批槍械彈藥，在原有的基礎上，再擴招人馬，準備進行內蒙古獨立（以上參採自吳恩和、邢復禮《喀喇沁親王貢桑諾爾布》一文，該文輯入《內蒙古近現代王公錄》，列《內蒙古文史資料》第三十二輯，1988 年，頁 1~15，與《內古文史資料》所載《貢桑諾爾布》一文大同小異），此為內蒙古首度有檯面上人物懷有獨立思想者。貢王回到喀右旗後，召集旗內高級官員舉行秘密會議，宣布他關於內蒙古獨立的主張，他說：

「這幾年來，開辦學校、訓練軍隊、振興實業，這一切都是為了蒙古民族獨立做準備工作，現在清朝顛覆，民國肇建，外蒙獨立，正是我們行動起來的好機會，如果再拖延下去，就要前功盡棄了。由日本泰平公司訂購的槍支彈藥，即將運來，需要派人去取，希望你們深思熟慮……」（見《喀喇沁親王貢桑諾爾布》一文，頁 12）

貢王這一番慷慨陳詞，並沒有得到回響，眾官員都認為這是造反，一旦失敗恐有抄家滅族之禍，這一場秘密會議就此不歡而散。

後來喀右旗內更有人揚言，「誰要給王爺去辦理武器的事，我們就暗中派人在茅金壩上劫殺」，貢王聽到這些流言之後，極為沮喪，但接收武器之事，又不能不辦，於是找了四個崇正學堂學生（其中有一個就是吳恩和，《貢桑諾爾布》一文作者），密談了幾個鐘頭，終於同意前往鐵嶺接收武器，這四人立即動身，先到北京改搭火車到鐵嶺，在鐵嶺等了幾天，毫無消息，只好回到北京，再以信函向貢王報告。之後始知日本泰平公司並沒有依照合約把武器運到南滿鐵路鐵嶺車站，而是把武器裝在十幾個木箱裡，在木箱外寫著「東蒙古開墾用新式農具」字樣，分載在十幾輪大車上，由十幾個改穿中國服飾的日本浪人押車，走到鄭家屯附近時，被吳俊升的部隊查獲，沒收了槍枝，槍決了押車的人。消息傳到後，貢王極為悲觀，內蒙古獨立之夢徹底破滅了。

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後，於民國元年（1912 年）三月立即在內務部下設蒙藏事務處，負責處理蒙藏邊疆事務，至同年四月任命奉天民政使張元奇為內務部次長，專責蒙藏事務，七月經參議院決議，改蒙藏事務處為蒙藏事務局，直隸國務總理，任命姚錫光為蒙藏事務局副總裁並兼署總裁，同年九月又改任命貢桑諾爾布郡王為蒙藏事務局總裁，民國三年（1914 年）五月一日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公佈《中華民國憲法》，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五月四日改蒙藏事務局為蒙藏院，仍以貢王為總裁，熙彥為副總裁，直隸大總統，之前袁世凱為爭取蒙古王公勸贊共和，對蒙古王公爵秩均加一等，所以此時貢桑諾爾布已是親王，袁世凱之所以任貢王為蒙藏事務局、蒙藏院總裁，是否已探悉其心懷異志，因而有意加以籠絡，目前因資料不足，難以判定。

貢王自當上蒙藏事務局、蒙藏院總裁之後，自是絕口不提內蒙古獨立之事，其後北洋政局雖動盪不定，1924 年貢王不知何故辭去蒙藏院總裁，同年三月大總統曹錕任阿拉善旗扎薩克塔旺布魯克扎勒親王（原為郡王，袁世凱時晉一級為親王）為蒙藏院總裁，但不久直奉戰爭爆發，段祺瑞上台，塔王辭職，復以貢王為蒙藏院總裁，直到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定都南京成立行政院，北洋政府自是消失，此時貢王始離開政府機構，不過仍發表貢王為北平蒙藏學校校長，嗣因學生反對而辭職。貢王晚年生活頗坎坷，原有家財都被福晉善坤格格納入私囊，而向日本正金銀行及俄國道勝

銀行的貸款利息，像兩座大山一樣壓到他的身上，幾乎讓他喘不過氣來，只得縱情詩酒以為排遣，有時且不免進入秦樓楚館，這與他當年在喀喇沁草原銳意革新、造福旗民、培植後進，落差何其大，大有彼時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貢王自被北平蒙藏學校學生反對憤而辭職後，憂鬱成病，於民國十九年（1930年）秋因腦溢血死於北平府邸，得年六十歲。其長公子篤多博一家1949年後來台。

## 二、河源操子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國勢頓強，而野心更大，妄想吞併中國稱霸世界，要吞併中國必得從東北、蒙古著手（美、歐、日帝國主義者，喜用具有分化意味之「滿蒙」），為達此目的，對中國之滲透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1903年貢桑諾爾布經日本駐華公使內田藤哉邀請下，和幾個蒙古王公私自到日參觀神戶博覽會，認識了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次長福島中將（顯然是日本刻意安排），遂要福田推薦兩個軍官到喀右旗為其所設守正武備學堂擔任教官，這當然正中日本軍方下懷，於是推薦了伊藤柳太郎及吉原次郎到喀右旗，為貢王訓練了一批純日本化的軍人，可是次年（1904年）發生日俄戰爭，這兩個日本軍官都另有他用，而離開貢王府。貢王到日本參觀博覽會期間，在東京會見了東京實踐女子學校校長田歌子，暢談了女子教育的重要，貢王深以為然，於是興起要辦女子學堂的念頭，回國後就著手創辦女子學堂，把原戲園子燕貽堂改為校舍，取名毓正女子學堂，有學堂就得有教師，又是透過福島中將的介紹（福島中將是根據吳恩和《貢桑諾爾布》一文，但邢復禮《清末日本女間諜河源操子在喀喇沁的活動》一文，則稱其名為福島安正，是大將且為陸軍參謀本部部長，者略有出入），把受過訓練的河源操子推薦給貢王，此時河源操子正在上海務本女子學堂任教。

河源操子生於日本信州松本藩的一個士族家庭，當時日本國民分為華族、士族和平民三個階級，所謂華族應是貴族，士族則指古代的士人，其父河原中與福島安正是自童年以來就是好朋友，經常一起研究中國哲學以及中日兩國關係，他們兩人都以「中國通」自居（日語稱「支那通」），也是日本明治大帝大陸政策（就是侵略中國政策）的忠實擁護者與執行

者，因而交稱莫逆，1901 年左右福島連續派出好幾批特務間諜潛入中國，測繪山川地形、調查民情風俗，對於蒙古、滿洲王公更是極盡利誘之能事，河原忠就將獨生女河源操子交給福田調教，使之到上海務本女子學堂任教，就在日俄戰爭前夕，貢王創辦毓正女子學堂，向福島要求推薦女教師，這對福島而言正是求之不得的事，立即把河源操子推薦給貢王，於是她也以貢王府教育顧問與毓正女子學堂教師雙重身分，堂而皇之進駐貢王府，除了教書之外，進行了一連串間諜活動。

日本人向來講究禮貌，何況河源操子又經過「專業」訓練，無論言談舉止，都會使人對之產生好感，不僅毓正女子學堂的學生對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感到贊賞羨慕，就是貢王福晉善坤格格對之也疼愛有加，可見她在處人方面確實下過一番工夫，當時不過是一個還不滿二十歲的女孩子，可見日本對間諜的培訓是很踏實的，這是我們不得不予承認的。當日俄戰爭爆發後，原來在喀右旗的伊藤柳太郎與吉原次郎不得不離開，日本在東北的間諜網等於有了缺口，這下河源操子正好補了這個缺口。

日俄戰爭前，由於俄國在外蒙古已經下了很多工夫，如俄國駐外蒙古庫倫領事就經常送禮物給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以討其歡心，因此外蒙古蒙人普遍對俄國存有好感，俄國之所以如此，也不懷好意，想要併吞外蒙古，俗語說如欲取之必先予之，正是此意，外蒙古蒙人不知俄國之用心，有外人到內蒙古東部盟旗活動時，常會宣揚俄國之友好，因此多少影響到東部內蒙古王公對俄國懷有好感，而俄國軍方也經常派人派人偽裝成英國人、法國人、比利時人、道勝銀行或俄清銀行行員，頻繁出入卓索圖盟喀喇沁各旗，蒐集情報，這是日俄戰爭前夕，日俄雙方都在內蒙古東部進行間諜活動，表面上看似風平浪靜，骨子裡卻是劍拔弩張，不但蒙古王公不知情勢險惡，連清廷也莫之或知。日本既有意要侵占東北，對俄國動態以及蒙古王公對俄國的態度，都認為是極重要的情報，對未來日俄一旦發生戰爭，這些情報都會影響到戰爭的勝負，河源操子雖深居貢王府後院，但絕不放走任何機會，把所探聽到俄國人的動態、以及蒙古王公對俄國的態度，點滴不露地向日本駐北京使館報告，這對由北京潛入內蒙的日本挺進隊的行動，提供了有利的作用。

所謂挺進隊，又稱特別任務班，是日本對俄宣戰後，由日本駐北京使

館武官室在極機密的情況所組織起來，其主要任務是要炸毀東北的東清鐵路鐵橋，使戰爭時俄國軍隊、物資無法南下，隊員總數約有四十人，分為四組，其中除第二組外，第一、三、四組都經過喀喇沁右旗貢王府，河源操子都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試想蒙古王公原本都比較傾向俄國，而河源操子居然能夠讓三組挺進隊人員經過王府，可見她對貢王及其福晉作了多大的工作，在日俄戰爭中，貢王等於站在日本這一邊。

河源操子爭取貢王，確下了很多工作，據邢復禮先生所撰《清末日本女間諜河源操子在喀喇沁的活動》一文，所載河源操子從貢王府送往北京日本駐華使館一份情報中的一段節譯如下：



貢王夫婦及河源操子（後立者）

「喀喇沁右旗的一般旗民不知道日俄戰爭為何事，對於大炮、地雷、水雷等近代戰爭武器，更是聞所未聞，即使勉強加以說明，他們也很難理解。對於這一次選爭的態度，與其說冷淡，莫如說漠不關心。他們把戰爭看成“春風吹來”那樣簡單。至於王府的官吏們，則恰恰與此相反，他們很了解選爭的意義，更清楚俄國的現狀，認為俄羅斯

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富強之國，蕞爾日本，非其所敵，可能俄國在戰爭中操必勝之券。所以很大一部分人對俄國表示好感，對日本則懷有敵意。這一事實說明，俄國人對這些化外民族的懷柔羈縻政策，取得相當成功，而日本人則瞠乎其後矣。

據說先王（按指貢王之父旺都特那穆濟勒）在晉京參觀的時候，俄國駐京公使，必饗以盛宴，殷勤款待，在回旗時，還要饋贈程儀四千兩，以壯行色。此項饗宴和饋贈，雖公使更迭，亦照例如此，從不間斷。因此旗官的大部分有親俄排日的傾向。喀喇沁王和福晉，固極賢達，然俄國多年來的懷柔與籠絡，已經給他們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在此日俄畔端已開的緊要關頭，舍彼就此，立即轉變為日本的同情者，不是那麼容易。當我以日本與朝鮮的關係為例，反復說明以後，喀喇沁王和福晉，不顧臣僚們的反對和阻撓，已首肯背俄支日，我們的

初步工作已獲得成功。我們日本朝野，對於喀喇沁王的善意殷殷，應表示十二分的感謝。

在表面戰場上，有很多愛國勇士，壯烈犧牲，在背面的戰場上（按這是指挺進隊及間諜），也有不少的志士，縱橫活躍。現在這些人所組成的特別任務班第一組，已於二月二十日到達喀喇沁王府，第二組已由熱河出發，正向東方挺進，第三組於三月十二日，第四組在二十日先後均到達喀喇沁王府，並已做出最後部署，整裝待發，此次深入虎穴，今後所履的艱險，絕非筆墨所能表達。」（見邢復禮所撰專文，頁 128）

在這一份情報中，可以看出在日本人眼中，蒙古人只是「化外民族」，而河源操子能把原先傾俄排日的喀喇沁王及其福晉，經游說後「轉變為日本的同情者」，可以想見其過程必甚艱辛，同時也可推知河源操子必然有淵博學識與邏輯嚴謹的口才，否則不足以說服也是滿腹經論的貢王。日本、美國、英國、俄國謀奪或分化我內外蒙、西藏、新疆、東北（這些帝國主義者都稱之為滿洲，甚至把新疆稱之為東突厥斯坦，其意在分化、裂解中國，已是司馬昭之心），雖然其言論、行為可卑，但都下過相當工夫，從事研究工作，這點中國人，尤其學術界應特別注意，不僅應隨時加以駁斥，更要加大力度研究邊疆問題。

回過頭來看，日本特別任務班（挺進隊）第一組從北京出發後，途中又分為東、西兩個小組，東小組的成員有橫川省三、冲禎介、脅光三等六人，其中脅光三與河源操子關係最為密切，橫川省三、冲禎介二人在哈爾濱附近，被俄國中東鐵部護路隊發覺將之捕殺，「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一手操導的「滿洲國」成立時，還在哈爾濱、喀喇沁右旗兩地，為這兩個死者建立「烈士紀念碑」；西小組則由之前貢王所辦守正武備學堂當教官的伊藤柳太郎、吉原次郎等四人負責，他們從北京起程之時，就換上喇嘛穿的袈裟，冒充蒙古喇嘛，只是伊藤、吉原兩個在途中被中國識破，只得換回日本軍服，到了貢王府後，再改穿喇嘛服。這東、西兩小組於 1904 年（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日夜間從北京出發，於二十八日午後，到達喀右旗，下榻於離貢王府約七、八里的大西溝門守正武備學堂，二十九日這個小組十來人晉謁貢王於其官邸，並蒙貢王賜午宴於毓正女子學堂

教師汪某的住室，宴後，貢王僅留下，伊藤柳太郎、吉原次郎、橫川省三、冲禎介（後二人後來在哈爾濱被俄人捕殺）四人進行密談，直到夕陽西下，既是密談，所談內容自是無從知曉，不過貢王答允為他們代購騎乘的馬匹，這幾人在喀右旗逗留了幾天，既事休息，另一方面等待北京日本使館所派密使的到來。我們且看貢王從親俄態度，轉而接受這兩小日本挺進隊停留喀右旗、更而賜宴、密談、代為購置馬匹，這種轉變，河源操子在幕後下了多功夫。

深居貢王府後院（古代女子多住在宅邸的最後一進），在三月二十八日這一天，雖然沒有和這兩個小組的人碰到面，但她的日記中卻有如下的記載：

「三月二十八日，喀喇沁王府來了很多喇嘛裝束的“不速之客”，其中有一位比較年輕的，拿出一包東西並附信一封，托王府內侍，送到河原教習的住所，信的內容是這樣：『河原姐：我們特別任務班先遣隊一行，現已抵達喀喇沁王府，把晤在即，曷勝歡忭。茲送上什物一包，是預先準備好送給蒙古孩子的禮物，請代分致貴校的學生。我們都變裝為蒙古喇嘛，如無其他意外，明日就可以暢敘一切。脅光三上。』」

三月三十日下午，河源操子在貢王府後自己的住處，迎接了伊藤柳太郎、吉原次郎、冲禎介、脅光三等人，並進了密談，據邢復禮專文所載當時河源操子曾說：

「我雖一個弱女，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特別任務班的前進道路上，謀求了不少方便，這也算是報國的一端。在沙漠積雪、四顧茫茫的征途上，非有一名熟悉道路的嚮導者不可。跋涉千里的旅程，也非有馬匹代步不可。馬乎？人乎？若在平時，並非難事，在今日求之，均不簡介。因為喀喇沁王府嚴守中立，王府官吏，又多親俄，日本人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監視之下，在這種處境裡，雖細微小節，也要慎重從事。終由於喀喇王對我的信任，滿足了我們所有的要求，這何嘗不是一件幸事！。」

從河源操子這一段話，等於他在貢桑諾爾布王及其福晉身上，下了多大的工夫，才改變了貢王對日本的態度。這組特別任務班於三月三日在貢王所派兩個嚮導帶路下，從喀喇沁右旗出發。由於日俄之間已是戰雲密布，日本陸軍已侵入朝鮮漢城（時作漢京），隨即北向占領定州，進入中國境內，占領九連城等處，日本海軍則攻旅順，與俄國海軍戰于黃海，此際可說是風緊雲急（指 1904 年三月至九月），河源操子的工作更為繁重，內蒙古各地日本特務人員所蒐集到的情報，都寄送到了河源操子手中，河源操子將所有送來的情報分門別類整理後，以電報傳送到在熱河的日本特務機關，從此可見河源操子手中有一部電台，有時還派專人（當然是貢王府中的人，而且是透過貢王指派）送到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河源操子有時還假冒中國人，不斷與外界通信，河源操子事後曾經很自豪地說，無論在何狀況下，她都能隨機應變應付裕如，幾乎以生命為賭注，達成了她所要完成的任務，由於她頻繁的活動，早已引起俄國方面的注意（俄國特務也絕不是省油的燈），但是河源操子外有喀喇沁郡王的庇護，內有貢王福晉撐腰，她的間諜活動絲毫未受到影響，而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扎薩克王府，儼然成為日本間諜大本營。

1904 年八月，日俄戰爭勝負之局大致以定，日本可說是大獲全勝，河源操子可說是階段性任務已告完成，1904 年年底一度離開貢王府，喀喇沁郡王福晉善坤可能對河源操子極具好感，希望河源操子能繼續在毓正女子學堂任教，遂致書日本東京實踐女學校長下田歌子，原信如下：

「下田先生妝次：久聞芳名，恨未識荊，敝地教化未興，人民頑陋，女學尤所未講，去年曾創辦學堂，以開風氣，惟師範難求，幸令徒河原女史具此熱心，不以寒苦肯來教授，感佩之至，茲未年餘，而進步之速實出意外，將來敝地婦女之輸入文明，無非出自先生也。惟去冬獎約暫定一年，今將期與女史續約，多處數年，俾得教化普及地方，幸甚。尚望函致女史，請其多住，不勝盼甚。再前承厚覲，拜謝拜謝，久慕芳名，未知日何得拜識也，專此敬請文安。喀喇沁王福晉十一月十七日。」（見邢復禮專文）

這封信可說是文情並茂，純就函牘而言，可稱上乘之作，但對河源操

予以貢王府，作諜報基地，竟一無所覺，可見當時蒙古王公（其實何止蒙古王公，一般漢人達官顯貴）政治嗅覺普遍不足，引狼入室竟毫無知覺，且要求河源操子再度到喀喇沁右旗貢王府，以是河源操子再度到喀喇沁右旗，她一手包辦了毓正女子學堂的教務，舉凡日語、算術、手工（即工藝或勞作）、繪畫（美術）、音樂、體育等課程，她都親任教，就這一點而言，她確實多才多藝，但完全是日本化教育，音樂唱的是日本歌，更毫不忌憚地把日本的紀元節、天長節、地久節三大節，明定為毓正學堂的放假日，毓正學堂幾乎就等於日本學校，貢王對此似乎毫不在意，任其所為，河源操子眼光「遠大」，希望透過日化教育，使喀喇沁右旗蒙人對日本懷有好感，這一點她做到了，喀右旗的學生對日本確實懷有好感，她為了達到更長遠的「目的」，便向貢王福晉建議，應派若干學生到日本留學，以吸取更高深知識，這個建議基本上是正確的，貢王福晉也認為有理，便從毓正女子學堂選拔了三個成績優異的女學生東渡日本留學，她們是：何惠貞、于保貞（以上兩人均十五歲）、金淑貞（年歲不詳）送往日本留學，等於培養親日的種子，只等待異日分枝散葉開花結果。

1906 年（光緒三十二年），日俄戰爭早已結束，經美國調停日俄講和，於 1905 年九月在美國樸茨茅斯簽訂合約，俄國因戰敗，把原有在中國東北的權益讓予日本，如旅順、大連由日本承租，長春以南鐵路讓予日本經營等。河源操子的間諜任務已全部完成，認為沒有繼續留在喀喇沁的必要，且經過幾年的努力，也確實是身心兩疲，且已屆婚齡，終身大事也須解決，於是決定回日本休養，日方推薦東京帝大講師鳥居龍藏夫婦來喀喇沁右旗崇正學堂，毓正女子學堂教習，鳥居龍藏倒是頗具知名度的學者。就在這一年年底，河源操子帶著上文所提到的三個毓正女子學堂學生到日本，貢王和福晉夫婦親自到車站送行，據說這是貢王夫婦首次為外國人送行，可見河源操子在貢王夫婦心目占有極重要地位。

河源操子回日本後，嫁一之宮先生，所以又稱一之宮夫人；民國二十五年（1936 年）春，邢復禮先生赴日留學，與已在日本的貢王哲嗣篤多博先生（時寄居鳥居龍藏家），鳥居龍藏鼓勵前去探望河源操子（時稱一之宮夫人），一見之後，一之宮夫人以其所著《蒙古土產》一書見贈，並向篤多博殷殷垂詢貢王與福晉近況，告以貢王已於 1930 年辭世，福晉尚

在，其所著《蒙古土產》從書名看似為談地方風土物產之書，但日本名教育家東京實踐女子學校校長下田歌子為該書作序，序中提到：

「……關於戰時的一些事情，因大半屬於軍事機密，不得不進行削減，遂使本文徒具皮毛，而無骨肉之感。」

可見該書原本寫了頗多有關機密之事，或因事涉敏感，而予削減，該書出版時，尚未進行全面侵華戰爭，因此日本官方似有所忌諱，故予削刪；而一之宮夫人在自序也直白地說：

「舊版《蒙古土產》一書的寫出（可見該書至少曾兩度出版）由於我從事清國女子教育，被喀喇沁王聘為教育顧問，表面上充當女學堂教師，暗中則根據軍部之內命，在喀喇沁王和福晉的掩護下，在日俄鬥爭（按即日俄戰爭）中得能完成秘密使命的一段事實。」

從這一段自序中，可知河源操子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日本女間諜，論輩份要比川島芳子高上一輩。

### 三、崇正學堂

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郡王貢桑諾爾布為了提升旗民的知識，不惜捨盡家財興學，其出發點、器識絕對讓人欽敬。現在且看貢王府座落於溯老哈河而上，經赤峰西，至錫伯河中游一帶地方，就是喀喇沁右旗扎薩克貢王府所在地。中共建政後，裁撤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等省建制，設立內蒙古自治區，而自治區範圍又經過幾次變更，目前已無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之地分劃歸內蒙古自治區、河北省及遼寧省。

貢桑諾爾布承襲郡王及扎薩克後，改變乃父旺都特那穆濟勒逸樂作風，銳意革新，其時清廷因縱義和團為非作歹，招致八國聯軍之亂，帝后西狩，貢王目睹一切，體認朝廷已不可恃，遂有啟發民智、擴充武備、勵治圖強、自求多福的想法，而這一切都必以興學為首要步驟。經過一年多的籌備，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夏季，就在王府西院（俗稱西衙門）創辦一所學堂，名之曰「崇正學堂」，從此喀喇沁右旗旗民始有入學讀書機會，入學的旗民青少年完全免費，所有費用全由貢王負擔，學堂除

了必不可少的教室外，還設有師生宿舍、小型圖書室、食堂、會客室、賬房（總務辦公室），校門口為操場，校園後面有桑樹林，環境相當優美，可說是一般學校該有的，崇正學堂都有，並由貢王親自擔任校長，聘任邢宜庭為漢文教員、汪良輔為監督、包景文為蒙文教員（此為汪崇一所撰《崇正學堂》所列出之教師名單，此文輯入《內蒙古文史料》第十六輯，頁 224~227），但另有文獻指稱除上列教員外，還有江南名士陸君略（浙江錢塘人）、錢桐（字孟材，江蘇無錫人）為漢文教師，博彥畢力格（漢名汪國鈞，字翔齋，另汪良輔蒙名為朝魯，為喀右旗章京），並由陸君略與博彥畢力格分別仿《千字文》方式編撰四字一句的蒙旗地理教科書，這是一個高難度的任務，既限定四字一句，又要易於朗朗上口，而且更要包含蒙旗名稱、地理方位乃至民情風俗、物產，誠非易易，距今已經一個多世紀，不知是還有人保存下來。

這個崇正學堂由貢王自任校長，蒙民聞說有此學堂，至為歡欣鼓舞，爭相為自己子弟報名，首屆招了四、五十名，不過其中多係附近王公貴族和上層人士子弟，在開學典禮上，貢王曾說：

「我身為王爵，位極人臣，養尊處優，可以說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可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高興，因為我親眼看到我的旗民子弟入了學堂、受到教育，將來每一個人都會承擔起恢復成吉思汗偉業的責任。」

這一段話把他興學的初衷說了出來，是志在恢復成吉思汗的豐功偉業，他說得沒錯，以他一個郡王，雖未必富可敵國，但絕對稱得上腰纏萬貫，大可錦衣玉食，悠哉遊哉過其一生，何苦要來興學，但他是蒙古王爺，有一份要恢復蒙古光榮的責任感或使命感，這是可貴的民族情操。

崇正學堂課程以蒙、漢文為主，按漠南內蒙古卓索圖、哲里木等盟，以地近內地，自清乾隆以來，就有許多冀魯豫漢人前來「墾荒」，俗稱闖（或走）關東，早已是蒙漢雜處，蒙人也多會漢語，但會漢語未必識得漢文（漢人亦復如此），因此崇正學堂以教授蒙、漢文為主，這方向絕對是正確的。貢王既以恢復成吉思汗光輝歷史為興學初衷，在開學當天，他當場揮毫撰寫了一副楹聯懸挂在學堂正廳的門柱上，這副對聯是：

「崇武尚文，無非賴爾多土，

正風移俗，是所望于群公。」

這副楹聯對仗工整，鏗鏘有力，聯中嵌鑲「崇正」二字，的是好聯，這也足證貢王學養之深厚，不僅聯好，書法也頗有名家架勢（本文首節曾摘錄貢王書法影本，可供參者），陸君略、錢桐等都交口贊頌，貢王之所以被稱為清末蒙古名王，當為實至名歸。

光緒二十九年秋（1903 年），貢王透過在華布里雅特蒙古人高木布耶夫的關係，將崇正學堂四個優秀學生：德克精額、吳恩和（蒙名恩和布林）、汪睿昌（蒙名特木格圖，此人後來在北京任蒙文書社經理出版了頗多蒙文書籍，有關蒙文書社，詳見結論）、汪子瑞（蒙名諾仍丕勒）送入北京東總布胡同東省鐵路（即長春鐵路）俄文學堂，專攻俄國語文，可見貢王對培植後進，可說是不遺餘力。這裡必得要對布里雅特蒙古略作介紹，按蒙古族崛起後，有所謂蒙古本支，別支之分，所謂蒙古本支，是指原本就是蒙古族的，後來強大後，陸續征服周邊各民族，這些被征服的民族時日一久，逐漸蒙古化了，就稱之為蒙古別支，布里雅特就是蒙古別支，分布於今外蒙古之北，東起額爾古納河，西至貝加爾湖，因為位置偏北，所以又稱之為北蒙古。原先都是向清朝（康熙以前）納貢，可以說是中國的領土，康熙時，西邊（今新疆）蒙古準噶爾部（也是蒙古別支）酋長噶爾丹，早年曾在西藏出家為喇嘛，與五世達賴有師徒關係，五世達賴野心勃勃，為防止康熙向西南發展，便教唆、慫恿準噶爾噶爾丹（五世達賴竟給噶爾丹一個「博碩克圖汗」的名號）向東攻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如此一來清朝必得以大軍防禦北疆，便無餘力經營西南，五世達賴喇嘛在他喇嘛王國裡依然可以威福自作。噶爾丹一則受五世達賴喇嘛蠱惑，再則他本人野心也大，自不量力妄想統一各部蒙古，便向北勾結俄羅斯雙雙向東侵掠，於是中俄發生雅克薩之戰，噶爾丹則侵入漠北，清廷為要徹底解決準噶爾問題，趁雅克薩戰勝的有利情況，與俄羅斯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把額爾古納河以西之地割讓給俄羅斯，從此布里雅特蒙古人成為俄羅斯國民，所以這個叫高木布耶夫的布里雅特蒙古人，才可能介紹德克精等四個內蒙古青年介紹到北京東省鐵路俄文學堂學習俄國語文。

自 1903 年至民國元年（1912 年）這前後十年間，為使蒙古青年能吸收更多新知識，曾選派一批學生到國內外學習，派往北京、天津、上海、

南京、保定等各知名大專院校受教的有吳恩和、汪睿昭、巴達爾呼、太平、徐文明、白瑞（此人後曾在國民政府監察院任職，其哲嗣白鳳崗在蒙藏委員會任職）、于啟明、楊時芳、汪子瑞、吳子興、那遜烏力吉、霍岳南、郭基軒、李振卿、楊鼎臣、雙柱、巴彥保、六十五、吉力嘎拉、葉婉貞（女）、吳秀珍（女）、白昆峰、鐵丹、那木格其等約三十人。選派到日本留學的除了上節提到何惠貞、于保貞及金淑貞三位女學生外，還有金勛卿、吳恩和、伊德欽、于恒山、特木格圖等人。當然這些到國內外讀書的蒙古青年，其所有費用都是貢王負擔，這在歷史上似乎還找不到第二個人肯如此培植後進。

1906 年，光緒三十一年，肅親王善耆以欽差大臣巡察邊境到喀喇沁右旗時，見崇正學堂頗具規模，乃親書《崇正學堂》四個大字，據說字頗工整。貢王將之刻成長幅匾額，懸掛於學堂正門，既為表彰，也為留念。

民國肇建後，袁世凱在內務部下設蒙藏事務，旋即改為蒙藏事務局，直隸國務總理，初以姚錫光為蒙藏事務局總裁，嗣改任貢王為總裁，民國三年（1914 年）再改蒙藏事務局為蒙藏院，直隸大總統，仍以貢王為總裁，因此必須長駐北京，無法兼理旗政，當然也無法照顧崇正學堂，就由邢宜庭接任校長，李振卿為監督，白崑峰為提調兼操練，汪林閣總管財政，學生逐漸增加到二百多人，於是分為四班，教員也從原來的六、七名，增加到十人，其中有張子棟、張偉卿、汪睿川、金永年、李香圃、韓躍奇、吳謹玲（女）等人。河原操子完成階段性間諜任務後，返回日本，有一段時間聘請了日本鳥居龍藏夫婦到喀右旗崇正學堂、毓正女子學堂擔任教席。由於社會發展新文化傳入，崇正學堂、毓正女子學堂的課程也隨時代而調整，除了高年級仍保留一部傳統國學外，另增設英語課，其他各年級都採用當時教育部審編的國文、算術、修身、自然等教科書，並普遍增加了「綴法」（就是後來所說的作文）、書法、音樂、體育等課程。同時為了給三、四名預備出國留學的學生，給予特別照顧，由張子棟負責為他們加強課業，等於是留學先修班，這是很先進的作法。

民國八年（1919 年）北京學界發生「五四運動」，大學生不再只在象牙塔裡鑽研學問，也關心國家大事，體認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

一股風氣也吹到內蒙草原，崇正學堂一部分高年級學生開始接受愛國主義思想，流露出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發起抵制日貨言論，組織學生自治會；更受五四提倡新文學、「打倒孔家店」的影響，純樸的崇正學堂，一些激進的學生砸了「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之位」的牌位，這些學生或許不知道孔子原只被歷朝帝王封為「至聖先師」，元朝時始加「大成」兩字，當時加封「大成」兩字的詔書略謂：

「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這些作法未免過於激烈，不過學生向學堂提出廢除體罰，改變老舊作風，則屬合理要求。學堂原本擁有校田（都是貢王所撥）有幾千畝之多，每年田租收入足以應付學校各項開支，只因總管財務的汪林閣等人，管理不善（是否有中飽情形，則以資料不足不能確定）以致無法支應學堂開銷，於是藉學生「鬧事」開始向學生收繳膳費十個銀元，這些事情因貢王人在北京，可能都不知道。

儘管學堂有些不平靜，但老師教學、學生受教則毫無影響，教學情緒依然濃烈。有些學生為想深造，乃克服種困難，負笈遠去北京、天津等內地各大城市求學，如汪春林、陳玉賢、陳國楨、汪文林、石含璋、金子強、金子銘、張國治、鮑振華、吳金鐸、陳國範、薛永祿、吳鵬金、吳熙憲（應係蒙古吳洛吉伯彥者，來台後早年曾在台灣屏東中學任教，之後改名吳絡吉）、李繼昌、姜尚文、烏臻和、吳瑛玲、陳家聲、于保衡、邢復禮、楊德新、汪繼昌、吳風亭等。

貢桑諾爾布親王於 1930 年辭世，學堂人事有了頗大變化，在 1930 年至 1935 年前後六年間，吳椿令、吳鵬令、楊運芳、汪睿川、姚力少等人先後都當過校長，平均每人任期不過一年多，學校是樹人的場所，校長任過短，不利教學發展，但由於以往辦學成效卓著，附近旗縣仍有許多學生前來入學，學生增加到三百人，分為六個班，為六年制完全小學，教室也擴增了，在王府西跨院加開了兩間教室，同時教員也增加到十多人，外地聘來的有康哉民、章春生、嚴舒紫等外，另有石含璋、邢子箴、汪文林、郭秀山等，此外，1933 年又聘了兩名日本人（其中一人福永）。

在此期間因蒙文教材不足，就在貢王府西苑院（原本就是貢王的書

苑）設立了蒙文印書館，由汪睿川負責編纂及印刷。同時為培養師資，崇正學堂又開設簡易師範班，招收三十名學生，並制作了悠揚雄壯的崇正學堂校歌，漢文歌詞如下：

「惟我學校，創自晚清，悠久歷史，燦爛光榮，八方稚子，遐爾同來，如沾化雨，如沐春風。師資造就，啟迪四方，教育普及，文化發揚，陰山蒼蒼，錫水洋洋，崇正之名，山高水長。」

歌詞中的「錫水」是指錫伯河，因喀右旗王府在錫伯河中游，而錫伯是一個族名，清朝興起後，錫伯族成為泛滿族的一支，如溯本追源，錫伯是鮮卑的音轉，以是可以證明喀喇沁右旗甚至整個卓索圖盟，早期都是鮮卑族的生息空間，鮮卑族是東胡系民族（女真族是肅慎系民族），蒙古也是東胡系民族，唐代蒙古是室韋的一部，許多學者考證室韋也是鮮卑的音轉，見這一塊地方從很久以前就是東胡系民族生息之地。

崇正學堂從創辦以來，至其結束（可能在日本侵略熱河時停辦），前後出國留學的學生，有一、兩百名之多（幾大多數赴日本留學），在國內各大學深造的當超過此數，而沒有繼續升學而就業的，在工作中學習當然就更多了，貢桑諾爾布捨資興學，造就了不少蒙古人才，同時也等於為中國培植了人才，至於毓正女子學堂，在敘述河源操子時，已有敘及，於此就不再重複。

#### 四、結語

本文之撰就乃是參考多篇既有之文獻，如：吳恩和、邢復禮之《貢桑諾爾布》、邢復禮《清末日本女間諜河原操子在喀喇沁的活動》、汪宗一《崇正學堂》、訥古單夫《貢桑諾爾布傳》（單古單夫先生曾來台）、鄂奇光《關於塔王宣撫西蒙暨任蒙藏院總裁的概述》等既有文章加以比勘、編排整理，補充若干背景資料，並無創新之處，理合加以說明。但以貢桑諾爾布親王（清時為郡王，入民國後，袁世凱為爭取內蒙古王公勸贊共和，對蒙古王公一律晉爵一等）能捨財興學，造就不少蒙古青年才俊尉為國用，不僅功在蒙族，也功在國家，理應名垂青史。但可能由於政治嗅覺不夠敏銳，竟然延聘日本女間諜河原操子為其所創辦之毓正女子學堂教

習，使堂堂貢王府，竟成為日本間諜大本營，而國人知之者甚少，實有加以記述之必要。

至於崇正學堂畢業學生創辦「蒙文書社」，刊刻不少蒙文書籍，對蒙、漢學術作出莫大貢獻，今日能知詳者尤鮮，因此本文之末參考白彥巴圖所撰之《汪睿昌和他創辦的蒙文書社》，對汪睿昌其人，其事酌加編排整理，或對此間研究蒙古近代史者有參考作用。

汪睿昌（1888~1939 年）字印侯，乳名奧道爾，蒙古特睦格圖，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蒙人（白彥巴圖之文稱其為昭烏達盟喀喇沁旗人，有誤），其後曾赴日本留學，刻意取一日本化名字「古松」。其祖父達蘭太，曾任喀喇沁右旗章京，按旗扎薩克之下設東、西協理台吉各一人，在此兩台吉之下設管旗章京一人，承扎薩克、協理台吉之命，辦理旗務為一旗之中「第三把手」，為旗中堅官吏，在旗中也算是地位顯赫的仕官，但此官非世襲，隨時會被撤換，可能達蘭太後來被撤換，家道因而沒落。汪睿昌自幼就很聰明，而且好學，如所周知聰明如不好學，或好學而不夠聰明，在學問上都難有大成就，而聰明與否是先天的，非人力所可左右，而好學則是後天的，是操之在我的，汪睿昌兩者兼具，的屬罕見，他通曉蒙、漢、日三種語文。

汪睿昌自幼聰明，深為喀喇沁右旗扎薩克貢桑諾爾布郡王所賞識，崇正學堂開辦後，汪睿昌就入崇正學堂就讀，之後貢王又透過布里雅特蒙古人的關係，從崇正學堂挑選四個優秀學生到北京俄國學堂學俄國語文，後來更送他們到日本留學，貢王對他的栽培，可說是不遺餘力，如果汪睿昌是千里馬，那麼貢王就是伯樂，汪睿昌不但書唸得好，而且還精於攝影，可說是多才多藝。

汪睿昌從日本留學回國後，貢桑諾爾布已在北京任蒙藏院總裁，時為民國三年（1914 年），貢王提拔這位後進到蒙藏院任薦任翻譯官，在當時薦任已是很高的官階，很多縣長還只是委任級，而且是首席翻譯官，還兼任庶務科長，想來大家都知道早期任何機關的庶務科長（今稱事務科）一定是機關首長的「自己人」，可見貢王對汪睿昌的重視。汪睿昌在蒙藏院工作了十年，當時蒙藏院一如後來的蒙藏委員會，既不進用學有專長者，也不給予充足的經費，只能算是裝飾性的機構，貢王早年的豪情壯

志，在官場十年已經消磨殆盡，汪睿昌可能不願就此消沉下去，於 1924 年（民國十三年）創辦蒙文書社，自任經理，1925 年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因躲避十三世達賴喇嘛及其噶廈政府的迫害，逃到內地，到北京後，蒙藏院予以照料，貢王命汪睿昌兼任班禪照料處處長，同時也是班禪印經處處長，班禪大師到內地後，深受漢、蒙人民敬仰，而汪睿昌負責照料班禪大師，必然接觸到許多蒙、漢檯面上人物。

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在南京設立蒙藏委員會，北京蒙藏院於焉消失，1929 年，汪睿昌出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科長兼常任編審，無論北洋政府或南京政府都沒有虧待他，對他的長才（精通蒙漢文），也都予以重用。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銳意革新，進入所謂黃金十年（日本眼見中國漸趨團結，於是加緊侵掠中國），1934 年（民國二十三年）元月間，汪睿昌竟然勾結日本駐南京大使，甘心出賣中國，同年五月結束蒙文書社，離開南京公開投靠日本，跑到東北，進入日本一手操導的「滿洲國」，在錢家店王爺廟（今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烏蘭浩特市），出任「滿洲國」興安軍官學校教官，1939 年病死於興安軍校。得年五十二歲。

民國十三年（1924 年）汪睿昌成立蒙文書社，感於以往雖有蒙文鉛字銅模，但字形不夠美觀，而且字母間的接頭也不夠嚴密，汪睿昌以其特殊的才藝，經過幾次失敗後，終於做出實用且美觀的蒙文字模，且為貢王印了一盒名片，貢王看後大為贊賞，表揚說：「有志者事竟成，雙手萬能雕刻家。」並且獎賞一輛新人力車。可見汪睿昌確是多才多藝，可惜國家意識不足，竟然投靠日本，背叛養育他的中國。

蒙文書社成立之初，資金不足，不得不向外招股，在北京的內蒙古知名人士如貢王、吳恩和（也為崇正學堂畢業生）、金永昌、張文、楊時芳、劉丕元等人都入了股，於是添購設備，成立了印刷廠，開始印刷蒙藏經卷，班禪額爾德尼照片等，當時銷售情況相當不錯。北伐之後，蒙藏委員會，教育部以及蒙古各盟旗代表聯合駐京辦事處都需要印製蒙藏文書籍或文件，遂由各盟旗代表奔走聯繫後，由政府出資將蒙文書社遷到南京，重新購置機器（舊機器搬運費過昂）設立印刷廠，廠址設在教育部後門外沙帽巷二十二號，由於教育部要印刷蒙藏文教科書，所以印刷廠生意很興旺了一、兩年，後來汪睿昌背叛國家，到東北投靠「滿洲國」後，蒙文書

社與印刷廠就結束了。他投靠「滿洲國」後，興安軍校要印刷蒙文講義，又把原先留在北京的蒙文銅模、排字架、手搖鑄字機等，運到王爺廟，籌備經年，但因經費問題，始終無法開印。

抗戰後不久，錫林郭勒盟副盟長蘇尼特右旗扎薩克德穆楚克棟魯普（俗稱德王）在日本操作下，成立「蒙疆政府」，李守信、吳鶴齡等人都成為「蒙疆政府」軍、政要員，「蒙疆政府」也需要印刷蒙文文牛，便派吳恩和（蒙名恩和布林）到王爺廟與汪睿昌接洽，把這些印刷設備交由原蒙文書社技術工人瑪希巴雅爾帶到「蒙疆政府」使用，1937 年間運到厚和（即後來的呼和浩特），開始為《蒙疆日報》排印《蒙文周報》，1939 年九月一日，又將這套設備運到張家口《蒙疆新聞》社，繼續出刊《蒙文周報》。

蒙文書社最重要的出版品，應該是蒙譯《遼史》、《金史》、還有許多蒙文教科書、蒙文字典、辭典、會話等書，一般只印二、三百本，最多不會超過五百本，這些蒙文出版品有三分之一被外國人買去，另因施祥庭在日本東京外國語學校擔任蒙古語文教師，特別將《蒙古語會話》一書，重印五百本；法國在北京西什庫天主堂的一位能通曉蒙古語父的法籍神父，凡蒙文書社出版的蒙文書籍，都會買一份或兩份，甚至連《塔爾巴經》也買，目前蒙文書社出版的書籍，海峽兩岸很可能都找不到了，但日本或法國反而可能會保存在某些學術單位或圖書館，兩岸邊政單位或學術機構，應該設法向日、法將這些珍貴的文物複製回來，尤其是蒙譯《遼史》、《金史》，儘管汪睿昌附日該受譴責，但這些有價值的出版品，不會因此而遜色、貶值，這些都是珍貴的文化遺產。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 解飢餓要靠自家飯，知冷暖只有貼心人。（回族）
- 城需要堅固的城門，人需要知心的朋友。（滿族）
- 畜靠肥膘，人靠知己。（滿族）
- 水深魚樂，情深人知。（毛南族）
- 人重感情，狗戀吃食。（土家族）
- 蜂蜜再甜，甜不過知心話。（哈尼族）
- 愛朋友勝過生命，縱然死去還留友情。（蒙古族）
- 與其牛羊多，不如朋友多。（蒙古族）
- 衣裳是新的好，朋友是舊的好。（蒙古族）
- 有了新交莫棄舊友，買了珊瑚蒙扔琥珀。（藏族）
- 只有箭一樣直的心，才能求得誠摯永恒的支情。（藏族）
- 哈達要潔白的好，朋友要知心的好。（藏族）
- 借衣打扮不好看，討食充飢沒味道。（土族）
- 茶水喝足，百病可除。（維吾爾族）
- 十個遠親，不如一個近鄰。（瑤族）
- 遠山使木，近水食魚。（達斡爾族）
- 好吃不如寬住。（布依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高僧傳・神異》中的西域高僧

金兆鴻

前文大、中原、輔大兼任教授

## 摘要

佛教在諸胡列國時大盛於北方，高僧多從西域來，且多具有「神異」功能，以此招來信眾，南朝梁出家僧釋慧皎撰《高僧傳》分《譯經、義解、神異……》等十科，茲就《神異》部分其中來自西域的高僧佛圖澄等人的來歷及其「神異」事跡酌為敘述。

**關鍵詞：**慧皎、《高僧傳》、佛圖澄

## 壹、關於釋慧皎與《高僧傳》

### 一、佛教之產生及其來華

佛教源於印度（天竺），係釋迦族喬答瑪・悉答多所創，考其創立佛教約在西元前六世紀中葉，與中國孔子時代相當，在當時印度實行種姓制度，把人民分為四等：婆羅門、刹帝利、吠舍及首陀羅；婆羅門為婆羅門教的祭司，為第一級，次級為軍事貴族，也就是世俗政治統治者，稱刹帝利。第三級為一般人民，稱吠舍；第四級也就是最低一級稱首陀羅，包括在社會兼併過程中失去土地和部落關係的，在戰爭中被征服的人，社會地位最低，稱為賤民。這四個種姓階級森嚴無法跨越；婆羅門地位最高，享有最大特權，但是「天下」卻是刹帝利軍事貴族打下的，只能屈居第二級，自是心有不甘；而整個社會賴以生存所需的農工生產者，更只居於第三級，而最悲慘的被奴役的首陀羅一級，被視為賤民，不僅如此，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這三個種姓的人有信仰宗教，以及死後有升天的權利，可以參加宗教上重生的再生。

禮，所以這三個種姓的人又稱作「再生族」，而首陀羅這個種姓，既無權信仰宗教，自不能從宗教中重生，所以只能稱為「一生族」這種不平等的社會情況，就是喬答瑪・悉達多時代印度的實情。

喬答瑪・悉達多一族屬於刹帝利種姓，許多政治、軍事、貴族認為「天下」是自己拋頭顱灑熱血打下來的，卻只能居於第二級，還要受婆羅門一級擺布，自然心有未甘，所以在西元前六、五世之交，在印度興起了各種非婆羅教的宗教以及宗教哲學思想，代表人物大多出身於刹帝利種姓，喬答瑪・悉達多就是其中之一。由於他主張眾生平等，打破四個種姓的森嚴門禁，主張人人都可以解脫（可以再生），等於替「賤民」首陀羅翻了身，佛教的這些主張，緩和了四個種姓的緊張關係，更獲得居於多數的首陀羅的歡迎，喬答瑪・悉達多在創立佛教的成功，於被尊稱「釋迦族的聖者」，印度話讀為「釋迦牟尼」，從此就以釋迦牟尼之名傳世。<sup>1</sup>

佛教成立後，一度成為印度主要宗教，但不久婆羅門教開始反撲，所幸貴霜帝國其王迦貳色迦大力弘揚佛教，乃大盛於阿姆河一帶，並向中亞傳播，而今中亞地區，中國泛稱之為西域<sup>2</sup>，西域各國多奉佛教，經西域向東傳入中土，至諸胡列國時，諸胡族君王以佛教乃是「胡神」，與其本身為胡族，自有一種「親切感」，因而多崇信之，而早期來華弘揚佛教者，多為西域諸國佛僧，為了招來信徒，這些自西域來華佛僧，多具有不可思議的「神通」以之炫人，《高僧傳》將此類佛僧列之為「神異」，本文僅就其來自西域者加以敘述。

## 二、關於慧皎與《高僧傳》

《高僧傳》的撰著者原題為「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按早期漢文文獻對佛教僧侶多稱之「沙門」，一般辭書多稱沙門，一作桑門，稱係梵語「室羅摩拏」的音譯，其意為僧徒，或解為「勤息」，即勤修善報，止息惡行之義。這一解釋已成為普遍的認識，但以「沙門」為梵語「室羅摩拏」音譯，似稍勉強，如以之為「薩滿」一詞之諧譯，或更為接近，而「薩滿」其意為巫，具有溝通人神、人鬼之功能，佛教初來，國人並不了解。

<sup>1</sup> 以上所述多參考呂大吉主編《宗教學通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sup>2</sup> 所謂西域有廣狹二義，其狹義者，僅指今新疆地區，其廣義者除新疆外，兼含今中亞乃至更遠之地，見余太山《西域通史》，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

解其真正意義，視之與巫者同類，而稱之為「沙門」，此解雖為筆者師心自用法，似可供參考。佛教初入中土，漢人之出家者，多以其師之姓氏為姓，而初期來華佛僧多係西域各國人，而中國習慣對外國來華者，以其國家之名為其姓，如來自康國者，以康為姓，來自大月氏國（貴霜帝國）以支為姓，來自曹國者，以曹為姓，……，因此早期華人出家者，多以其師之姓為姓。其後有道安者，認為佛教乃釋迦牟尼所創。如以尊師而言，釋迦乃是最崇高之師尊，力主出家人應以「釋」為姓，自是從之者頗多，但初期在「釋」之上，仍多冠以「沙門」二字，此所以《高僧傳》原題撰著者為「沙門釋慧皎」。

至於釋慧皎，據《（南朝）梁會稽嘉祥寺釋慧皎傳》所載：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著《高僧傳》一十四卷。…」

因此除了知道其人為會稽上虞人及著《高僧傳》等書外，對其俗家姓名及生平事跡，均不甚了了。但《高僧傳》末有王曼穎與慧皎之書，對《高僧傳》贊譽有加，而慧皎在回書中，也自述撰著此書之原委。另傳慧對法書尤其二王手跡頗有研究，其餘事跡無文獻可徵。

至於《高僧傳》一書共十四卷，分為譯經（分上、中、下）、義解（分一、二、三、四、五）、神異（分上、下）、習禪、明律、亡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十個類別，本書所錄之高僧始自東漢明帝劉莊永平十年（西元 67 年）、止於南朝梁武帝蕭衍天監十八年（西元 519 年），前後共四百五十三年，共收錄了南北高僧二百五十七人，另列附見者二百三十九人，兩計共四百九十六人，收錄之廣，前所未有的文辭婉約，有很高的可讀性，唐代釋智昇所撰《開元錄》譽之曰：「此傳『實可以傳之不朽，永為龜鏡矣。』」之後之作高僧傳者，多以慧皎之書為範例，猶如司馬遷撰《史記》開紀傳體之例後，諸代正史都以之為範本者然。

慧皎於此書自序中於評前人所作僧傳十餘家後（之前所有僧傳今均不存），曾自稱：

「嘗以暇日，遇覽群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史書，秦、趙、燕、涼荒朝偽歷，地理雜篇，

孤文片記，並博諮故者，廣訪賢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

可見其撰著《高僧傳》的態度是相當嚴謹的，致於稱北方諸胡列國為僭偽，這是由於他身在南朝梁，在那個時代，當然以梁為正統，此外都是僭偽，這不足為病。此外，自東漢至蕭梁的四百五十三年間的出家僧人，何止三、五百萬（僅北魏末年西元 534 年，北魏有佛僧近二百萬人），可是慧皎輯入《高僧傳》的僅四百九十六八可以說是萬中選一，可見他有很高的標準，他自在序中說選列為「高僧」的標準：

「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

可見他認為所謂「高僧」者，不是「寡德適時」浪得虛名者，而是有德而隱逸者，這是很高明的標準，出家僧人原應看空一切，如還汲汲於求名，根本是沈迷於世俗之「名」。北魏陽銜之《洛陽白藍記》<sup>3</sup>的一則記載，大意是說一個比丘叫曇謨最的，生前以講《涅槃》、《華嚴》而享有盛名，有徒眾千人，死後閻羅王認為他：

「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龕行……」<sup>4</sup>

引文中龕同粗，粗魯之意，最後閻羅王將之判入不祥之地，可見「獵名」雖有很高聲望，算不得高僧，在慧皎「選僧」的標準，這個曇謨最充其量只能算是名僧，所以《高僧傳》中不納入這種名僧，因此從四百多年三、五百萬佛僧中，只挑選了不足五百人列名高僧，其二百五十七人有名有傳，另二百三十九人幾乎雖有姓名而無事跡，可見他「選僧」的標準相當嚴格。

慧皎自己是出家比丘，說佛門中人物時，難免有其主觀宣揚意味，一則誇大佛僧對社會國家所發生之作用，再則對佛僧本人的「神異」能力，毫不置疑而加以揄揚，不過這點在一千多年前而言，尚不足為病，因為時

<sup>3</sup> 陽銜之，一般均作楊銜之，但筆者仍堅信應為陽銜之，詳情可參見筆者所撰《從“洛陽伽藍記”看六世紀初葉之中亞》一文，該文輯入所著《從古籍看中亞與中國關係史》，台北知書房出版社，2009 年，頁 159~184。

<sup>4</sup> 見《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崇真寺》，台北華正書局，1980 年，范祥雍校注本，頁 8。

至二十一世二十年代的今，還有喇嘛教喇嘛冒稱是「轉世活佛」而「到處招搖撞騙」<sup>5</sup>，是以對一千多年前之誇耀若干高僧具有「特異功能」實不足為怪。

本文所用的《高僧傳》係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的版本，按自慧皎《高僧傳》問世後，歷朝文獻均有著錄，中華書局以《大正藏》所輯者為底本，以《弘教藏》、《磧砂藏》、《金藏》及金陵刻經處本相互校對，可說是現有最完整的版本。

## 貳、具有「神異」能力的西域高僧

佛教之傳入中國，最初幾乎都是由西域（包括廣、狹義的西域佛僧開其端，而西域在皈依佛教之前，曾信奉源於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此教經西域傳入中土後。稱祆教，以其拜火，是也有稱之為火祆教者<sup>6</sup>），波斯自古以來就有「術士」，此等術士都善於吞刀吐火等幻術，瑣羅亞斯德教初對此等幻術頗為排斥，但因該等術士生活簡樸、厲行一夫一妻制、不食葷腥、熟諳禮節，以是頗受波斯國王之重視，有時也受希臘人之重視，在這種情況下，瑣羅亞斯德教對此等具「特異功能」之術士也就無可奈何」，甚至發現如習得此類「幻術」或「炫術」，有助招來信眾，久之，若干瑣羅亞斯德教之傳教士（祭司、麻葛、穆護）也深通此等「幻術」或「炫術」；其後摩尼教代之而興於西域，摩尼教之傳教士幾乎都精於此術，不僅如此，整個廣義的西域各綠洲國家，幾乎皆精於各種幻術，唐代段成式嘗稱：

「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廚中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妄。」<sup>7</sup>

其中「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既能從「神廚」中自然而出，用畢即消

<sup>5</sup> 閱 2016 年 1 月 10 日台北《中國時報》A8 版。

<sup>6</sup> 關於祆教或火祆教之傳入中國，可參看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一文，文刊《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史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4~24。其實此文早在民初即已發表。

<sup>7</sup>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輯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列頁 551~787，俱振提即《新唐書》之距戰提，真珠江即錫爾河。

失，以今日眼光看這不就是魔術、幻術？復如《冊府元龜》等史料載唐時西域各國（今中亞地區）時遣使貢豹、獅子等猛獸，萬里迢迢來獻，沿途必有精良之馴獸師豢養照顧，既到中土，必有馴獅、豹之表演者，此外也有西域國家獻「炫人」的記載，是可想見在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所攝化的西域多有「奇能異術」之士。佛教傳入西域時，西域正處於這種狀況之中，其皈依佛教後，並沒有拋棄其原來擁有的「神異」之術，到中土弘揚佛法時，其所具有的奇能異術，也就隨之而來，慧皎把這種具有幻術的高僧，歸為「神異」類，分列在卷九、卷十，共得正傳二十人，附見十二人，本文就其中來自西域者加以介紹分析。

### 一、佛圖澄

《高僧傳》稱：「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這簡短的幾個字，卻留下一些推敲的空間，如開頭稱「竺佛圖澄」等於說佛圖澄是天竺（印度）人，但接著又稱「西域人也，本姓帛氏。」這中間有些矛盾，不過指佛圖澄本姓帛氏，「帛」氏確為西域之姓，《太平御覽》引《晉書》作白氏，按白或可讀為帛，佛圖澄俗姓帛氏，應可確定；不過唐代封演所撰《封氏聞見記》卷八有如下一段記載：

「邢州內丘縣西古中丘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太和上佛圖澄者，天竺大國罽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濕，所以言濕者，思潤里國，澤被無外，是以號之為濕。』」<sup>8</sup>

封氏這一段文字頗有問題，所謂「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查後趙石勒沒有「光初」這個年號，前趙劉曜有光初年號，其五年為西元 322 年，其時石勒尚未稱王命帝，何來此碑，封氏稱渠於大歷中（大歷為唐代宗李豫年號，共十四年，766~779 年）親見此碑，果而確有此碑，何以會有「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的說法，難道封演對歷史認識如此之差，將前後趙、劉曜、石勒混淆不清，果而確有此碑，何以自立碑以來四百多年（322~766 年），他人均未得見，僅封氏一人得見，此碑之有無相當可疑。不過碑文中「太和上」一詞，可酌予解釋，「太」同「大」，「和

<sup>8</sup> 《高僧傳》湯用彤校注，頁 354，註 2。

上」即和尚，佛教傳入西域後，西域諸綠洲國家對出家比丘稱鶻社、和社，和闐（于闐、疏勒等地對比丘之稱謂，當時西域各綠洲國家所操語言為吐火羅語<sup>9</sup>），音轉為和上，和尚，這已是佛教的普通常識。另碑文中「思潤里國」之「思」字是否為「恩」字之誤？但無論如何，指佛圖澄姓濕氏，乃是無根之說。

《高僧傳》稱佛圖澄於晉懷帝司馬熾永嘉四年（310 年）到洛陽，他的「神異」功能是：「善誦神咒，能使鬼物，以麻油雜胭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應。」（見《高僧傳》頁 345），又稱「佛圖澄左乳傍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見頁 356），像這種「神異」事跡，不僅《高僧傳》有如上的記載，連正史《晉書·佛圖澄傳》也有幾乎相同的記載，茲引錄如下以為對照：

「（佛圖澄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腹中。……」

兩相對照如出一轍，或許《晉書》抄《高僧傳》略加修飾，也未可知，但無論如何，都非常理所能解釋，只能稱之為幻術、魔術，或以較理性的方式解釋，或許佛圖澄精於催眠術，目睹這種「神異」事跡者，都是觀者在被催眠的狀態下所產生的幻覺（或錯覺），或者有強烈宗教信仰者，堅持宗教是感性的，不可以理性方式去解釋，但無論如何的「神異」事跡絕對超出常理之外，其為幻術無疑。

按佛圖澄初到洛陽（晉懷帝永嘉四年西元 310 年）。時晉朝已是亂象畢呈，次年石勒（時尚未命王稱帝，仍隸「漢」之劉聰、劉淵薨於 308 年）攻豫州，還兵屯葛坡，葛坡在新蔡西北（今河南省駐馬店市新蔡縣），石勒在此戰役殺戮至多，其中出家佛僧被殺者亦復不少，佛圖澄憫

<sup>9</sup> 可參看王欣《吐火羅史研究》，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02 年。另法·謝閣蘭、伯希和等著，馮承鈞譯《中國西部考古記、吐火羅語考》，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念蒼生，想要感化石勒，於是便到石勒大營，石勒手下有一大將名郭黑略（或作郭默略）是佛教信徒，佛圖澄就住郭家並師事之，郭黑略其人雖忠勇雙具，但謀略不足，可能佛圖澄有所指點，因此每預測勝負都與結果相合，石勒深感怪異便問說：

「『孤不覺卿有出眾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吉凶指勝負），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見頁345~346）

石勒聽罷大喜，蓋石勒胸懷大志野心同之，劉淵死後，對淵子侄輩都感不服，想自建一片天下，所以一聽郭黑略說有這麼一位「高僧」，自是大喜，認為這上天所賜，立即召見佛圖澄，便問「佛道有何靈驗？」佛圖澄深知不宜與石勒細說深奧的佛學理論，但可以用「神異」的炫術折服之，便回答說：

「『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

佛圖澄露了一手「神異」之術，這下石勒果然信服，佛圖澄便趁機勸石勒少事殺戮，石勒果真不再濫殺無辜，中州胡漢人民感念佛圖澄之德，因而信奉佛教者相當多。佛圖澄雖以幻術使石勒信服而減少殺戮，仍然令人敬佩，目的有時確重於手段，佛圖澄以「水中生青蓮」神異之術，使石勒信服，然後勸其不宜濫事殺戮，使生靈免於塗炭，雖出以幻術，仍屬悲天憫人之善行。

某次，石勒因忿怒，要殺一些佛僧，連佛圖澄也要加以殺害，佛圖澄有預知之能，避到郭黑略處，並告訴徒眾說：如果大將軍所派人問及，只回答「不知所之」，後來石勒果真派人要找佛圖澄，不得要領，回報石勒，石勒大驚說：「吾有惡意向聖人（指佛圖澄），聖人捨我去矣！」於是徹夜未眠，想要找到佛圖澄，而佛圖澄也已知道石勒內心已有悔意，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石勒只好以大笑掩飾。

石勒在襄國（地當今河北省邢台市），水源在城西北團丸祀下，可是其時水源枯竭，石勒便問佛圖澄如何才能有水，佛圖澄說：

「『今當敕龍』，（石）勒字世龍，謂（認為）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敕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坼，音徹；裂開之意），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繩編的折合椅），燒安息香，咒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泓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見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煩，隍塹皆滿。（隍塹，然乾涸的豪溝。）（見頁346~347）

這段求水的記載，如果是真的，確屬神乎其技，令人歎為觀止。

某次，鮮卑段波率軍攻打石勒，其眾甚盛，石勒頗為恐懼問計於佛圖澄，佛圖澄說：「昨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擒段波。（意為昨天聽佛寺的鐘聲示意。可見石勒曾為佛圖澄建造佛寺，這是一條很重要的訊息）」，可是當石勒登城瞭望時，只見段波之軍多到「不見首尾」大驚失色地說：「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又派夔安問佛圖澄，佛圖澄說：「已獲波矣。」其時是城北伏兵出巡，遇到落單的段波，因而擒獲段波，佛圖澄勸石勒赦宥段波，放他回去，石勒採納此議，結果段波果真為石勒所用。佛圖澄這種料事如神，無怪乎慧皎將之列為「神異」類高僧「排行榜」首名。

石勒是羯族，可是以往許多文獻都將之歸類為匈奴，其實羯族不是匈奴，而是匈奴盛時攻打廣義的西域（今中亞），虜獲其地驍勇善戰之青年，當時西域稱能征善戰的勇士為柘羯，或作柘支、柘折、赭時，其體質特徵為「深目高鼻多鬚」<sup>10</sup>，明顯屬於高加索（白）種人，與蒙古利亞（黃）種有明顯的區別，匈奴將擄來的柘羯之人別為一部，簡稱為羯人或羯族，處之於今山西離石一帶，由是其地為羯人聚居之地，遂稱之為「羯室」，後人不察，以為羯人源於羯室，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史傳明載羯為匈奴別部，等同明指羯族雖為匈奴所統轄，卻不是匈奴，羯族有其自己

<sup>10</sup> 見《晉書·石季龍載記》，另，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颯秣建國》明載赭（同柘）羯之人勇敢善戰。又《隋書·康國傳（即颯秣建，今中亞撒馬爾罕）》稱：「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鬚。」

的語言（當屬印歐語系東伊朗語族的吐火羅語），與匈奴語不同，佛圖澄來自西域，會說「羯語」是毫無問題的。匈奴劉淵死後，其所建的「漢」政權，經劉聰、劉粲嗣立，西元 318 年時，劉淵族子劉曜篡位，改國號為趙，史稱前趙，石勒不服，也自立為趙王，史稱後趙，於是石勒與劉曜征戰不已，西元 328 年，前趙劉曜率大軍攻後趙的洛陽，石勒要親自將兵前往拒之，群臣都認為不宜，極力諫阻，石勒又問計於佛圖澄，佛圖澄說：

「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劬音渠）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見頁 348）

這一段文字一向很少人注意，但卻極重要，是國史上極罕見的羯語漢字音譯，一則證明羯族不是匈奴，再則為研究羯族語言的珍稀資料。佛圖澄既作此預言，於是石勒乃親率軍奔向洛陽，留長子石弘與佛圖澄守襄國，當前線石勒軍中石堪生擒劉曜送往石勒帳中時，佛圖澄在襄國以某種物質抹在乎掌上然後仔細的察看，看到人群中有一人被縛綁，以紅繩綑住脖子，佛圖澄告訴石弘說這個被縛綁的人就是劉曜，而那時正是石堪活捉劉曜之時，這個場景像極了科技昌明的現代「實況轉播」，在一千六百多年前，慧皎能想象出這種場景，讓人不能不相信佛圖澄的確身懷「神異」之術。也就在捕獲劉曜的西元 328 年，石勒稱趙天王行皇帝事建元太和，三年改元建平。由於佛圖澄這一連串神異事跡，石勒對佛圖澄更是禮敬有加。石勒建平四年（333 年）四月某日，天靜無風，但寺塔上的鈴鐺無風而響，佛圖澄就對大眾說：「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果真這年七月，石勒龍馭上殯。

石勒薨後，後趙宮廷經過一番爭奪，政權落入石勒從子石虎之手，石虎雖說是石勒的從子，實際上與兄弟無異，石勒「打天下」過程中，石虎建功獨多，石虎字季龍，此人生性殘酷，好殺戮，但對佛圖澄則是禮敬有加，佛圖澄曾諫其止殺，更說：

「王（指石虎）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罽賓，約當今克什米爾），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當時道人均指佛僧）『此主人命盡當受難身，後王晉地。』（見頁 350~351）

這給石虎稱王命帝提供了命中注定的說法，石虎等北方胡族，原本對於在中國大地命王稱帝有些心虛，經佛圖澄這麼一說，認為稱王稱帝是前輩子修來的，也就心安理得了，此後有十幾個胡族建元立號、命王稱帝，與佛圖澄業報之說或多或少有些關聯。事實上能否稱王稱帝，與他的能力意志與機運有關，與「前世後世」無關，而有否前世後世，還是一個爭議不休的問題，至今仍無法證實其有無。

石虎暴虐，後趙政局不穩，某日石虎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醒後去訪看佛圖澄，告以夢中所見，佛圖澄說：「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按「魚」、「羊」合而為鮮，乃鮮卑之省稱，等於預言東北的慕容鮮卑將有中原，其後慕容鮮卑果建燕政權而掩有中原（按慕容鮮卑所建政權概以燕為國號，計有前燕、後燕、西燕、南燕及北燕，北燕後來為鮮卑化的馮氏所篡）。西元 348 年（石虎建武十四年），佛圖澄對弟子法祚說：「戊申歲（348 年）禍亂漸萌，己酉（349 年）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於是派人對石虎告別，石虎當然不捨，乃親到寺慰問，佛圖澄對石虎說：

「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人能延，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吾。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誠，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不民，則國祚延長，黎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

這一番類似「遺言」，頗符哲理，石虎雖然悲慟，知其必逝，乃為他鑿墳營墳，到（348 年）十二月八日在鄴宮寺圓寂，享壽一百十七歲。

## 二、竺佛調

竺佛調未詳氏族，但有說其為天竺人，師事佛圖澄，多年來一直住在常山寺，生活純樸，不善詞藻，但當時有許多人推崇他。常山有信奉他的兄弟二人，住的地方離常山寺有一百多里，兄長的妻子罹患重病，把她送到常山寺附近，以便就醫，兄長奉佛師，早晚都在寺廟中跟著師父誦經禮佛做法事，某日，佛調忽然到兄長家，弟弟詳說嫂嫂病情，並詢問兄長在

廟中是否安好，佛調說：你嫂子的病大致已沒問題，你兄長在寺中一切如常（原文為：病者粗可，卿兄如常），佛調離去後，弟弟也策前來佛寺，對其兄說佛調來過家裡，其兄大驚說和上（同和尚，說已見前，當時和上或和尚乃是尊稱，猶如今日之大師），旦初不出門，你怎麼看到他？兄弟爭執不下，便去問師父佛調，佛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見頁 363），這顯然流傳至今的「分身」之說法，究竟是真是假，很可能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佛調曾經單獨入山一年半載，只帶乾糧幾升（南北朝一升約合今日三百克），他回來時所帶乾糧居然還有賸餘，確實「神異」。曾經有隨佛調上山，走了幾十里，天黑了又下大雪，佛調躲到石穴的虎窟中，老虎回來後，只在他臥在石穴門口，佛調對老虎說：「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老虎竟然安安靜靜下山（弭耳下山），隨從而來的驚駭不已，這一段話確實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但就佛教而言禽獸也有佛性，佛調的修養顯然使猛虎也俯首聽命，此事衡之常理，也很難使人信服，不過宗教往往不是理性所能解釋清楚，《高僧傳》既有此項記載，姑妄聽之。佛調後來知道自己某日要死，於是遠近信眾都趕來，佛調乃對眾人說：

「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在，若能燙除  
三垢（按佛教所謂三垢，是指貪嗔癡，也稱三毒），專心真  
修，形數雖乖，而必同契。」（見頁 363）

信眾們無不痛苦流涕希望佛調不要辭世，佛調說：

「生死命也，其可請乎？」

於是佛調返回居室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幾年後，佛調的八個白衣弟子到西山伐木（白衣弟子，是指俗人而奉佛者而言，而一般佛徒服黑色衣，稱人為白衣，而且多為下層人士，所以才需要入山伐木），忽然看見佛調在高山上，衣服鮮明，形容愉悅，大家既驚又喜向之敬禮並說：「和上（大師）還在人世間」。佛調說：「吾常在耳」，大家又問能否和以前一樣？不久，佛調走向遠方。這八個人便不砍材還家，向崇信佛調的同門說其所見，大家無法相信，便挖掘佛調的墳塚打開棺木，結果不見遺蛻，只見衣還。此事果爾屬實，可說是千古大疑案。

### 三、耆域

耆域其人，是天竺人，常在胡、漢之間盤桓，並沒有固定居所，為人倜儻神奇，任性而不重視社會習俗，也沒有固定的行蹤，時人莫測其高深。他從天竺出發，走海路，經過扶南（扶南為南海古國名，始王名混滇，扶南盛時奄有湄公河、湄南河二河下游諸地，總在今中南半島泰、緬一帶），瀕海而行到達交廣（交趾廣州），開示顯示靈異，後來北上襄陽，想要搭船過（長）江，但渡船主看這個天竺僧人衣衫襤襯其貌不揚，竟不讓他登船，但船到北岸時，耆域也已經到了北岸，這事相當玄妙。當時向前走時有二隻老虎，帖耳垂尾（原文作弭耳掉尾），耆域以手摩娑老虎，老虎就向別條路走去，長江兩岸的人看到這個情景就成群的跟著耆域，這一段敘述耆域能伏虎，也相當玄，不過也有令人不解之處，魏晉之時，襄陽一帶已經是通都大會，人口密集之處，怎麼可能有老虎走到市街之上？

到了晉惠帝司馬衷末年（司馬衷 290~306 年在位），耆域到洛陽，許多佛僧向之施禮，這個胡僧耆域居然安坐不動聲色，有時會說某人前世是什麼，說支法淵前世是牛（他本作羊）、竺法興前世是人，又謹譏群僧衣著華麗，就不應出家學佛。看到洛陽宮城時說：

「髮鬚（同彷彿）以忉利天宮（按係佛經中欲界六天中的第二；忉利，是梵語正確讀為怛唎耶、怛利奢。怛唎耶為三，怛利奢為三十，也就是三十三天。在須彌山頂，四方各有八個大城，當中有一大城，帝釋所居，總數有三十三處。詳見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見頁 365）

這是說洛陽宮城其富麗唐皇雖與天上忉利天宮可相比擬，但人間與天上自有其不同之處。耆域曾對沙門耆闍蜜說（闍，音都，耆闍蜜，是梵語的音譯）：建造洛陽皇宮的人，是從忉利天來的，建成後，便回到天界，在屋脊瓦下，應該藏建築工具一千五百多件（另本作一千二百多件）。但當時洛陽城的人則說：早年確實聽說建造這宮殿的人，把工具藏在瓦下，也傳聞宮殿建成後，為首的建築師就被殺害了，這彷彿證實了耆域所說的話是真的。按洛陽原為東漢的京城，東漢末年宦宮、外戚為禍動亂不已，

引來董卓率羌兵入洛陽，搶奪焚燒殆盡，曹操曾在其《薤露》（薤，音謝）詩中訴說當時情況及皇宮被焚毀之事，此詩不長且文字優美，值得引錄如下：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  
知小而謀強。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  
白虹為貫日，已亦先受映。賊臣持國柄，  
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  
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陽城，  
微子為哀傷。」

（見《魏武帝魏文帝詩註》香港商務印書館分館，1961年，頁八）

可見晉時的洛陽宮城是曹魏時開始修建，在相關文獻中並沒有看到上述相關記載，耆域說洛陽宮城類似天上忉利天宮，是無法讓人信服的，因為從來沒有人看過忉利天宮，任何有關忉利天宮的說法，都是佛教信徒所描述，所以耆域對洛陽宮城的建築形式比擬為忉利宮，可能只是贊歎其規模之大、建築之美而已。

當時衡陽太守滕永文正好到洛陽，寄住在滿水寺，可是常年得病而且病勢不減輕，兩腳攀屈，無法走動，耆域前往探視，問太守想不想治好病，沒有病人不希望把病治好，於是耆域「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柳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因以手搦（音弱，意為捉、抓）永文兩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這真是「奇跡」，不過許多宗教文獻，都有類似的記載，看來各宗教都能治病，無怪乎古代把醫與巫同列。不僅如此，滿水寺的庭院中，有幾十株相思樹枯死，耆域問滕永文這些樹枯死幾年了？回說好幾年了，於是耆域便向樹唸咒，同樣以楊柳枝向樹潑洒淨水，結果這些已枯死的樹紛紛綻出新芽，更逐漸散枝開葉，耆域能使枯木逢春的是奇跡中的奇跡。又有一人染患重病且將死，經過耆域唸咒數千言，霍然而癒，真是妙手回春，慧皎將之列入「神異」一類，確有道理。

晉惠帝末年司馬家族內訌，洛陽城內大亂，耆域要返回天竺，城內有佛僧竺法行者，對耆域說：「上人既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為永誠。」

耆域要他召集多些人來以便作「臨別贈言」，於是眾僧雲集，耆域昇上高座開講：

「守口攝身意，慎莫犯眾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

說完禪定不語。竺法行又請他多講一些，竺法行說：

「原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

竺法行是希望耆域能跳脫這些耳熟能詳淺顯的修行理論，講深奧、新鮮的佛理，然而耆域只是笑著說：

「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

耆域這段話說得透徹到底，任何宗教都是勸人行善去惡，然而多半停留在「勸」的階段，那儘管說得天花亂墜，只是停留在說的層次，任何宗教的神，都被信徒看成是至高無上、能主宰一切的萬能之神，已無需乎信徒的頂禮膜拜，在乎的是信徒能否身體力行其所提出的教言，也就是說：行動重於形式，試問一個信徒每天到禮拜場所頂禮膜拜、誦經贊神，這與淑世濟民有何關聯？耆域所說「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的是對任何宗教的神職人員、信徒的當頭棒喝、一針見血之論。耆域說完這幾句話後便離座而去，就憑他這一段話，慧皎將之列為「高僧」誰曰不宜？而這一段話不帶任何「神異」色彩，對任何人都是有益的，也就是「行」重於「形」。

之後，有幾百人要設宴為耆域餞行，耆域都一一應允，次日五百家的餞別宴中，每家都有耆域在場，而每家都認為這是耆域特別賞臉而光臨，後來彼此對問，才知道原來耆域以「分身」光臨每家的餞別宴，這也是神乎其神的，無怪乎慧皎在《高僧傳》中將之歸於「神異」類。耆域既出發，諸佛僧送行到河南城，耆域雖只是緩步而行，可是眾僧幾乎都追趕不上，耆域乃以禪杖在地上劃一條線並說：到此為止，分別了。當天有人從長安來（長安在洛陽之西），說在長安佛寺中看到耆域，又有商賈叫胡濕登的，也在當天傍晚在西域流沙見到耆域，如此一算，耆域在一天之中已走了九千多里，實在令人不可思議，耆域回到西域後，不知所終。

#### 四、犍陀勒

犍陀勒是西域人，《高僧傳》只稱「犍陀勒者，本西域人」，這個「犍陀勒」可能不是人名，而是西域一個「國家」或地域的名稱，西域有犍陀羅國，以國名人，正如同國史上習於外國來者，以國為姓一樣，設若此項推測不錯，這個犍陀勒是從犍陀羅來的佛教比丘。犍陀羅或作犍馱羅，稍晚於慧皎的玄奘法師西赴天竺取經時，曾親歷其地，<sup>11</sup>，據近現代史家考證：

「健馱羅國；健馱羅，梵語 *Gandhara* 的音譯，即托勒密《地理志》的 *Gandarae*。在我國文獻中，有乾陀羅（《洛陽伽藍記》卷五），小月氏、乾陀（《魏書·西域傳》）、月氏國（高僧傳·曇無竭傳））、犍陀羅、建陀羅（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健陀羅（《吳船錄》）諸譯。《法顯傳》作犍陀衛，《水經注》引釋氏《西域志》作犍陀越，係由梵語（*Gandhavat*）的讀法而來，此外又有作業波羅（*Gopāla*）或業波（《魏書》的，宋雲、惠生認為是其本名。其意譯，據《華嚴經音義》卷三：“乾陀是香，羅謂陀羅，此云遍也。言遍此國內多生香氣之花，故名香遍國。”是故《續高僧傳》作香行國，又有作香遍國、香風國、香潔國的。健馱羅位於庫納爾河和印度河之間的喀布爾河流域，包括旁遮普以北的白沙瓦和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地區。」

健馱羅國是亞洲古代史上有名的大國。公元前四世紀末，馬其頓亞歷山大侵入南亞，健馱羅的文化藝術曾受到希臘的影響。公元前三世紀時，摩揭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遣佛教徒來此傳播佛教，逐漸形成舉世聞名的健馱羅式的佛教藝術。公元前二世紀左右，貴霜王朝（大月氏）強盛時成為迦膩色迦王統治的中心。其首都布路沙布羅（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約建於此時。其後貴霜王朝勢衰，小月氏入侵，又為嚙噠（白匈奴

<sup>11</sup> 見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季羨林等校注本，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232~267。

奴) 所滅。因之，其各代的疆域不同，在迦膩色迦全盛時，大約包括歷史上阿富汗、克什米爾和我國的喀什噶爾、和闐、莎車、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和北方邦東到貝拿勒斯一帶地方。」<sup>12</sup>

是則犍陀羅（健馱羅國）與中國關係相當密切（擁有今中國新疆部分地方，其佛僧東來中原弘法，乃是極自然之事。這位犍陀勒來洛陽已有多年，雖然大家對其風格節操都深為敬佩，但對其來龍去脈，及其道行都高深莫測。之後，他曾對眾僧說：

「洛東南有槃鵠山（鵠，音癡，同鵠），山有古寺廟處其塲猶存（塲，音出，意為墓址），可共修立。」

眾僧都不相信，為了證實其言不虛，乃一起登山檢視，到了某一處只見四面平坦，犍陀勒指其地說：「此即寺基也。」於是開挖，果然掘得古寺下的基石。然後一一指出某處是講堂、某處是僧房，挖下去果真一一驗證，於是便共同致力修建佛寺，建成後推犍陀勒為寺主（住持）。這座佛寺離洛陽城一百里，他每天到洛陽城中諸寺禮佛，傍晚時乞得油一鉢，回到山上寺中以為燃燈之用，習以為常，從未違誤。曾經有善於健行者，要隨犍陀勒一起走，想看他到底走得很快，結果跟得滿身大汗，還幾乎跟不上，犍陀勒要那人牽著他的袈裟一角，那人只聽聞厲風之聲，並不覺得疲倦，須臾之間便到山中佛寺，後來犍陀勒不知所終。

## 五、涉公

《高僧傳》稱：涉公者（他本或作沙公），西域人也。說他不食五穀（按五穀指：稻、麥、黍、稷、菽等五種穀物，這只是較普遍的說法，還有其他說法，此處不予詳引），只「虛靖服氣」，但預測未來之事，則極為靈驗瞭若指掌，於前秦苻堅建元三年（西元 376 年）到長安。他能施行秘咒，咒下神龍，每當遇到乾旱時，苻堅常請他施咒神龍，只誦咒一會兒，龍便下降到涉公的鉢中，此時天降大雨。苻堅與群臣親看鉢中，無不覺得神異。苻堅奉之為國神，舉國土庶莫不「投身接足」，自此前秦不再有乾旱之苦。

<sup>12</sup> 見《大唐西域記》季羨林等校注本關於「健馱羅國」，頁 233~234。

及至前秦苻堅建元十六年（380 年），這位能咒龍降雨的西域胡僧涉公，於當年十二月無疾而化，苻「堅之甚慟」，坐化後七日，苻堅以其神異，開棺視之，他的尸骸竟然不見了，見殮被（覆蓋在遺蛻之薄被）。次年（381 年）從正月至六月都沒下雨，苻堅急得以「減膳撤懸，以迎和氣」，到七月才降下雨來，苻堅曾對其中書朱彤說：「若涉公在，朕豈焦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朱彤回答說：「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高僧傳》以上這一段關於西域胡僧涉公的記載，的確相當神異，能夠咒神龍入於鉢中，顯然「龍」的體軀很小，傳說中的龍軀碩大無比，因而才有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諺語，何況傳說中的龍，在生物界上是否確有其物，側目前為止，還沒有一位生物學家肯定中國傳說中的龍，曾經在地球上存在過，對於不曾存在過的生物，如何能以咒語使之降於鉢中，進而使其興雲佈雨？何況查看《晉書·苻堅載記》及《十六國春秋、前秦錄》，都不見苻堅請涉公祈雨之事，涉公容或確有其人，上引祈雨之事當以傳說附會成分居多。

## 六、邵碩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國）人」，這裡要說明「始康（國）人，今中亞錫爾河、阿姆河兩河流域，有所謂「昭武九姓」十幾個綠洲國家，稱康、何、史、小史、曹、東曹、西曹、米、石、穆……等，在漢文史料中，總以「昭武九姓」諸國稱，據漢文史料所載，月氏（讀若肉支）、烏孫兩族在秦漢之際，原分布敦煌、祁連一帶，此兩地（山）名，經近代中外史家考定，並非今日河西走廊之祁連山及敦煌，而是更西邊之天山（吐火羅語讀天為祁連）東端之敦薨，於漢初為匈奴冒頓單于擊敗，向西逃往今新疆伊犁河一帶，西徙者稱大月氏，仍留祁連山一帶者稱之為小月氏，與群羌雜處，可能為後日沮渠部。西遷後，烏孫在匈奴支持下再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再西進入今中亞阿姆河一帶的大夏，擊敗大夏而有其地，漢文史料稱之為大月氏國，漢武帝（西元前 140~前 87 年）時曾派張騫出使西域，曾到都於阿姆河南岸藍氏域，且停留一年多，大月氏下分五翕侯，其中之一為貴霜翕侯，最後被貴霜帝國覆滅，其遺裔就成為所謂的「昭武九姓」諸國，都以「昭武」為姓，而經史家考定「翕侯」乃是月氏

國次於國主的官號，後來訛為「葉護」，再訛為「昭武」，因貴霜帝國迦膩色迦王篤奉佛教，以是昭武九姓諸國也曾一度奉佛，其中以康國（其地在今中亞撒爾罕一帶）最為強大，其他諸國唯康國馬首是瞻，昭武九姓諸國善商販，凡利之所在，雖萬里不辭，因此來中土者頗多佛教僧侶東來弘法，來華後頗多滯華不歸，遂漸融入中國民族之中，或以國為姓（如康、何、曹、史……），或另取漢姓。此傳中稱邵碩始康（國）人，顯然是指其先人係來自西域康國，以時日既久，遂以邵為姓，既知這位邵碩族源，且看《高僧傳》對其神異事跡如何描述。

這個邵碩居無常所，「怳忽如狂」（怳，同恍；怳忽，即恍忽），「為人大口，眉目醜拙，因此許多小孩喜歡追著戲弄他，他有時到酒店與人酣飲，但生性喜好佛法，每當見到佛像時，無不頂禮膜拜，贊歎不已，有時甚至悲感交集，以至涕泣。邵碩在出家前原有家室，且生下三男二女，長男惠生也已出家，邵碩在南朝宋初（南朝係劉裕所建，自 420~479 年）出家為比丘，自稱碩公，出入行止，不分晝夜。曾遊歷益都郡各縣，並曾到南方蠻人居住之地，都以戲謔的口吻談論事情，從中勸人行善。他每到人家如果就在地上入眠的，這家必定有人會死，如果到人家家裡請求給一張草席的，那麼這家一定有小孩會死（當時的習俗是小孩死不入棺，而裹以草席），當時的人都知道邵碩這種行為是一種預兆。

四月八日，成都舉行遊神大會，邵碩在群眾中匍匐在地作出獅子的樣子，同時其他郡縣也都看到邵碩在迎神賽會中作匍匐在地的獅子狀，這下才知道原來都是邵碩的分身。益州刺史蕭惠開及劉孟明等人都之攀交，某日劉孟明以二個妾身上男子衣服，試對邵碩說：「以此二人給公為左右，可乎？」邵碩說話喜歡用押韻的方式，回答劉孟明的話：「寧自乞酒漬嚥，不能與阿夫竟殘年。」之後某日邵碩忽戴上市帽去見劉孟明，不久劉孟明就死了。之前劉孟明的長史沈仲玉，改變了鞭仗的規格，較之前為嚴，邵碩對沈仲玉說：「天地噭噭從此起，若除鞭得刺史。」沈仲玉相信邵碩所言，革除了鞭刑，後劉孟明死了，沈仲玉果真當上了州刺史。

及至南朝宋後廢帝劉昱元徽元年（473 年）九月一日死於山民山通雲寺，死前曾對佛僧法進說：「可露吾骸，急繫履吾腳。」法進自是照辦，把屍體停放寺後，經過兩天，屍體不見了，不久有人從郡縣來遇到法進，

對他說：「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腳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法進嚇了一跳，去問負責為邵碩遺蛻著履的小沙彌到底是怎麼回事，沙彌回說：送碩公屍體出去時，因為害怕，在右腳鞋子沒繫好，就弄丟了。這件事透著相當的詭異，看來靈魂神鬼之說，很難斷其有無，之後就沒有人再見到碩公了。

## 參、結語

任何宗教都是勸人行善去惡，而且都提倡佈施、供養，沒有佈施、供養，神職人員將無以為生，如果僅只這兩項，則宗教與教育家幾無二致，教育家是只要奉上束脩，就有教無類，但是宗教畢竟不同於教育，宗教一定提到人類死後靈魂的歸宿，是「天堂」或「地獄」，而教育家對此一問題只能說「不知生，焉知死」，因為教育家無法確認人死後是否有靈魂留下，也無法確定有否天堂或地獄，即使有，也不知道在那裡以及如何去，所以只好缺而不談。宗教則不然，不但談而且必須談天堂和地獄，並以此為獎賞信奉且行善者進入天堂，嚇阻不信奉且行惡者必墮入地獄；為了證實各宗教的神是宇宙的主宰，是無所不能的，就必須由神或其代理人（神職人員）顯示一些「神異」事件，最常見的莫過於能醫治奇難雜症，能預示吉凶、能興雲佈雨……能使人死而復活，能「分身」，想來各宗教文獻對這一類神異事件都不乏記載。慧皎的《高僧傳》當然是宗教文獻，對這一類具有神異事跡的高僧單列為兩卷，其中西域胡僧有六人，就宗教文獻而言，乃是不可少的成份，不宜以「怪力亂神」目之，基本上仍然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宇宙太以浩瀚，人類在宇宙中極為渺小，人類想全部解開宇宙之謎，是不可能的任務，只要宇宙還存有不可解之謎，宗教就有存在的空間，不宜以迷信目之。

慧皎的《高僧傳》剔除這些「神異」事跡，仍有許多珍貴的史料，如上述邵碩，提到刺史蕭惠開，《宋書》看傳，稱其「家素奉佛，凡為父起四寺」，蕭氏於南朝宋武帝劉駿大明八年（464年）為益、寧二州刺史，可見《高僧傳》所提到人物並非憑空捏造，如是傳中所敘諸事或有其可補正史不足之處，如詳讀《高僧傳》，當會獲得許多正史所未及錄之史事，對認識自東漢至南朝宋，尤其諸胡列國北朝之史事頗有助益。

# 從清初滿文創制談起

張華克  
中國邊政協會常務監事

## 摘要

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1599）二月，清太祖努爾哈齊下令利用蒙古字母，書寫女真語言，開始創制了滿文，自此展開了紀錄末代皇朝國史的波瀾壯闊一頁。由於蒙古字母並不能夠涵蓋所有的滿文語音語意，因此這種文字從創制的第一天開始，就是不全等於讀音的。滿文創制時就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繕寫方式，稱為十二字頭。不過這十二字頭，原無圈點，上下字無別，塔達、特德、扎哲、雅葉等，雷同不分。史料記載，達海奉清太宗皇太極之命，在老滿文上增加圈點，並增設了十個特定字母，讓字母更為充實完善，徹底解決了老滿文在過去應用中出現的各種語音語意問題，稱為新滿文，或有圈點滿文。不過達海早死，從《滿文原檔》的資料顯示，新滿文在天聰六年（1632）重抄的冬字、收字兩本檔案之中，已經出現了兩種文字版本，可見達海死後，滿文改革已逐漸失控。後因漢人秀才李棲鳳、楊方興二人，在書房管理方面，提出了興革意見，皇太極察納其言，方使滿文改革，起死回生，於崇德元年（1636）時底定。

**關鍵字：**努爾哈齊 皇太極 達海 新滿文 十二字頭

## 壹、前言

《東華錄》，共三十二卷，是一本清初的編年體斷代史書，由清朝蔣良騏編撰，文字簡略，卻保存了不少原始的文獻資料，頗受史界重視。

《東華錄》上簡略記載了滿文創制的過程，值得參考。時間點是明萬

曆二十七年（己亥 1599）二月間，努爾哈齊基於政治、軍事、經濟等諸多方面的活動增加，對民族文字的需求日形迫切，想到開發滿文，以求政通人和。不過手下的大臣額爾德尼、噶蓋等，對努爾哈齊的構想卻並不贊同，認為事有困難，不易實行。在努爾哈齊的一再堅持之下，才讓事情得以圓滿推展下去：

己亥年二月，將蒙古字制為國語，創立滿文。滿洲初無字，命巴克什額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改制國書，二人以難辭。諭曰：「無難也，以蒙古字合我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遂定國書，頒行傳布。<sup>1</sup>

這種仿照蒙古文字母所創制的滿文，就是所謂的「老滿文」，或「無圈點滿文」，創制地點位於瀋陽附近的費阿拉城，即今遼寧省新賓縣境內。這是滿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只促進了滿族社會的進步，也擴大了與相鄰民族的交往，並為後來女真人的全面統一，建立「後金」政權，以至入主中原，打下基礎，影響極為深遠。<sup>2</sup>

不過老滿文有許多問題極待改進，如字母數量少、清濁輔音不分、上下字無別、語法不規範、字型不統一等，後來天聰六年（壬申，1632）春正月十七日，達海奉皇太極之命在老滿文上增加圈點，並增設了十個特定字母，讓字母更為充實完善，徹底解決了老滿文在過去應用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稱為「新滿文」，或「有圈點滿文」，也就是一般現在常見的滿文：

十二字頭，原無圈點，上下字無別，塔達、特德、扎哲、雅葉等，雷同不分。書中尋常語言，視其文義，易於通曉。至於人名、地名，必致錯誤。是以金國天聰六年春正月，達海巴克什奉汗命加圈點，以分晰之，將原字頭，即照舊書於前。使後世智者觀之，所分晰者，有補於萬一則已。倘有謬誤，舊字

<sup>1</sup> 蔣良騏撰，林樹惠，傅貴九校點，《東華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80，第 1 版），頁 4。

<sup>2</sup> 佟永功、關嘉絅，〈盛京滿文興衰談〉，《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1985 年創刊號），頁 28-34。

頭正之。是日，繕寫十二字頭頒佈之。<sup>3</sup>

這段記錄中說皇太極命令達海，在滿文旁邊加上圈點，以區別發音。而現在一般人對滿文和蒙文有什麼不同，正是以哪個文字，加了圈點，就必然是滿文來做區分。可見皇太極的一念之間，使滿文的面貌，有了極大的改變。

另外需要解釋的是，達海巴克什的巴克什，是一個職銜，出自滿語「巴克什 baksi」，是一種美號，意思是「有學問的人」：

巴克什，亦作巴克式、榜式、榜什、榜識、幫實。滿文為 baksi[paq'si]。係漢語“博士”一詞音譯，含有學者、有學問之人、能書寫者之意。稱號名。清入關前，巴克什為賜給文臣的一種美號。最早見于明萬曆十九年（1591年），清太祖努爾哈赤遣巴克什阿林察持書往諭葉赫二貝勒（王先謙《東華錄》卷一）。在關外，不少名臣如額爾德尼、達海、尼堪、武納格、希福、范文程等均賜號巴克什。天聰五年（1631年）七月，改巴克什為筆帖式，本賜名者仍之。（蔣良驥《東華錄》卷二）<sup>4</sup>

天聰五年（1631年）七月，改巴克什為筆帖式。筆帖式這個名稱相當於現代的書記官，是清朝只有滿人才能擔任的官職之一。此官職配置於朝廷或地方的輔助部門，官階為正六品至正九品。該官職主要從事工作為負責翻譯漢、滿章奏與文書抄寫。

例如清朝許多《皇帝實錄》上所列的修纂官之中，就有這些人的名銜。例如《太宗文皇帝實錄》上就有「文林郎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臣安珠」的署名，擔任「謄錄滿洲字」的工作。<sup>5</sup>而同一本《皇帝實錄》上，類似職務擔任「謄錄蒙古字」工作的，就署名為「文林郎內閣撰文中書臣巴圖賴」，<sup>6</sup>職務是撰文中書，而不是筆帖式，可知這個筆帖式的工

<sup>3</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頁1196-1197。

<sup>4</sup> 商鴻達[等]編著，《清史滿語辭典》，（上海：古籍社出版：新華發行，1990，第1版），頁24-25。

<sup>5</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53[1964]），修纂官項下，頁5。

<sup>6</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

作，與滿文密切相關。到了修纂蒙文時，工作就交給蒙古人去做，頭銜也不稱為筆帖式。

然而同一本《皇帝實錄》上，校對官之中擔任「謄錄滿洲字」的工作，固然還是滿洲筆帖式。而到了「謄錄蒙古字」時，名冊中卻出現「儒林郎七品筆帖式加一級臣鈞玉」、「徵仕郎八品筆帖式加一級臣喇嘛查布」等名稱。<sup>7</sup>推測在校對時，滿人需要掌控全局，了解前面蒙古人到底寫了些什麼，就派出儒林郎七品筆帖式、徵仕郎八品筆帖式查驗一番，以避免對滿洲皇帝不敬。

此外筆帖式的名稱不只清朝在用，這個讀音不知經過什麼管道，還流傳到了越南。<sup>8</sup>在現今越南語中，稱呼「醫生」，發音、含意都與滿語「巴克什」相同，意思照舊是「有學問的人」。例如越語牙醫叫做牙科醫生（bác sĩ nha khoa），<sup>9</sup>將這個詞分解開來看，其中包含醫生（bác sĩ）、牙科（nha khoa）兩個部分。看得出來，越南語的修飾語是放在後面的，所以醫生要先講，牙科則是後念。醫生（bác sĩ）為標準滿語「巴克什」，牙科（nha khoa）的發音則與漢語粵方言十分接近。因此越南語的「牙醫」一詞，竟然有著滿漢合璧式的結構，這個事實大概會讓一般人感到意外。

至於所說的十二字頭，乾隆皇帝頗有看法，不妨引用當作介紹。清高宗說這段話的時候，是乾隆十五年（1750）五月，他感到漢人初學滿文的時候，常用漢字注音，以便記誦。然而漢字發音，往往不全等於滿文，於是愈來愈走音。於是想到以直音、二字合音、三字合音等注音方式，來解決滿漢不同音的問題。這段文字，也相當程度的介紹了十二字頭的功能，適合閱讀：

<sup>53</sup>[1964]），修纂官項下，頁 6。

<sup>7</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53[1964]），校對官項下，頁 10。

<sup>8</sup> 滿族文化編輯部，〈滿族協會大事紀〉，《滿族文化》，（臺北市：中華民國滿族協會，2016 年，第 33 期），頁 4。根據嶺南派知名水墨畫家佟京樺先生表示，他祖籍廣西省南寧市，當地僅佟姓滿族就有上千人，可知當年清廷派駐廣西戍邊的滿族人士相當眾多。而廣西與越南接界，交往頻繁，越南女性至今尚以滿族旗袍為國服，因此滿語「巴克什」一詞流向越南的可能性也相當大。

<sup>9</sup> 潘文閣等編 Phan Văn Cát，《中越辭典 Từ Điển Trung Việt》，（河內市：科學社會出版社，1997 年，第 1 版），頁 1415。「醫」字項下。

我朝創制國書，分十二字頭，簡而能該，用之無所不備，而音韻尤得天地之元聲。惟是漢人初學清字者，辯字審音，每借漢字音注，以便記誦。而漢字不能悉協，不得已，更從俗音，以意牽合，未經校正畫一，將恐久而益差，間嘗讀漢字《金史》，其用漢字音注國語者，本音幾不可曉。諦尋之，則原清語所常習。又如《元史》之達魯花赤，以今蒙古音譯之，當為達魯噶齊，不華當為補哈，此類未易枚舉。在史氏或以己意為音，或出於當時承習，蓋由以漢字而注清語、蒙古語，既非本字，又無一定，是以訛復傳訛。以此知官為校定之不可以已也。夫一天也，國書謂之阿補喀，蒙古謂騰格哩，西番則謂之納穆卡。至國書之騰格哩，則漢語所謂弦子耳。又如一日也，國書謂之舜，漢文謂之日，蒙古謂之納蘭，西番謂之尼嗎。又如國語呼爾者，其音為西，而西方則稱斡呼基。此在兼通清漢文者，無所疑義，而通清不通漢者，但知西之為爾，通漢不通清者，但知西之為西，而語之以斡呼基，且不知為何物矣。蓋凡物之命名，本屬後起。《爾雅》、《釋名》，方言土訓莫可殫述，皆假象耳。若夫以漢字注清文，實假象中之假象，而必執此以較是非、定高下、寓褒貶，此特私心妄見耳。爰命大學士傅恒，率同儒臣，重定十二字頭音訓。開章六字，則用直音，如阿、額、伊、鄂、烏、謭；餘用二字合音，如阿納、額訥、伊呢、鄂儻、烏努、謭懦；其餘十一字頭，首六字用二字合音，如衣阿、衣額、衣伊、衣鄂、衣烏、衣謭；以下俱用三字合音，如阿納衣、額訥衣、伊呢衣、鄂儻衣、烏努衣、謭懦衣。以分輕重緩急，而國書之元聲，略可得梗概。是不過同文之一端，無關奧義，然習之於童蒙之始，有不容忽者。用示其義，傳示久遠，俾知所法守焉。<sup>10</sup>

以上是關於十二字頭功能的簡要說明。不過對於皇太極能想到，在滿文旁邊加上圈點，以區別發音這種說法，也有學者為文批評，認為時間上有其疑點。

<sup>10</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53[1964]），卷三百六十五，頁14-16。

## 貳、質疑

因為《滿文老檔》中記錄的改革十二字頭，頒佈日期估計是正月十七日。假設皇太極從元旦下令改革老滿文，到頒佈日期的正月十七日，只有短短的十幾天。要在這麼短的時間裡，要考慮許多文字問題，如在某些字母旁加圈、點，使之更為精確，增訂特殊字母，解決拼寫漢語、外語借詞等，實在是有些力有未逮：

也就是說，天聰六年正月清太宗皇太極命達海改革老滿文，至本月十七日（即原文中的“是日”）頒布通行使用。從命達海改革老滿文到頒布通行使用，最多是 15 天的時間，即從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七日。在正月初一到十七日這 17 天中，正月初一群臣朝賀，不議國政，皇太極不可能下令改革老滿文。初二達海隨王伴駕參與皇太極家宴，也不可能受命改革老滿文。如果初三受命改革老滿文，到十七日頒布使用，也僅僅有 14 天的時間。在這 14 天中，達海要完成如下的改革；一是在某些字母旁加圈、點，使之與原字母不再雷同，做到一字一音；二是規範字體，即一個字母只有一種寫法，消除一字多種寫法的繁瑣；三是制定特殊字母，解決拼寫外來借詞的需要；第四是創制滿文字的連寫切音形式，以解決漢字人名、地名等的音譯。在毫無可借鑒的情況下，完全憑著自己的探索要在 14 天之內完成上述對老滿文進行改革的內容，達海雖“生而聰穎，九歲即通滿漢文”也難以勝此重任了。故天聰六年正月改革老滿文一說難以成立。<sup>11</sup>

那麼，改革老滿文的時程，就要適度往前移動，才會讓人感到合理。如何找到時間點，根據學者關克笑推測，可能早在天命八年（1623）就已經開始了，而天聰六年（1632）頒佈滿文十二字頭，不過是一個結果而已。

因為創制老滿文的額爾德尼，在天命八年（1623）五月被處死，以致

<sup>11</sup> 關克笑，〈老滿文改革時間考〉，《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1997 年 02 期），頁 13。

改革老滿文的重任，剛好就落到了達海的肩上。<sup>12</sup>這個推理，要先從天命六年（1621）一場滿文教學運動開始說起。時間是天命六年七月十一日，努爾哈齊親自下令，在八旗中著手推行書文教育，《滿文老檔》譯本、《滿文原檔》上記載了這件看似瑣碎的事情如下：

十一日，汗諭曰：命准托依、博布黑、薩哈廉、烏巴泰、雅星阿、科貝、札海、渾岱八人為八旗之師傅，八位巴克什尚精心教習爾等門下及所收之弟子。教之通曉者賞之，弟子不勤學不通曉書文者罪之。門下弟子，如不勤學，爾等可告於諸貝勒。該八位師傅，無須涉足他事。<sup>13</sup>

han i bithe juwan emude wasimbuha, jontoi, bebuhei, sahaliyan, ubatai, yasingga, koboi, jahai, hondai, ere jakūn gūsai sefu seme tucibuhe, jakūn baksi, suweni fejile šabi dosimbuha juse be saikan kimcime bithe tacibufi šumbuci gung bure, kiceme tacirakū dosika juse bithe šunderakū oci weile arambi, dosimbuha šabisa kiceme tacirakkūci sefu si beise de habša, jakūn sefu be ai ai baita de daburakū<sup>14</sup>

《滿文老檔》譯本的記載，實出於《滿文原檔》上的滿文記錄。參考以上《滿文原檔》上的滿文文字，就可以發現此處所謂「書文 bithe」，指的應是滿文。因為「八位巴克什 jakūn baksi」通常是指八旗中通曉滿、蒙文字的滿洲學者，與教導漢文的漢人生員是有所區別的。而傳授八旗旗學的教師，職稱為「八旗瑟夫 jakūn gūsai sefu」，「瑟夫 sefu」也者，就是漢文「師傅」的滿文音譯，現在新疆錫伯族在平日口語中還是這麼稱呼老師的。

如果八位師傅各自單傳，只教授了門下八個弟子，那麼影響也著實有

<sup>12</sup> 關克笑，〈老滿文改革時間考〉，《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1997年02期），頁17。

<sup>13</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頁218。

<sup>14</sup>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二，頁147-148。

限。然而根據《滿文老檔》譯本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九日條的記載，是時「十九日，每牛錄各派十人書寫檔子」，<sup>15</sup>可知當時各牛錄都接到命令攤派，規模並不算小。所謂牛錄，出自滿文，《清史滿語辭典》中解釋為：

牛錄，亦作牛鹿。滿文為 *niru[niru]*。漢義為箭、大箭。滿洲舊俗，出兵校獵，不論人多少，各隨族黨屯寨而行。獵時，每人各取一矢，十人設一長率領，各分隊伍，不使紊亂，其長稱為牛錄額真(*niruiejen*)。太祖努爾哈齊統一諸部，降者日眾，乃采獵制，以若干人為一牛錄，統一額真，是為固山兵的基本單位。八旗建立後，將三百人編為一牛錄，定五牛錄為一扎蘭，五扎蘭為一固山，分別設牛錄額真、扎蘭額真、固山額真，以統其眾。早期的牛錄為八旗軍政組織的基本單位。<sup>16</sup>

牛錄為八旗的基本單位，早期的牛錄結構，包括人民、軍隊和土地，是一個軍民合一的戰鬥體。這土地一項，入關後逐漸淡薄，有的甚至沒有。<sup>17</sup>但是查閱《滿文老檔》譯本，在天命六年（1621）閏二月時，後金全國調查，八旗統計加起來共有 231 個牛錄之多，每個牛錄都有土地，位置明確，其細目如下：

達爾漢侍衛旗，在尼雅木椎者七個半牛錄，其在菲德里者七牛錄，在愛西喀、西伯裡者五牛錄。阿敦阿哥旗，在德立石者甲兵三百七十人口，在瑚勒路者二十八牛錄，在托蘭，章吉者十七牛錄。穆哈連旗，在札庫穆者十牛錄，在德特赫者六牛錄，在鄂豁者五牛錄。濟爾哈朗阿哥旗，在溫德痕者甲兵一百二十五人，在包窩赫者七牛錄，在費阿拉者五十四牛錄。湯古岱旗，在繁克丹者甲兵二百五十人，在繁喀者九牛錄，在歡

<sup>15</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221。

<sup>16</sup> 商鴻達[等]編著，《清史滿語辭典》，（上海：古籍社出版：新華發行，1990，第 1 版），頁 157-158。

<sup>17</sup> 瀛雲萍編著、翁福祥助理編註，《滿族史》，（臺北市：自行印刷出版，2006[民 95]），頁 251。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下轄的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錫伯族仍保有牛錄地名，八個牛錄相當於八個鄉。

塔、勞利、占比干、呼蘭等處十六牛录。博爾晉旗，在法納哈者十牛录，在避蔭者六個半牛录，在赫徹穆，杭嘉者十牛录。棟鄂額駙在渾河、英額者五牛录，在貝歡寨者五牛录，在雅爾古、蘇完者八牛录，在尚間崖者甲兵二百五十人。阿巴泰阿哥旗，在柴河者五牛录，在木虎覺羅者五牛录，在鄂爾多哈達者五牛录。<sup>18</sup>

因此當天命六年（1621）七月時，每牛录雖然只派遣十人書寫滿文檔子，看似不多。但是如果以後全全國 231 個牛录來算，全部負責滿文記錄的人數就高達 2,310 人了。這些人為加強精神戰力，棄武從文。看來書文教育運動的推展，其規模還是頗為驚人的。

如果認為努爾哈齊的這次興教之舉，僅是一時興起，未能延續很久，或誤以為清代文教之興，是另起於皇太極時代，那就與事實相違背了。因為《滿文老檔》譯本在天聰六年（1633 年）十月二十一日記載了一份資料，由劉、邵兩位漢人生員老師口中，清楚的說明了從天命六年（1621）到天聰六年（1633 年）這十二年之間，旗學教育是有具體成果的：

二十一日，正黃旗劉生員、邵生員，因超額被除名。彼遂告汗曰：“教習漢文之生員四人，我等教授兩旗子弟已十二年矣。我等所教授之杜木拜、巴敦、恩額德依三人均被錄用。新入兩旗諸大臣之子弟，亦共同教授兩年矣。丑年屠戮生員時，蒙汗眷顧，擇而養之，命我等教授漢文，並將被戮生員家中諸揚，悉賜我等。兇年賜銀命購糧而食。今又蒙汗眷顧，命教授漢文之生員等，各兼男丁二人，免徭役。而正黃旗因生員超額，僅命董生員、黃生員教習，而將劉泰及邵生員我等二人革除，充當差役。更將我等所教授之鑲黃旗新舊子弟，命鑲黃旗新進生員教授。今特將我等教授十二年之苦，報知於汗。”汗遂命二生員各免二丁徭役。<sup>19</sup>

<sup>18</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170-171。

<sup>19</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1345-1346。

也就是說，劉、邵兩位漢人生員老師，對於八旗官學的解職命令，憤憤不平，認為根本上抹煞其多年的辛勞。因為這十二年間所傳授的弟子之中，也不乏才幹之士，如杜木拜、巴敦、恩額德依等三人，都已通過審核錄用為檔案房的筆帖式，可見也有教學成果。皇太極為了安撫二人，就下令「各免二丁徭役」，擺平了這件教育糾紛。

不過從這兩位生員的口中所述，正好可以看出，當年努爾哈齊在為八旗子弟選派巴克什教授滿文的同時，還聘任了漢人生員，擔任漢文的教席，招收正黃旗、鑲黃旗子弟，期望子弟兵見識淵博，滿漢兼修。同時可以見到，旗學教育在這十二年期間，片刻未停，進展得相當順利。

現在從滿文教學問題上，繼續回來討論老滿文的改革。或許正因為這些人，包含八位巴克什以及二千三百多名弟子，在實際操作老滿文時，可能會遇到許多當初意想不到的問題：例如怎麼做到一字一音、怎麼消除一字多種寫法、如何解決拼寫外來借詞、如何創制滿文字的連寫切音形式等，而開始質疑這種文字的合理性。老滿文的一些缺陷，就是原來蒙文的問題，完全無法規避。

以往達斡爾人在拚寫自己的民族語言達斡爾語時，就看出原蒙文字母存在著「一形多音、一音多形等毛病」，認為滿文記音比較準確，以致有如下的講法：

《滿達詞典》是借用滿文字母來拚寫達斡爾語詞的。這種拚寫方法形成於 19 世紀 30 年代，到順泰編寫《滿達詞典》時，它已存在了半個多世紀。眾所周知，經改進後的滿文，即加圈點的滿文有 6 個母音字母和 22 個輔音字母，另外還有專門用來拚寫漢語借詞的 10 個特定字母。使用滿文字母來拚寫達斡爾語時，達斡爾語的所有母音及輔音音位都可以在滿文裡找到相應的書寫形式。所以，對於拚寫達斡爾語來講，滿文字母是足夠的，勿需要添加任何字母或符號。另一方面，改進後的滿文是一個記音準確的文字，它克服了原蒙文字母所存在的一形多音、一音多形等毛病，故能準確地記錄達斡爾語。這些都是達斡爾語的滿文拚寫系統比較容易地被達斡爾人接受的原因。<sup>20</sup>

<sup>20</sup> 恩和巴圖，〈《滿達詞典》研究〉，《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

因此當原來蒙文的問題出現以後，就需要有人出來解決。而老滿文的創制者額爾德尼，理應是改革老滿文的最佳人選。這是因為老滿文是其一手所創，在長期使用老滿文之後，對老滿文認識應該最為徹底，可稱經驗豐富、瞭若指掌。

不過天命七年（1622）正月十三日，額爾德尼卻因受賄罪被抄家，革去副將之職，貶為庶人，致使這件文字改革工作，無法持續進行，這次事件連帶讓工作同仁達海巴克什也受到波及：

汗曰：“漢官之饋，少受尚可。所受過多也。”故將額爾德尼巴克什治罪，還給奴僕六對，馬七匹、牛三頭。其餘人、馬、牛皆沒收之，賞給阿巴泰阿哥。革額爾德尼副將之職，貶為庶人，其所管牛衆，賜與蒙噶圖。至於達海巴克什，箭刺其耳鼻，革其遊擊之職。<sup>21</sup>

第二年即天命八年（1623）五月，額爾德尼又因私藏金珠的事發，被判處了死刑。<sup>22</sup>於是改革老滿文的重任便直接轉移，落到了達海的身上。

皇太極任命修改滿文的達海，幼年即是滿漢俱修，鋒芒畢露，對滿文的實質發展，居功甚偉：

又當時太宗朝之滿文，稱曰有圈點檔案。太祖朝之滿文，稱曰無圈點檔案云。達海實於滿洲文字之集成，可謂最有貢獻者矣。彼姓覺爾察，九歲通滿漢文義，弱冠草太祖詔令，彼奉命翻譯大明會典及素書與三略，太祖視之稱善。天聰六年，病死，時年三十八，謚文成。<sup>23</sup>

早年達海曾經一度受到努爾哈齊重用，當作身旁的「機要秘書」，有「弱冠，太祖召直左右，與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鮮聘問往還，皆使屬

部]，1994年02期），頁42。

<sup>21</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頁299。

<sup>22</sup> 陳捷先著，《皇太極寫真》，（臺北市：遠流，2004[民93]，初版），頁58。

<sup>23</sup> 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民49[1960]，臺一版），上一，頁102。

草」的說法。<sup>24</sup>但從天命五年（1620）三月二十五日因與內廷侍女的通姦事發，幾被處死。所幸努爾哈齊考慮到無人比達海更「通曉漢文漢語」，才手下留情，留下達海一命，但是「縛以鐵索、釘於粗木而囚之」，相當淒慘：

汗之小妻塔因查聞此，於三月二十五日，告之於汗。汗聞之，當眾對質。查得納札經福晉允諾，與達海藍布二疋屬實。汗謂福晉曰：“爾以物與人，我本不吝惜，然禁約云：諸凡福晉，若不經汗允，即以一廣布、一塊緞給與女人，則被誣為欺夫買藥；若與男人者，則被誣為已有外心。有此誣告，則以誣告人之言為是，故無論何物，均不得給與他人等語是爾違禁約，與達海藍布二疋，爾有何忠心言耶？”遂擬達海、納札以死罪。汗復詳思：男女皆死，罪有應得。唯殺其男，則再無如達海通曉漢文漢語者。遂殺納札，至於達海，縛以鐵索、釘於粗木而囚之。<sup>25</sup>

之後到了天命七年（1622），又與額爾德尼同坐受賄罪，而被革職受刑「箭刺其耳鼻，革其遊擊之職」，已如前述。這段期間，達海顯然受到冷落，史籍中天命七年之後的達海名字消失無蹤，就可證明。不過努爾哈齊到底愛才心切，因此才一再免除了達海的重罪，要的就是讓其改進老滿文，以適應社會發展對文字的需要。

就此學者關克笑分析，達海改革老滿文不應遲至天聰六年（壬申，1632），因為那樣時間似乎不夠，而是應該提得更早，推測要始於天命八年（1623），才會比較合理。<sup>26</sup>

### 參、討論

對於關的這個論點，當然需要在實際的檔案中，找到一些證據，加以

<sup>24</sup>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民88]），卷235，列傳15，頁8000。

<sup>25</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頁133-134。

<sup>26</sup> 關克笑，〈老滿文改革時間考〉，《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1997年02期），頁17。

證實才行。學者廣祿、李學智一九六五年研究《滿文原檔》發現，清太祖天命八年（癸亥，1623）檔案中部分老滿文帶有圈點，但與新滿文所施圈點不同。天命十年（乙丑，1625）其中滿文大部分已帶有圈點，字形亦近似新滿文：

第七冊，原編冬字，故宮編第二十冊。自清太祖天命八年（癸亥）正月起，至同年五月止。（記事與列字檔重複）內編四十四號，共計八十三頁。高麗箋紙書寫，部分老滿文帶有圈點，但與新滿文所施圈點不同。冊縱四二公分，橫三六・八公分。…第十冊，原編收字，故宮編第三十四冊。自清太祖天命十年（乙丑）正月起，至同年十一月止。內編五十六號，共計一百零六頁。高麗箋紙書寫，其中滿文大部分已帶有圈點，字形亦近似新滿文。冊縱四七・七公分，橫三四・八公分。<sup>27</sup>

從這些老滿文變化的跡象可以看出，天命八年（癸亥，1623）確實有可能是新滿文改良的起點，至少在部分老滿文中，已經有帶圈點的文字出現了。即使有所謂「與新滿文所施圈點不同」，也可以從觀察其不同的特點，來理解這種文字改革的脈絡。

先看原編冬字檔。冬字檔故宮編號是第二十冊，記錄的時間從清太祖天命八年（癸亥，1623）正月起，至同年五月止。學者廣祿、李學智稱「部分老滿文帶有圈點，但與新滿文所施圈點不同」，冬字檔只有八十三頁，查閱並不困難。經詳細檢視之後，發現冬字檔八十三頁中只有六十六頁帶有圈點，且集中於前段。

冬字檔在《滿文原檔》的第三冊，頁碼為 381 至 464。其中頁 381 為空白頁，頁 382、頁 383 內容大致重複，以老滿文寫著：

sahahūn ulgiyan aniya ujui biya, juwe biya, ilan biya, duin biya,  
sunja biya bi, juwan ilaci <sup>28</sup> 函

<sup>27</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頁 13。

<sup>28</sup>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三，頁 382。「juwan ilaci 函」字體較大，筆跡也與前面所書者不同。

譯文：癸亥年，有首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第十三函。

癸亥即天命八年（1623）。達海如果真的從天命八年（1623）開始改革老滿文，那麼這一年的滿文應該有所不同面貌才對。翻開冬字檔元月的第一頁檔案，果然是有圈點的新滿文，似乎已經印證了學者關克笑的推測，新滿文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分毫不差。其所寫記錄如下：

sahahūn ulgiyan aniya aniya biya i ice juwe de, kalka i monggo  
 sengge tabunang, deo mango tabunang dehi boigon gajime ukame  
 jihe, ○ ice ilan de, han amba yamun de tucifi hacin hacin i efiyen  
 efibume amba sarin sarilaha, tere efiyen efihe nikasa de susai yan  
 menggun šangname buhe, ○ korcin i ooba hūwang taiji de unggih  
 bithe i gisun, hūwang taiji i gisun, cahara, kalka, korcin i baru, aba  
 coohai gisun donjici, niyalma…<sup>29</sup>

譯文：癸亥年元月初二，喀爾喀蒙古僧格塔布囊及其弟莽古塔布囊率四十戶逃來歸順。○初三日，汗御駕至大衙門，命設百戲，設大筵宴之。獻藝之漢人，賞銀五十兩。○致書科爾沁黃台吉奧巴曰：黃台吉曾言之，若聞有察哈爾、喀爾喀向科爾沁圍獵進兵之言，人…

這一段冬字檔在頁尾處「人 niyalma」之後，由於紙張殘損，後面明顯掉了幾個字。不過前面說過，學者廣祿、李學智一九六五年閱讀《滿文原檔》發現，冬字檔與列字檔記事重複，二者有傳鈔關係。因此去尋找列字檔相對應部分，應該是可以補足的。不過列字檔不只重複，資料還增加了三倍，因為多出了元月初四的記載，插在致書科爾沁黃台吉奧巴之前。同時列字檔上有大字批示：「將本段抄寫 ere be ara」、「本段勿抄 ere ume」。這種批示的結果，正好跟冬字檔所留存的資料，不謀而合，可見列字檔是真正的原檔，而冬字檔是後來再抄的複製品：

(ere be ara) ○ ice juwe de, kalkai monggo sengge tabunang,  
 deo mango tabunang dehi boigon gajime ukame jihe, ○ ice ilan de,

<sup>29</sup>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三，頁 385。此時新滿文正處於新、老滿文過渡時期，拼寫方式與新滿文略有差異，現將兩種滿文對照寫出，以便識別：遊戲 efiyen → efin。請參考附圖六。

han amba yamun de tucifi hacin hacin i efin efibume amba sarin sarilaha, tere efin efihe nikasa de susai yan menggun šangname buhe, (ere ume) ○ han i bithe ice duin de guwangnin de ungihe, šisanšan de tehe coohai niyalma alinci wasifi orho hadure be naka, guwangnin i minggan yafahan be yegude fujan, ušitai, jonggodoi jergi jakūn iogi gene, ilan yafahan de emu uksin gamame genefi moo unume juwefi šisašan i alin i dele uwesimbuſi sinda, dejikini, guwangnin de tehe cooha be ši sa šan de kemuni hala, monggo de udaha yali be šisašan i coohai niyalma de sila bu, jai monggo i hūdašame jihe niyalmabe hendufi meni cooha dube lakcarakū amasi julesi yabumbi, aikabade argiyaburahū seme hendume hūdun hūdaša fi ungi, ○ dutan i bithe wasimbuha, niowanggiyahai halhūn mukei bai niyahna suwe meni jušen i nungnere de geleme gūwa gašan de burlame jailaha bi sere, ereci amasi ya niyalma nungneci, dung jing hecen i dutan i yamun de habšanju, tente ke nungnehe niyalma be baicaki, meni meni usin tarime boo de tefi banji, (ere be ara) ○ korcin i ooba hūwang taiji de ungihe bithei gisun, hūwang taiji i gisun, cahara, kalka, korcin i baru, aba coohai gisun donjici, niyalma morin be ume hairandara, elcin takūra seme henduhe bihe,<sup>30</sup>

譯文：（將本段抄寫）癸亥年元月初二，喀爾喀蒙古僧格塔布囊及其弟莽古塔布囊率四十戶逃來歸順。○初三日，汗御駕至大衙門，命設百戲，設大筵宴之。獻藝之漢人，賞銀五十兩。（本段勿抄）○初四日，汗傳書廣寧：「命駐十三山兵丁，停止下山割稻草。廣寧之一千步兵，由副

<sup>30</sup>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三，頁 164-166。老滿文的拼寫方式與新滿文略有差異，現將老新滿文對照寫出，以便識別：廣寧 guwangnin → guwangning、十三山 šisašan(ši sa šan) → ši san šan、副將 fujan → fuiyang、鍾果堆的 jonggodoi → jonggodoi i、拿上 uwesimbuſi → wesimbuſi、焚燒 dejikini → dejikini、配給 sila bu → salabu、貿易 hūdaša fi → hūdašafi、都堂 dutan → du tang、敗走 burlame → burulame、躲避了 jailaha bi → jailahabi、東京 dung jing → dung ging、那樣 tente ke → tenteke。

將葉古德及烏什泰、鍾果堆等八遊擊率往。每三步兵攜一甲士，攜運薪柴，存放於十三山之上，以備焚燒。廣寧駐兵，仍調駐於十三山。由蒙古購來之肉，配給十三山兵丁。著曉諭前來貿易之蒙古人，我軍來往不絕，恐有所失。令其從速貿易而遣之。」都堂書諭：「清河湯泉地方之人，據悉爾等因懼怕我諸申之侵害而逃避他鄉。嗣後無論何人若行侵害，即來東京城都堂衙門訟告，請查該侵害之人。爾等當各安其居，各耕其田營生。」（將本段抄寫）○致書科爾沁黃台吉奧巴曰：黃台吉曾言之，若聞有察哈爾、喀爾喀向科爾沁圍獵進兵之言，即毋惜人馬，遣使前來等語。

再回頭來看冬字檔上的新滿文，就開始令人起疑了。因為這些新滿文，跟天命八年（1623）這個時間點其實無關，只有列字檔上的記錄，才是真正天命八年（1623）時所記，是以老滿文書寫的，是正牌的原始檔案。列字檔除了都是以老滿文書寫的之外，還有一個更顯著的特徵，保證了其正宗地位：

第六冊，原編列字，故宮編第十四冊。自清太祖天命八年  
(癸亥)正月起，至同年五月止。內編二百一十九號，共計二百一  
十九頁。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蹤四三·八公  
分，橫三九。八公分。<sup>31</sup>

重點就在這句「明代舊公文紙書寫」上面。當時滿洲的紙張要靠高麗供應，自己無法生產。而各類祭祀活動中卻要消費大量的紙張，於是採用明朝遼東衙門的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就成為唯一的選擇：

從紙張上看，第一冊的檔子是寫在當時難於獲得的高麗箋紙上的，而自第二冊及其以後幾冊均寫在長短不齊、厚薄不一、質地有別、滿篇漢字的明遼東衙門的舊公文紙上，經查閱，最早的公文紙記載了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四月的政事，上面有“巡按山東監察禦史董”的字樣，可以想見，這是後金政權自天命三年(1618)將鋒鏑指向遼東，掠撫順下清河後所繳獲的戰利品，在紙張奇缺的情況下，把政事記注在這些公文紙上，

<sup>31</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60[1971]），頁17。

完全可以理解。…不言而喻，從汗、王、貝勒到一般的女真平民，基於對上蒼神祇及祖先冥靈的尊崇，每年在各類祭祀活動中勢必要消費大量的紙張，人們既然把紙當成了“活人之物”，自然“其價極貴”，所獲極難了。在紙張奇缺的情況下，《舊滿洲檔》舍高麗紙而用舊公文紙記注是合乎情理的，事實也是如此。<sup>32</sup>

因此要分辨《舊滿洲檔》（新版的稱為《滿文原檔》）裡的先來後到，「明代舊公文紙」是一個關鍵根據。以「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老滿文資料，當然比高麗紙上再抄的新滿文作品，要原始許多。

於是冬字檔所記雖為天命八年（癸亥，1623）的事務，但是因為採用了高麗紙，原始性難敵列字檔所用的明代遼東衙門的舊公文紙。列字檔全用老滿文記檔，與文字改革無關。這就使學者關克笑所推測的「達海於天命八年（1623）開始改革老滿文」說法，無從在檔案裡找出論證了。

不過冬字檔的出現，卻很容易讓人意識到，這種過渡型的新滿文，有可能也是一個滿文改良的關鍵。例如前面提過「遊戲 efiyen」一詞，新滿文寫作「遊戲 efin」，而過渡型的新滿文雖拼音作「遊戲 efiyen」，但是其「f」卻是寫成「b」加上一個圓圈，來替代「f」。「遊戲 efiyen」這種奇特的寫法，僅見於這些重抄檔之中，以後再沒出現過。可知這在當時也是一種試探，嘗試各種組合。因為即使皇太極下過命令，也不可能管得那麼細，說清楚哪個圓圈，該加在哪個字之上。

這與廣祿、李學智的意見相似。就是滿文在形成的過程中，是逐漸演進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宙字檔裡有一個「han 汗」字的例子，也能證明：

宙字原檔第三十號，第一行第七字至第九字，原為一朝鮮人的名字「韓明璉」han ming liyan，很明顯的在韓 han 字右旁，亦加上了一圓圈，而在同行的第二字，原為述說朝鮮舊王(按即光海君)的，滿文曰：fe han，因其字是尊稱「君王」的 han 「汗」字，所以它旁邊就未加圈。由這些早期老滿文的發展事

<sup>32</sup> 劉厚生，《舊滿洲檔研究》，（吉林市：吉林文史，1995），頁 7-10。

例，或可判斷滿文之由全蒙文形，演變至施加圈點純滿文形的過程中，是漸進的，而不是如清太宗實錄所說，是由清太宗一念之下而一蹴成功的。而且由現存的老滿文史料看來，此種滿文施加圈點之功，或應歸功於書房中的巴克什。因為早在天命六年時，書房中的巴克什已經在施用如滿文的圈點了。再證以前引清太宗天聰九年的原檔，老滿文亦尚未完全增施圈點的史例。可知滿文自身的演變，是由很長的時間中，始將老滿文漸變成新滿文的。<sup>33</sup>

類似上述宙字檔的記錄，在收字檔中也有，而且介紹得更豐富。例如天命十年（1625）元月裡有一篇記錄，一次出現了十七個 han 的音。如果這些音只看老滿文，到底是「韓」還是「汗（王）」，實在難以區分。推測書房中的巴克什，運用智慧，在較少使用的「韓 han」音旁，加上了一個圓圈，對於經常出現的「汗（王）han」旁，就不加圈。這麼一來，「韓」、「汗（王）」就分別開來了，不致於混淆。

這篇文字統計起來，裡面「韓 han」音有七個，「汗（王）han」音有十個，密度極高。尤其特殊的是姓名「韓\*義 han \* i」一詞，如果不加上圓圈區分，很容易誤解成「汗（王）的 han i」，那就會辭不達意了。這是由於老滿文只是單純的表音字符，既沒有四聲，也分不出字母的大小寫。要是不添加其他符號，而又能準確區別同音異義詞，真是難如登天。因此圓圈在判讀滿文詞意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並非花俏的裝飾品：

solhoi ergide songko tuwaname genehe moobari, samsika, ušan  
 se, han\* yūn, han \* i gebungge juwe solho be bahafī gajifi fonjici,  
 alame, han\* yūn i ama han\* ming liyan, solhoi nendehe han# i fonde  
 sumingguwan bihe, ice han# uile arafi sanjan obuha bihe, li guwa  
 gebungge niyalma ice han# be tebuhe gungge amban bihe. tere be  
 ice han# ini jakade biburakū tulergi go]o de sumingguwan obufi  
 unggire jakade, li guwa, han# i baru korsofi mini ama han\* ming

<sup>33</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60[1971]），頁28。

liyan i emgi hebdefi ice han# i baru cooha dosifi andala ilan bai  
 cooha be gemu gidaha, han# donjifi soorinci jailafi julesi burulaha,  
 han# i hecen be meni cooha baha, tereci han# be baime wame geneki  
 sere de. li guwa suminggawan i jung giyūn cooha jimbī seme  
 urkilafi burgibufi liguwa be mini ama be gemu waha, meni junofi  
 afame tucifi, genere ba akū ofi, han# be baime jiki seme jifi, eiju i  
 harangga bai niru faksi boode ukafi bihe, dogon jafaha manggi jiki  
 seci, mao wen lung ni karun fisin ofi te i bahafi jihe seme alaha,  
 han# donjifi, baime jihe jilakan seme, han\* yūn be iogi obuha, eshen  
 i jui deo han\* i be beiguwan obuha, niyalmai baitalara ai ai jaka  
 jalukiyame buhe,<sup>34</sup>

譯文：毛巴里薩木什喀、吳善等前往朝鮮方向搜尋蹤跡，  
 獲名韓\*潤、韓\*義之二朝鮮人帶來。經訊之，告曰：“韓\*潤之  
 父韓\*明璉，在朝鮮先王#時曾任總兵官，因得罪新王#，降為參  
 將。有名李适者，乃新王#繼位之功臣。然新王#並未留其於身  
 邊，而遣往外省任總兵官。故李适怨恨新王#，與我父韓明廉共  
 謀，舉兵攻打新王#，途中連克三處之兵。王#聞之，離位南  
 逃。我軍得京城，正欲尋王殺之。不料，因李适總兵官之中軍  
 嘩變，李适與我父皆被殺害。我二人力戰得出，無處投身，欲  
 投汗#而來，故逃於義州所屬之箭匠家中，俟渡口結冰後前來。  
 唯因毛文龍之哨卡密佈，至今始得前來。”汗#聞之，憫其來  
 歸，著韓\*潤為遊擊，其堂弟韓\*義為備禦，給足所用之諸物。<sup>35</sup>

為了便於閱讀，上文的「韓 han\*」、「汗（王）han#」都以「\*」、

<sup>34</sup>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245-246。老滿文的拼寫方式與新滿文略有差異，現將老新滿文對照寫出，以便參考：總兵官 suminggawan → dzung bing guwan、罪 uile → weile、參將 sanjan → ts'anjiyang、适 guwa → g'o、寶座 sorin → soorin、敗走了 burulaha → burulaha、中軍 junggin → jung giyūn、二人 junofi → juwe nofi、義州 eiju → i jeo、毛文龍 moo uwenlung → mao wen lung、才 te i → teni。清參考附圖五。

<sup>35</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6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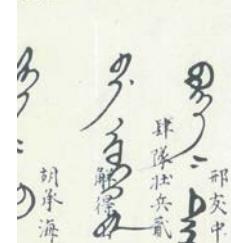
「#」標示。「\*」表示滿文右邊帶著一個圓圈，「#」表示滿文右邊不帶圓圈。

看過以上兩種滿文加圈的例子之後，再回過頭來探討前面廣祿、李學智所說：「早在天命六年時，書房中的巴克什已經在施用如滿文的圈點了。」是什麼意思。原來學者關克笑所推測的「達海於天命八年（1623）開始改革老滿文」說法，其實已經說晚了。更早的天命六年（1621），《滿文原檔》就可以找出一些蛛絲馬跡。因為隱約可找到一些線索，看出書房中的巴克什，已在一些小地方將滿文施加圈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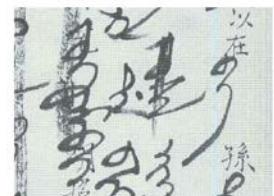
例如《滿文原檔》冊二張字檔的頁 117 第四行，「把 be」的右邊加了一個點，這個點所在的位置，剛好在 b、e 之間，放大來看是由兩個半弧形交集而成，與正常以筆點下的筆觸一致，墨色均勻，不像是汙染所留下的痕跡。這個點的出現，確立了 a、e 的區分，使滿文從此可以輕聲細語，時 a 時 e，不再一路 a 到底。（附圖一）<sup>36</sup>

《滿文原檔》冊二張字檔的頁 520 第十行，「於 de」的右邊加了一個點，確立了 t、d 的區分，使滿文可以準確的發出濁音 d，而非一律是清音 t。（附圖二）<sup>37</sup>

附圖一



附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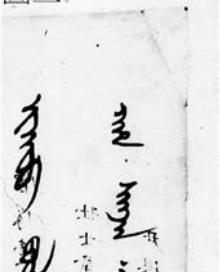


<sup>36</sup> 《滿文原檔》冊二都是以明代舊公文紙張書寫滿文的，研究滿文難免順便看一看上面寫著什麼。其中大部分是一些明朝遼東鄉勇的名冊，讓人開了眼界。俗語說：「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大家總以為那只是代號，因為誰會取這種名字呢？可是《滿文原檔》裡卻真的有，現在摘錄如下：以排行取名（頁碼），唐大（183）、王二（220）、張三（218）、李四（220）、孫五（217）、張六（369）、馬七（365）、李八（335）、金九（364）、徐十（461），以特徵區分：高禿子（279）、蘇胡子（279）、李胖小廝（358）、劉癩子（313）、盛皮（313）、李羅鍋（404）、趙矮子（535）、鄧麻子（538）、趙洪面（323）、王籠子（544）、王拐子（455）、王二麻子（402）、孟隆子（117）、完尿子（555）、吳羅子（117）、方疙瘩（555）。以職業分：羅豆腐（555）、周木匠（117）、紀皂隸（536）、李端公（男巫，418）、尤朝奉（當鋪掌櫃，455）、佟鳥（378）、張四皮匠（117）、李棒槌（人蔘，117）、白打狗（313）、劉打油（457）。以父祖年紀分：白九石（412）、裴九一（423）、莊八十（283）、張七十（461）。以民族分：劉達子（234）、楊大達子（232）、焦蠻子（538）、劉二塔喇（蒙古，545）、朴三（朝鮮，283）。以宗教分：洪二善友（佛教，545）。

<sup>37</sup> 同頁的第三、八行，都有在右邊加了一個點的「把 be」字，作用已如前述，此處不另說明。

《滿文原檔》冊二的頁 161 第九行，有「韓參將 han\* sanjan」一詞，「韓 han\*」音旁，加上了一個圓圈，可與「汗（王）han」字有所區別。（附圖三）<sup>38</sup>

附圖三



以上三個附圖，可以代表天命六年（1621）新滿文發軔時期的滿文改良情形。由於這類試探的規模非常小，檔案上也只留下了極少數的案例，現在看來雖然具有其時代意義，不過這只是少數個人一時的發想，在缺乏高層的支持下，幾乎談不上什麼影響力。這與天聰六年（1632）春正月十七日，達海奉皇太極之命在老滿文上增加圈點的舉措，影響遍及全國，兩者在規模上是無法相提並論的。

附圖四

接著再看天命十年（1625）元月裡一次出現了十七個「han」音的歷史記錄。附圖中「韓 han\*」加了圈，「汗（王）han」則沒有加圈。這份資料屬於收字檔（附圖五）。前面說過，收字檔是《滿文原檔》裡重抄過的檔冊，其滿文介於新老滿文之間，「其中滿文大部分已帶有圈點，字形亦近似新滿文。」<sup>39</sup>這些重抄過的檔冊，專家推估其重抄時間介於天聰三年（1629）與天聰七年（1633）之間：



由以上這一段史料看來，似乎是清太宗於天聰六年十一月以前，或已經命臣工們在書房中整理其父時代的檔冊了。惟證以天聰三年初設文館之史實，從寬的推斷，現存的七冊重鈔太祖朝的老檔(冬字號老檔除外)，它們的重鈔時間，不會早於天聰三年，或晚於天聰七年。<sup>40</sup>

<sup>38</sup> 附圖四是對照附圖三的 han, han 的右邊有圈，左邊加了一個點，代表更為新式的「韓\*」。取自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 1 版），頁 2929。又《內閣藏本滿文老檔》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依據《滿文原檔》的重抄本。

<sup>39</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頁 13。

<sup>40</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頁 41。

前面說過，天聰六年（1632）春正月十七日，皇太極命達海在老滿文上增加圈點。假設收字檔是天聰五年（1631）才開始重抄、完成，那麼收字檔將全部是老滿文，而會與《滿文原檔》暑字檔、餘字檔、律字檔等的滿文一致：

第三十三冊，原編暑字，故宮編第十八冊。自清太宗天聰五年(辛未)正月起，年十二月止。內編五十號，共計九十三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四八・九公分，橫三四・六公分。第三十四冊，原編餘字，故宮編第二十三冊。自清太宗天聰五年(辛未)七月起同年九月止。內編四十五號，共計八十七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縱四六・四公分，橫三八・三公分。第三十五冊原編律字，故宮編第二十六冊。清太宗天聰五年(辛未)十月份檔。內編十七號，共計二十九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八・七公分，橫四〇・五公分。<sup>41</sup>



因此重抄天命十年（1625）元月的那份收字檔，努爾哈齊收留韓\*潤為遊擊，其堂弟韓\*義為備禦的記錄，明顯是天聰七年（1633）才抄錄完成的，以致出現了新滿文。

然而附圖五的新滿文，只能說近似新滿文，卻又有些特別，老滿文的特徵不少，需要評點出來，請大家一同觀察：

第一行，solhoi，ho 字缺一個圈。tuwaname，t 字沒出頭，me 字缺一個點。genehe，ge 字缺一個點，he 字則缺一個圈。

第二行，ušan，š 寫成 s。se 字缺一個點。gebungge，前後 ge 字各缺一個點，中間 bu 字也缺一個點。juwe，ju 字缺一個點，u 按照老滿文習慣寫成了 ū，we 字缺少一個點。solho，ho 字缺了一個圈。以下各行問題類似且重複，從略。

<sup>41</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60[1971]），頁16。

對照前述天命八年（1623）那份元月初二，喀爾喀蒙古僧格塔布囊及其弟莽古塔布囊率四十戶逃來歸順的冬字檔，看看有些什麼特徵（附圖六）：

第一行，sahahūn，第一個 ha 字已經有一個圈，與新滿文一致，而第二個 ha 字卻缺一個圈，又 ū 錯為 u。ulgiyan，開頭的 u 錯為 ū，gi 寫成 ki，缺一個點。ice，ce 字缺一個點。juwe，ju 字缺一個點，u 按照老滿文習慣寫成了 ū，we 字缺少一個點。monggo，go 缺一個點。tabunang，bu 字缺少一個點。

第二行，monggo，go 缺一個點。tabunang，bu 字缺少一個點。boigon，go 缺一個點。ukame，me 字缺少一個點。以下各行問題相似且重複，從略。

附圖五、附圖六兩個新滿文檔案，由於是天聰六年（1632）皇太極下令改革滿文之後，才匆匆抄錄完畢的，初學乍練，因此出現的錯誤也相當類似，這是無足為奇的。例如書寫 juwe 時，都會把 u 按照以往老滿文寫法錯記為 ū，ju 字旁少打一個點，而 we 字旁都少打一個點。另外在寫 bu 字時，經常缺少一個點，念起來像是 bo。

這是相同的部分，十分平常。可是不同的部分，就顯得有些令人驚異了。附圖五收字檔中，新滿文的-fi 字，是相當確定的。第三行 bahafi、gajifi，第五行 arafi，第八行 obufi，都按照新滿文書寫-fi 字，沒有例外。

可是在附圖六冬字檔，第三行 tucifi，第四行 efiyen、efibume、efiyen、efihe 等字，-fi 字中的 f 字母，都是以 b 字母右邊加上一個圈代替，並沒有用到正規的新滿文 f。不過附圖六也非一無是處，凡是發 h 音的，都規規矩矩的在旁邊打上一個圈。<sup>42</sup>除了第四行的 efihe 之外，第二行的 dehi、jihe，第三行的 hacin，第五行的 buhe，第六行的 unggih，第七行的 cahara、第八行的 coohai 等，這是附圖五裡做不到的。

附圖五中凡是發 h 音的，幾乎都不加圈，當然那幾個「韓 han\*」字，算是例外。好比第一行 genehe，第四行 nendehe、bihe，第五行 obuha bihe，第六行 tebuhe、bihe 等字，完全無視於正規新滿文要加圈區別 k 與 h 的用意。

從以上隨機取樣的兩張附圖，就可以看出，天聰六年（1632）皇太極

<sup>42</sup> 第六行的 unggih 下「書 bithe」字卻缺一個圈，算是漏網之魚。

下令改革滿文，是多麼匆促，連拼字規則都尚未建立完整，就已經在一體施行了。弄得冬字、收字兩本檔案，出現了兩種文字規格。

如果貿然認為冬字檔是改革派，會用 b 字母右邊加上一個圈代替 f 字母，收字檔是保守派，不喜歡到處加圈，那也倒也未必。

像是冊四收字檔中 262 頁，第二行 jafafi、第八行 gaifi 的 f 字母，都寫作正常的新滿文，而第六行 bahafi 的 f 字母，卻也跟冬字檔一樣，寫成 b 字母右邊加圈的 f。同一個字母，在同一頁裡都無法統一形制。這種莫衷一是的現象，十足顯示了當時沒有標準的困境。

而混亂之所以形成，顯然跟當時的「總工程師」達海英年早逝，有著密切的關係。史料《八旗通志·初集》上記載：

六年，大海巴克什遘疾危篤，太宗謂侍臣曰：「朕以大海偶爾疾病，今竟不起。惜其未及寵任，後將優恤其子。爾等以朕言告之」。賜蟒緞一，綵緞二。使至宣諭，大海感泣。遂卒。時七月二十日也，年止三十八歲。太宗以大海通漢書，習典故，為國宣力，注念不忘。召其子賜緞布等物，卹贈甚厚。諡曰文成。康熙八年五且，其孫禪布為內秘書院學士。奏言伊祖大海巴克什蒙賜諡文成，請立石碑，以光永久。得旨：「大海巴克什通滿漢文字，於滿書加添圈點，俾得分明。又照漢字增造字樣，於今賴之。念其效力年久，著有勞績，著追立石碑。」<sup>43</sup>

也就是說，文字改革的重任，才加到達海身上半年，達海就已經遘疾臥病，溘然長逝，那麼這些滿文圈點，到底能不能算是達海領導加上去的呢？不只現在會有這種疑問，當時由於書房「大海病故」，沒有專人負責，低階的經管人李棲鳳在天聰六年（1632）十一月二十一日，忍無可忍，冒死上奏，想要遏止這種混亂的場面：

李棲鳳請示書房事宜奏十一月二十一日。書房秀才李棲鳳謹奏，臣一向蒙大海及眾榜式言臣小心勤慎說，奏過皇上，遂令臣辦寫國書，收掌一應文書，總在大海經管。今大海病故、書房事宜竟無專責。其櫃子中收貯文書，人得亂動。臣言輕職微，實難擔當，不容不奏。倘有露泄疏失、臣死不足惜、有負

<sup>43</sup> 鄭爾泰等纂修，《八旗通志·初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57[1968]），卷 236，儒林傳上，頁 5326。

皇上任使至意。謹奏。<sup>44</sup>

李棲鳳，字瑞梧，漢軍鑲紅旗人。<sup>45</sup>因其兼通滿漢文，而被選入文館。<sup>46</sup>由於還會滿文，又是漢軍旗人，講話當有其分量。另外書房秀才楊方興也加以呼應，點出問題所在。他於天聰六年（1632）十一月二十八日不只提議設立高層專責人員，負責書房業務，以免文書管理失控。還更進一步，提及最敏感的文化政策，要皇太極別只重視滿文，也要讓漢文得以適當的發揮。使得金國國史是金、漢書共傳，金、漢人共知：

書房秀才楊方興謹陳時政數款，開列於後。一書房中當用貝勒，書房實六部之咽喉也，一切往來國書暨官生奏章，俱在於斯。若無總理之人，未免相互推諉。臣遍觀金漢中無人當此大任，亦不敢當此大任，皆恐日久生嫌。臣想六部皆有貝勒，而書房獨無。乞皇上擇一老成通達政事的貝勒，在書房中總理。不必每日勞動他，恐褻貝勒之尊，或三五日來一次，內則查點書房本稿，外則代伸六部事務。凡大小奏章，先與貝勒說過，該進上者，進上，該發部者，發部。庶書房官生有頭領，好用心做事，再各分執掌，總聽貝勒約束，方成個大規矩，伏乞聖裁。一編脩國史從古及今，換了多少朝廷，身雖往，而名尚在，以其有實錄故也。書之當代，謂之實錄，傳之後世，謂之國史。此最緊要之事。我金國雖有榜什在書房中日記，皆係金字，而無漢字。皇上即為金、漢主，豈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漢人知耶？遼金元三史，見在書房中，俱是漢字、漢文，皇上何不倣而行之？乞選實學博覽之儒，公同榜什，將金字翻成漢字，使金、漢書共傳，使金、漢人共知。千萬世後知先汗創業之艱難，皇上續統之勞苦，凡仁心善政，一

<sup>44</sup> 羅振玉輯，《天聰朝臣工奏議 三卷》，（臺北市：藝文，民 60[1971]，據民國十三（甲子）年東方學會刊本影印，初版），奏上，頁 43。

<sup>45</sup> 鄭爾泰等纂修，《八旗通志·初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57[1968]），卷 199，名臣列傳 59，頁 4634。

<sup>46</sup> 劉詠梅，〈試析清初漢軍旗人的特點——兼論清初重用漢軍旗人的原因〉，《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蕪湖市，安徽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2000 年 04 期），頁 538。

開卷朗然，誰敢埋沒也，伏乞聖裁。<sup>47</sup>

漢人書房秀才李棲鳳、楊方興的冒死建議，當然受到了皇太極的重視，而且也確實執行了。否則，四年後的崇德元年（1636），不會有那本漢文的《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出現：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四卷四冊，分裝兩函，紅綾封面，白鹿紙，朱絲欄楷書，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三或二十五字不等，無序、表、凡例、目錄。按清太祖實錄，始修於太宗時。天聰九年八月，畫工張儉、張應魁合繪太祖實錄圖告成。因與歷代帝王實錄體例不合，尋命內國史院大學士希福、剛林等以滿蒙漢三體文字改編實錄，去圖加謚。崇德元年十一月，纂輯告成，題為「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凡四卷，是為太祖實錄初纂本。世祖順治初年，重繕太祖武皇帝實錄，原本遂佚。本院所藏此帙，書中於康熙以降諸帝廟諱俱不避，當即順治年間重繕之本也。<sup>48</sup>

不只是《清太祖武皇帝實錄》，順利完成，就連整齊的新滿文，也適時出現了。根據記錄，《滿文原檔》裡的滿文檔案，一直到天聰九年（1635）都還是吱吱唔唔，含混不清，尚未完全帶有圈點。直到崇德元年（1636），「完全新滿文」才真正出現，距離天聰六年（1632）皇太極下令改革滿文，差距有四年之久：

第三十八冊原無編號，未經乾隆時裝裱，故宮編滿附第三冊。自清太宗天聰九年(乙亥)正月起，至同年十二月止。內無編字號，共計四百八十六頁。高麗箋紙書寫，新滿文(尚未完全帶有圈點)。全附書頁寬窄不一，最長者四四・九公分，橫最寬者四〇・二公分。第三十九冊，原編日字，故宮編第八冊。自清太宗天聰十年(丙子)正月起，至崇德元年(本年五月改元崇德)八月止。內編二百二十一號，共計四百頁。高麗箋紙書寫，完全

<sup>47</sup> 羅振玉輯，《天聰朝臣工奏議 三卷》，（臺北市：藝文，民 60[1971]，據民國十三（甲子）年東方學會刊本影印，初版），奏上，頁 45-46。

<sup>48</sup> 莊吉發，〈《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敘錄〉，《故宮圖書季刊》，（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民 59[1970]1 月，第 1 卷第 1 期），頁 55。

新滿文。冊縱四九・四公分，橫四二・六公分。第四十冊，原編字字，故宮編第四冊。自清太宗崇德元年(丙子)九月起，至同年十二月止。內編一百七十號，共計三百二十頁。高麗箋紙書寫，完全新滿文。冊縱四八・八公分，橫三六・六公分。<sup>49</sup>

現在回頭來看，天聰六年（1632）有所謂「金國天聰六年春正月，達海巴克什奉汗命加圈點，以分晰之，將原字頭，即照舊書於前。使後世智者觀之，所分晰者，有補於萬一則已。倘有謬誤，舊字頭正之。是日，繕寫十二字頭頒佈之。」的說法，<sup>50</sup>真是有其疑點的。

由《滿文原檔》所披露的事實證明，天聰六年（1632）重抄的冬字、收字兩本檔案，已出現了兩種文字版本，纏雜不清。如果達海真的曾經頒佈過新版的十二字頭，讓所有的書房榜式有所遵循，諒不致於有人在 b 旁加圈，以代替 f，或是以清音 t 旁不加點，以代替濁音的 d。

因此可以合理推測，當天聰六年七月二十日達海死時，書房早已群龍無首，任由眾榜式自由發揮想像力，書寫各人心目中所謂的新滿文了。

冬字檔八十三頁中只有六十六頁帶有圈點，且集中於前段。可以看出改革愈來愈無力，有倒退回老滿文的趨勢。

終於李棲鳳在天聰六年（1632）十一月二十一日，開始「冒死」向皇太極秉告了這種亂象。他藉口「文書，人得亂動」這種似是而非的表面理由，期望文字改革運動，能派出更強力的領導，來繼續推動。

書房秀才楊方興則乘勢呼應，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出真正的建言，要求漢文也能加入撰寫太祖實錄的陣營，這才切入了問題的核心。

後來整個金國文化情勢，真的是按照這兩位漢人建議的趨勢發展。滿文自此開始遏止倒退，統合力量，善用圈點，克服了原蒙文字母所存在的一形多音、一音多形的缺點。另外制定十個特殊字母，以方便滿漢對譯。這使滿文的內涵，更能與環境互動。也使滿文的文化視野，藉著滿漢對譯，而更為開闊。這兩人的直言，使原來可能走向失敗命運的滿文改革運動，終於導向正軌，四年後開花結果，讓崇德新紀元（1636），變得更為燦爛。

<sup>49</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頁 17。

<sup>50</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1196-1197。

## 肆、結語

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 1599）二月，清太祖努爾哈齊基於政治、軍事、經濟等諸多方面的活動增加，對民族文字的需求日形迫切，下令利用蒙古字母，書寫女真語言，開發出了滿文。這種文字在努爾哈齊建立金國以後，也常稱為金字。

由於蒙古字母原來就存在著一形多音、一音多形等問題，並不能夠涵蓋所有的滿文語音語意，因此滿文創制時就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繕寫方式，稱為十二字頭，很適合滿文應用。不過這十二字頭，具備許多蒙古字母帶來的缺點，好比上下字無別，塔達、特德、扎哲、雅葉等，雷同不分，往往造成文意誤解。

因此史料記載，清太宗皇太極天聰六年（1632）正月，達海巴克什奉命在老滿文上增加圈點，並增設了十個特定字母，讓字母更為充實完善，希望一舉解決老滿文在過去應用中出現的各種語音語意問題。這種改良過的滿文稱為新滿文，或有圈點滿文。

不過達海當年七月間就病故了。從《滿文原檔》留下的資料顯示，新滿文在天聰六年（1632）重抄的冬字、收字兩本檔案之中，出現了兩種文字改革版本。冬字檔八十三頁中只有六十六頁帶有圈點，且集中於前段，顯示出改革逐漸缺乏動力，有倒退回老滿文的趨勢。收字檔的新滿文對「韓 han」音、「汗（王）han」音的區分，固然有其貢獻，但是所保留的老滿文更多，顯得十分保守。又冬字檔的 f 字母，都是以 b 字母右邊加上一個圈代替，並沒有用到正規的新滿文 f。而收字檔中，新滿文的 f 字母，卻是相當正規的。由此可見冬字、收字兩本檔案改革的方向頗不一致，也證實了達海死時，新滿文的改革方案尚不完善。以致所謂天聰六年（1632）改革滿文，頒佈新版十二字頭的說法，令人存疑。

不過漢人李棲鳳、楊方興二人，在書房管理方面，適時提出了興革意見。不只強化領導中心，也具體在實錄中增加了漢文的內容與地位。皇太極則展現政治高度，察納雅言，使滿文改革，抹去達海過世的陰影，繼續納入正軌。自此滿文的內涵，不只能與現實環境互動。也使滿文的文化視野，藉著滿漢對譯，而更為開闊。崇德元年（1636），完全新滿文正式誕生，距離天聰六年（1632）皇太極下令改革滿文，已有四年之久了。（本文於 2016 年 12 月投稿，於 2017 年 2 月審查通過）

# 2017 年「絲綢之路今昔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記述

林遙鵬  
中國邊政協會副秘書長

## 壹、研討會主題確立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於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及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的設立，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2015 年 2 月，中央成立“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3 月，為推進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確立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戰略。

中國邊政協會與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社會政法學部、中國邊疆研究所合作舉辦「絲綢之路今昔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構想，早繕於本會 2015 年 4 月 25 日會員大會，復於 2016 年 1 月 30 日第四十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中得到落實，決議本年度邀請中國社科院籌組學者來台參加學術研討會，會議日期訂於 6 月 3 日至 9 日，共七天；楊開煌理事提議本次研討會主題「絲綢之路今昔與展望」，獲參會者一致通過，理事長責成秘書處籌備本次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中國邊政協會雖作為一個社團法人，經費短缺，會員人數也不多，但「中國邊政協會」成立之初，就以「擁護憲法落實邊疆政策，團結各民族研究邊疆問題，促進邊疆現代化」為協會創立的宗旨。近十年間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法學部的雙方交流合作期間，均在少數民族與邊疆地區，推進邊疆沿線國家或各民族間的雙邊、多邊彼此開放，平等共商共用與共同發展範疇學術研討，雖經濟拮据但始終一往如前，雖無政府政策的支持仍不改初衷。

2016 年民進黨再度執政並掌控了立法院多數已是實質的全面執政，

兩岸關係在其主控下全面進入冷互動時期，大陸學者宥於當時的政治氛圍下，提議研討會延期，秘書處因應現況遂取消所有的前置作業，惟仍以如期召開為第一選項，殊不知在等待中過了近一年；2017 年年前秘書處致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陳建樾副主任商詢與會可能性，其告知大陸方面已批准赴台與會，秘書處依相關日程展開研討會籌備事宜。

## 貳、籌備事宜

### 一、籌組會務工作小組

前言所及，中國邊政協會為社團法人，經費短缺，會員人數不多，會務人員亦少。劉學銚先生擔任秘書長一職綜理全般會務，我則擔任副秘書長襄助秘書長辦理會務工作。在理事長與秘書長指導下，又召集了協會選任人員張華克常務監事與秦偉騰先生協助共同籌劃此次「絲綢之路今昔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 二、確立與會者的研究領域與參會人數

- (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郝時遠先生，除將親臨與會並推選了八位大陸知名學者，九位學者族籍涵蓋漢、蒙、藏、維、滿、彝等族，研究專業均在各邊疆、民族間之學術，政治、經濟、宗教、文化、語言學等，屬大方向大範疇領域。
- (二) 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研究所所長邢廣程先生親率四位學者與會，五位學者研究領域為邊疆、邊陲地帶之政府施政政策推動與分析。
- (三) 中國邊政協會邀請新疆師範學院賀元秀教授、廣東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劉志揚教授、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王川院長、西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劉波教授等四位學者，正式組成大陸學者的陣容，並將會議規模訂為中小型學術會議。
- (四) 台灣方面則由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楊克誠先生，著名學者楊開煌、楊維真、劉學銚、蕭金松、趙竹成、藍美華、李信成等研究邊疆民族學術專家，共同與會進行交流、討論。同時也決定第一次開放社會大眾參加。

### 三、確認會議地點

學術研討會議一方面要安排會議地點，另一方面也要顧及參會學者之食與住的問題，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與犇亞國際會議中心均是選項，由於上述三方面考量，選定了前者作為本次學術研討會地點；福華國際文教會館位於台北市新生南路 3 段 30 號，長期做為國家公務人員的訓練中心，委由福華飯店經營管理，交通極為便利並集會議、住宿、餐飲於一處，應是最佳會議場所選擇。

### 四、規劃在台期間調研行程

會議來台期間，路程往返二天、學術研討會二天，尚有三天需做安排，經與對接窗口陳建樾老師會商後，決定在台東縣卑南鄉與蘭嶼鄉達悟族世居地展開三天調研。然而籌委會卻開始犯愁，卑南鄉還好，蘭嶼鄉必須考慮天候、交通與食宿問題，然陳老師告知，此次參會之大陸學者做學術研究時，均必須長時間到各偏遠落後地區從事田野調查研究，食宿極為克難所以不用顧慮，只需擔心天候，此一訊息，著實籌委會吃下一顆定心丸，展開安排聯繫工作。

## 參、學術研討會會議記述

### 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原應 11：35 抵達之 CA185 航班因故延遲，13：00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郝時遠先生長所率領與會學者 12 人，終於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受理事長與秘書長指派前往接機，並於七天在台期間全程陪同，回到福華國際文教會館稍做安頓後，返回辦公室安排中國邊政協會召開第四十二屆(106 年)第二次會員大會。

今天適逢中國邊政協會召開 106 年會員大會，為歡迎參加「絲綢之路今昔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學者，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交誼廳，席開七桌舉辦歡迎晚宴，大陸學者對能到台灣參與學術研討會表示內心的欣喜與雀躍，楊理事長也重申歡迎之意，賓主盡歡後晚宴正式結束。



楊理事長歡迎晚宴致詞



郝時遠學部委員歡迎晚宴致詞



楊理事長、阿不都拉先生、郝時遠先生

邢廣程先生、永樂多斯教授



許建英、巫達、丁明俊、邢廣程、劉學銚

郝時遠、林群傑、娥舟文茂、馬普東



林昶光、熊映美、高月、張華克

孫伯君、胡進杉、黃燕萍、秦偉騰



趙竹成、許建英、劉學銚、周競紅

巫達、周健、賴惠玲

## 四月二十二、三日（星期六、日）

四月二十二日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時間	內容
09：00- 09：20	報到
09：20- 10：00	【開幕式致詞】 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 楊克誠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郝時遠
10：00- 10：30	茶歇（合影）
10：30- 12：00	【第一場次】主持人：楊開煌教授 報告人：楊克誠理事長 題目：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聯結-與東埔寨發展為例 報告人：郝時遠學部委員 題目：清代臺灣文獻中的水沙連茶
12：00- 14：00	午膳
14：00- 17：00	【第二場次】主持人：劉學銚教授 發表人：邢廣程所長 題目：“一帶一路”與中國邊疆穩定與發展 與談人：楊開煌教授 發表人：丁明俊研究員 題目：明朝與陸上絲綢之路沿線穆斯林貢貿 關係探析 與談人：趙竹成教授 發表人：高月研究員 題目：絲綢之路與邊疆治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綏新公路 與談人：陳又新副教授 發表人：孫伯君研究員 題目：西夏時期（1038-1227）河西走廊的 宗教與文化 與談人：張慧端副教授

## 議程

四月二十三日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09：00- 12：00	【第三場次】主持人：邢廣程所長	
	發表人：秦偉騰博士生 題目：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對中亞五國的影響	與談人：陳建 樾研究員
	發表人：周競紅研究員 題目：寧夏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構想及行動研究	與談人：藍美 華副教授
	發表人：陳建樾研究員 題目：民族旅遊還是異族觀光	與談人：李信 成教授
	發表人：劉冬梅教授 題目：跨文化交流中的唐卡、文化表徵與身份認 同一西藏昌都嘎瑪鄉唐卡畫師社群的社會交往互動 過程	與談人：蕭金 松教授
	發表人：孫宏年研究員 題目：“一帶一路”背景下西南地區沿邊開放芻議	與談人：楊維 真教授
12：00- 14：00	午膳	
14：00- 16：30	【第四場次】主持人：楊維真教授	
	發表人：賀元秀教授 題目：論絲綢之路上的清代錫伯營	與談人：張華 克副教授
	發表人：巫達教授 題目：古西南絲綢之路沿線族群互動與融合	與談人：戈思 明副教授
	發表人：劉清濤研究員 題目：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古羅國-基於中 文史料的探查	與談人：周健 副教授
	發表人：許建英研究員 題目：清代以來維吾爾族華人華僑形成的歷史考察	與談人：袁公 瑜副教授
16：30- 17：00	閉幕式會議總結（張華克副教授）	主持人：劉學 銚教授

## 二、兩岸參會學者

依照籌委會之規劃，原邀請大陸學者十八人與會，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法學部所邀請之新疆考古所退休所長伊弟利斯·阿不都熱蘇勒與浙江師範學院吐爾文江

• 吐爾遜副教授，因其他因素之故所以無法赴台與會，本協會曾三度邀請伊弟利斯所長來台，從未如願，經臆測或許可能因其為維吾爾族身份較為敏感，所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有多方面顧忌吧！吐爾文江副教授也應是相同原故。另中國邊政協會所邀請劉志揚教授、王川院長與劉波教授伉儷等三位學者，也因在進修或學校申請規定時程而無法參會，頓時少了 5 位成員，人數雖減少但若將參會學者論文發表時間拉長或許可收意外之效果，畢竟這些學者均是大陸學術界中佼佼者，能聆聽其大作也是台灣學者與聽眾之福。

### (一)大陸參會學者

編號	姓名	現任職單位（包括官方暨民間）	職稱
01	郝時遠	中國社會科學院	學部委員
02	陳建樾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副主任
03	邢廣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所長
04	孫宏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研究員
05	高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副研究員
06	劉冬梅	雲南民族大學	副教授
07	巫達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教授
08	孫伯君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研究員
09	丁明俊	北方民族大學回族研究院	院長
10	周競紅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研究員
11	許建英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研究員
12	賀元秀	新疆師範學院	教授

編號	姓 名	現 任 職 單 位 (包括官方暨民間)	職稱
13	劉清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編輯

## (二) 台灣參會學者

編號	姓 名	現 任 職 單 位	職稱
01	楊克誠	中國邊政協會	理事長
02	阿不都拉	中國邊政協會	榮譽理事長
03	楊開煌	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學會	理事長
04	蕭金松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所長
05	楊維真	中正大學歷史系	系主任
06	趙竹成	政治大學	教授
07	藍美華	政治大學	副教授
08	戈思明	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	組長
09	李信成	馬偕醫護專校	教授
10	羅中展	中華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11	永樂多斯	馬來西亞大學比較文學	教授
12	劉學跳	中國邊政協會	秘書長
13	張華克	中國邊政協會	常務監事
14	張慧端	政治大學	副教授
15	袁公瑜	中國邊政協會	理事
16	陳又新	中國文化大學	副教授
17	娥舟文茂	蒙藏委員會藏事處	處長

編號	姓 名	現 任 職 單 位	職稱
18	邊裕淵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名譽教授
19	林遜鵬	中國邊政協會	副秘書長
20	胡進杉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副處長
21	鍾啟賓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	副研究員
22	清水裕美子	淡江大學日文系	助理教授
23	徐佩伶	淡江大學日文系	助理教授
24	葉放宏	興訊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25	杜正雄	台北市立大學	博士候選人
26	吳儀	中華戰略學會	顧問
27	邱錦添	台北國際法律事務所	所長
28	林家鴻	桂莊中山文化基金研究會	執行長
29	開放報名參加		

由於本次學術研討會經劉學銚秘書長友人協助，於聯合報聯合報刊登相關訊息，意外的在會議期間，有數十位社會大眾與會，二天會議合計超過 150 人次與會，座無虛席並維持至會議結束。在 21 日當天有上百位社會大眾透過電話及電子信箱報名，由於之前因會議場地規劃，會議室僅能容納近六十人，所以只能婉拒，但仍有民眾熱情參與席地而坐聆聽，著實令人感動，細究其原因「絲綢之路」主題乃現今之顯學，又可重溫古代中國民族之強大氛圍，據文教會館工作人員轉述有幾位是職業聽眾，但不減研討會之盛況。

2017年4月22日 10:31  
 2017丝绸之路今昔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举行  
 新华社电稿 2017年4月22日 10:31

新华社台北4月22日电 (记者李殿南章利新)由台湾“中国边政协会”主办、中国社科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协办的2017丝绸之路今昔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举行。来自两岸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的20多位学者参会。

台湾“中国边政协会”理事长杨亮诚在致辞时表示，协会与中国社科院合办学术研讨会有来已久，此次选定丝绸之路今昔与展望作为主题，希望通过研究成果为两岸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贡献智慧。“一带一路”倡议规模宏伟，包容性强，它的推进必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版图重构。台商应把握商机，寻找两岸携手共同投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郝时远在会上作了题为《清代台湾文献中的水沙连茶考——兼谈同治年间台湾乌龙茶外销情况》的学术报告。他通过细致的考证揭示出17至19世纪两岸茶叶交流的真实面貌。产于台湾南投日月潭附近的野生“水沙连茶”因其“味清冽、解暑毒、消腹胀”的功效而享有盛名，清代两岸两地官员奏折、医药书籍和诗词著作中经常提及。更于清朝乾隆年间传入大陆，深受民众欢迎。这一史实充分说明早在数百年前，两岸茶文化交流已十分深入，两岸民众的生活也已彼此联系，互相影响。

会上，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北方民族大学国际学院院长王明俊、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月、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孙伯君分别就“一带一路”与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明朝与丝绸之路沿线穆斯林朝贡贸易关系、20世纪30年代的绥远公路与边疆治理、西藏时期河西走廊的宗教与文化等主题作了学术报告。

研讨为期2天，将于23日闭幕。

106.04.22 新華社報導

## 四、與會學者合影

聯合報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A9

## 「絲綢之路」研討會 周末在台北

【台北訊】四月廿二至廿三日中國邊政協會與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法學部合作，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卅號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舉辦「絲綢之路今昔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希望能促進兩岸對邊疆少數民族學術研究。

中國邊政協會邀請大陸社會科學院學者專家來台舉行「一帶一路」學術研討會，此次共有十三名大陸著名且具民族性學者參會，涵蓋漢、蒙、藏、維吾爾、滿族等。大陸由社科院學部委員郝時遠領團，台灣方面將由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楊克誠，著名學者楊開煌、楊維真、劉學銚、趙竹成等研究邊疆民族學術專家共同與會討論。研討會開放大眾參加，可先洽聯絡人：林遙鵬副秘書長 0928083610，philip@unet.net.tw

106.04.21 聯合報 A9 版



後排左起：巫達、高月、劉冬梅、孫伯君、周競紅、游麗卿、王慶峯

中排左起：劉清濤、廣定遠、馬普東、張華克、孫宏年、許建英、陳建樾、林遙鵬

前排左起：吳卷卷、劉學銚、邢廣程、楊克誠、郝時遠、邊裕淵、楊開煌、丁明俊

## 五、會議剪影



楊克誠理事長致詞



郝時遠學部委員致詞



研討會會議主持人林遙鵬副秘書長



第一場次主持人楊開煌教授



楊克誠理事長發表論文



郝時遠學部委員發表論文



會議盛況（一）



會議盛況（二）

誠如張華克副教授於會議總結報告所言：「經過兩天、四個場次的密集學術研討會議，除了有 150 人次中、外熱心聽眾與會研討之外，兩岸學者專家親自向台灣的學術界，發表了自己的心血結晶，是極為難得的學術交流機會。」

相信這些建言與十五篇論文共約十七萬字的論文集，能對海峽兩岸的執政當局，提供「絲綢之路今昔與展望」的重要參考依據。期待中國邊政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法學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研究所等單位基於這次愉快的合作經驗，將有助於持續舉辦類似會議，使兩岸的邊疆少數民族學術研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經過兩天的充分發言與溝通後，整個學術研討會的會議部分正式結束，會中也獲得許多寶貴的意見，秘書處將在學者發表論文時加酌與談人的意見做適當的修改後，將出版論文集；明天將展開三天學術田野調查研究之旅。

####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07:20 一行 17 人在張振成導遊的安排下，搭乘 408 車次(普悠瑪)前往台東，沿途豔陽高照、風光明媚，看到不遠處海象總算放下一顆懸久之心，明天蘭嶼調研交通船航班應無問題，火車一過初鹿站，台東大學的林清財教授來電關心車程，其已在台東火車站恭候郝團長一行許久，林老師非原住民，但以專業知識及研究領域已獲聘原住民委員會委員有八年之

久。

11：40 火車緩緩駛進台東火車站，甫出車站看到一位熱情花甲之人趨前，莫非是此人林教授，電話聯絡數十次第一次見面，幾句寒暄中宛如熟識已久老朋友，我想端賴林教授的熱情與隨和；中午安排在米巴奈山地美食坊享用原住民料理，席間有台東大學梁忠銘校長作陪，中午一餐足足喝了 3 公升的金門高粱。

14：00 前往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由林志興代理館長親自導覽，參觀台灣史前遺跡與卑南下賓朗特展。博物館分常設展與特展，常設展的核心理念是以寬廣的眼光，闡釋人類、自然與文化三者間的互動關係：彰顯大自然的奧妙，使參觀者體認人類與自然環境互相依存的關係，並融入愛護自然的觀念；闡釋生態環境與文化適應，呈現在不同地理環境中，因其環境適應而產生不同的文化；瞭解繽紛多彩的文化，培養出尊重與欣賞各族群文化傳統的觀念。依據此核心理念，規畫出三大主題：臺灣自然史、臺灣史前史、臺灣南島民族；後再增設人類的演化、科學的考古學。此期特展之一即是卑南下賓朗特展，展現出卑南部落深層的文化內涵，主要是卑南部落族人的歷史為主軸，呈現出卑南族人如何在生活中不斷延續傳統，如何在各式祭典中連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特展中下賓朗部落族人詮釋自己的文化，展出部落文物、舊照片及花環文化。

16：00 抵達卑南下賓廊社區，卑南民族議會主席孫大山先生（監察院孫大川副院長胞兄）與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親自迎接，並由族裡較年長女性親自為每一位貴賓戴上卑南族之表徵…花所編織之花圈（卑南族是台灣原住民中最愛花的民族），以示表達歡迎尊敬的貴賓之意，接者小武總幹事為我們簡報下賓朗社區發展總體營造成果，在過程中所保留之特色文化與所遭遇之困難，簡報中提及前幾年至大陸河南省台灣原住民村的尋親活動過程中所交織互動成果，並期待往後更擴大交流人數與項目，共同為原住民文化的保存多做些努力；太陽漸西下，尤其台東是台灣的最東邊，最早見到太陽的起落（林清財教授開玩笑的說「太陽我們先用，用剩的再給你們用（台灣西部看到太陽的時間足足比台東晚了 8 分鐘」），接著我們一行參觀卑南族的男子聚會所（巴拉冠）<sup>1</sup>，孫主席特別提醒男人可以

<sup>1</sup> 所謂的「男子聚會所」卑南語稱 Balaguan（巴拉冠）（編按：另有其他拼法為

進去女人請止步，這個地方是族裡男人聚會所，對女人來說是絕對的禁地。

18：30 孫主席在中山路三葉精緻餐廳宴請本次參訪團，梁校長帶領 5 位同事、孫主席邀請 6 位族裡耆老，席間與會者載歌載舞，歌曲有蒙古語、卑南語（古調）、華語、台語、閩南語，舞蹈有迎賓舞，戰舞，最重要的是邀酒舞（酒杯一空隨即倒上，吆喝再來一杯），廈門大學董建輝教授第一個馬拉桑（醉倒）<sup>2</sup>，接者陳建樾老師，再來我已看不清，依稀記得入住中興路娜魯彎會館，剩下的交給周公處理了。



史前博物館展出遺址挖掘古物（一）



史前博物館展出遺址挖掘古物（二）

Palakuan），是指部落設立的一座大型建築物，供成年未婚、鳏、孤、獨的男子，或賓客住宿使用。傳統卑南族的社會是女尊男卑的，家庭組成是以「夫從妻居」的小家庭形式，成員最多是祖父母、夫妻，小孩的三代同居為基礎。男子年滿 12 歲（各部落不同，12 歲大致是最低年齡）便得拜任教父，並住進「巴拉冠」與部落單身男子共同生活與學習，成為部落的公共財產，直至某一個女子看上眼討回家當丈夫，便可離開「巴拉冠」享受正常家庭生活。這個男子的家庭義務是提供勞力，協助妻子生育、養家糊口，不具財產處分權，子女教育權也在妻子。當妻子覺得男子對不起她而決定休了他；或者妻子死了，孩子也成年了，除非由另一女子「娶」回家，否則男子必須回到「巴拉冠」終老，僅由家人提供日常餐食。巴拉冠的設計有其實際解決社會需求的功能與考量：一、維持了小家庭小房舍只有一個成熟男子的狀態，避免青春期男女共處的尷尬。二、成年單身男子聚集，在訓誡、訓練與禁忌規範下，巴拉冠提供戰時防衛與日常差勤所需，促使部落夜不閉戶、環境維護、獨居老人照護、互助合作的大同社會。三、提供夫妻吵架時的臨時住宿所，與孤苦鳏居的收容所。為女權至上的卑南族社會提供男子尊嚴的最後防線，減少家庭紛爭與治安問題。

<sup>2</sup> 馬拉桑”(MaLaSun)是臺灣原住民阿美族話，意思是喝酒醉、喝高了的意思。



史前博物館展出先民工作示意圖（一）



史前博物館展出先民工作示意圖（二）

###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07：30 飯店叫早簡單用早餐後，前往富岡碼頭搭乘金星五號交通船前往蘭嶼，海上雖風和日麗，但也難免有些風浪，陸續有老師因不耐船身搖擺，開始出現暈船嘔吐，出發前已先做了防範措施，卻不管用，只能請老師坐下一層船艙，無緣欣賞美麗海景，航程歷經三小時，開元港已在眼前，霎時飛魚亂竄，大家驚呼連連，這小小魚身展翅後竟能如鳥般飛躍以禦敵，據記載最遠可達 400 餘米。

12：00 热情的鳳鳴灣民宿老闆小謝（謝振忠，世居達悟族人），偕其花蓮阿美族妻子開了二輛九人座車子來接我們，距離開元港五分鐘車程的落腳地簡單安頓後步行前往開元海鮮小吃店用餐，簡單的店面內也只能容下三張圓桌，不愧是海島，海菜、海瓜子、海香菇、飛魚全都上桌，蘭嶼鄉共有六個部落，椰油、漁人、朗島、東清、野銀與紅頭部落。

14：00 貼心的導遊小張幫我們安排蘭嶼生態旅遊教育推廣中心的老師蘇瑞清先生導覽全島人文風貌，蘇老師是本地人又為文史工作者，自然對蘭嶼有者不同一般解說員的深厚情感及文化與歷史體認，今天下午的環島行就有勞蘇老師了，沿著環島公路向東行（達悟族人認為西邊是往生者去的，在世人不應往西），第一站來到開元港上方，蘇老師簡介蘭嶼歷史、文化、達悟族史、小天池及蘭嶼著名的燈塔，此刻，映入眼簾的是島上或邊緣各種不同姿態的岩石，紅頭岩、鱷魚岩、坦克岩，在我們這一團初次踏上台灣最東邊蘭嶼鄉而言，實在看不出奧妙之處，蘇老師說：「看

風景的訣竅是，三分看像，七分靠想像」頓時我眼中的自由女神像都出現了；接者到達五孔洞，這些洞群原是在海平面下，經過海浪渦漩不斷的衝擊、拍打、洗刷形成了孔洞，又經過地表每年的擠壓上升，這五個原本藏於海裡的天然岩洞出世見人，並成為蘭嶼住民朝聖祈福場所之一，一行人跟隨蘇老師魚貫進出，第一次見到原生種的蘭嶼秋海棠。一路上看到雙獅岩、軍艦岩、鋼盔岩、睡獅岩、象鼻岩、蘭嶼捕捉飛魚具獨特性拼板舟，如此多艘停靠一起還是第一次親眼目睹，以往只能在報章雜誌上看到，自然是要拍照留念，蘇老師再三提醒大家不要上船以免破壞船體結構及搖槳；車行 3 分鐘來到政府的罪惡之手，蘭嶼核廢料貯藏所，經年不斷的有蘭嶼居民抗爭，爭取將貯藏所遷出，惟政府在未能找到合宜地點之前，僅能不再增加核廢料的儲存數量，而蘭嶼人也將世世代代保護者他們的世居地直到永遠。

1800 到了蘭嶼鄉公所，這一星期蘭嶼舉辦鄉運會，鄉運會是蘭嶼飛魚季外的另一重要大事，全鄉上下除聯繫鄉情外，也要檢驗國家未來主人翁的成長歷程。鄉公所大部分承辦人員外幾乎全體動員參與，致使我們一行的拜會活動稍有受挫，不過還是完成我們原先安排及入出國移民署所報備的行程，感謝民政課吳小姐協助，一行在鄉公所前合影留念，結束了今天的行程活動。

2300 民宿老闆抓回一大袋飛魚，除了今天中午遠眺飛魚英姿外，也嚐到於本身帶勁的肉質，現終能仔細近看，出於好奇將魚之雙翅展開，足足有 30 餘公分，完美的瘦長魚身，有如噴射機機身比例，再加上魚尾強而有力擺動，難怪能躍出水面飛行禦敵，又抓一 3 尺餘的鬼頭刀保存於冰箱，上天真是待蘭嶼不薄，如此豐富的海產，才能在這資源貧瘠小島上養活數百代世居達悟族人。



豬八戒照鏡子



捕魚工具特色拼板舟



原生種秋海棠



蘭嶼鄉公所前合影



飛魚展翅



蘭嶼核廢料貯藏所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0930 來到蘭嶼特色之一地下屋保存最完整的野銀部落（當然有四、

五十年代的誓死抗爭，才有今天的完整呈現），雅美族傳統地下屋，與自然共生、採用特殊工法的建造過程，與蘭嶼人的文化、精神環環相扣。導覽解說員施美玲，為我們解說之地下屋正是他家，有近二百二十餘年的歷史。

傳統地下屋是為抵擋強勁的東北季風吹襲，需具良好的排水性，它有三個構造，可分為主屋、前方工作坊及涼亭所組成，主屋分為三層，主屋裡面有客廳、主臥房、廚房及煙燻魚乾的地方，還有產房，廚房必須於依照看到陽光時右手邊，屋裡吊滿為數眾多的山羊角及魚體標本（藉由呈現的戰利品，可顯現出難主人的英勇），由於燻魚的緣故日積月累下來屋內已成咖啡黑，燻的作用又可收驅蟲防腐之效，但仍要做適時的更換主屋主體結構及屋頂。而蘭嶼獨有的地下屋建築，目前僅剩家屋數不多，實際可用的地下屋建築更少。

導覽員施小姐提到：「達悟族人一生中可以改四次名字，所有改名均以子孫為主為依歸，因為他們的命名習慣是「從子名」制，也就是隨著子女的出生而改變自己的名字，達悟族人當他長子（女）出生又命名好了，他自己的名字就消失，改為長子（女）的名字前面（父親）再加夏曼（siaman）（母親）再加夏南（sianan）。舉例說，當他長子（女）出生後命名為吉門（gimen），父親名字就變成夏曼・吉門，母親名字變成夏南・吉門。如果長子（女）過世，父母親的名字再改為次子（女）名字前面再加夏曼或夏南。如果子女都死亡，他又恢復原來的名字。換句話說，夏曼、夏南不是名字，是表示爸爸或媽媽的意思，就像夏曼・吉門是吉門的爸爸之意思。達悟族人的命名自古以來就是這種方式，日治時代也沒有改變過。直到 1945 年國民政府光復台灣後，依政府體制方便管理，必須使用漢字姓名，所以現在的達悟人戶籍登記是漢字姓名，但習慣上仍然使用傳統名字（他們沒有姓氏）。所以說，達悟族人如果問他們的阿公（嬪）的中文姓名，大概有 8 成不知道，如果問他們阿公（嬪）的傳統名字，他們卻全都知道。

1300 坐船離開蘭嶼，完成了蘭嶼達悟族調研，由於昨日經驗，今天中午不用午餐，避免途中因顛簸造成嘔吐，船途中還好，停駐綠島載客出海後海象惡劣，風浪過大船身劇烈搖晃，大家走起路來跌跌撞撞，為避免

危險小張導遊請所有成員非必要不要隨意走動，所幸十餘分鐘後狀況改善，一路平安抵達富岡漁港。

1750 先行用過晚餐（很有名的鐵路便當），順利上車並於 2120 抵達台北，曾任立法院參事林群傑先生，於復興南路小李子清粥小菜準備宵夜，一行人直趨設宴處，大家享用這清淡又美味的餐點搭配東引高粱，不是那樣的對味，但大家仍能盡興，今晚又是下榻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雅美族傳統地下屋（一）



雅美族傳統地下屋（二）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0900 天底下哪有不散的筵席，車輛已備妥一行人檢查行李，準備至桃園國際機場搭乘 CA186 回北京，0730 賀元秀教授先行至機場，準備展開另外一段七千公里的航程；整個活動已近尾聲，我仍然送郝時遠學部委員一行至入關處，期待與各位老師下次見（說不定六月份可以在台灣再見到幾位老師）。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諺語出自心中，花草生在山中。（蒙古族）

井水裏沒有魚蝦，諺語裏沒有假話。（蒙古族）

人有禮貌好，狗有尾巴好。（蒙古族）

花枝子在土壤中長，好日子從勞動中來。（蒙古族）

話無諺語難說，水無茶葉難喝。（藏族）

羊毛越撕越鬆散，諺語越傳越精煉。（藏族）

驕傲與失敗相隨，虛心與進步交友。（藏族）

小溪聲喧嘩，大海寂無聲，稍具學識輒高傲，大智大賢反謙虛。（藏族）

好言相對，是做人的根基；惡言相傷，是當鬼的開始。（藏族）

最乾淨的水是泉水，最精煉的話是諺語。（哈薩克族）

鹽能給菜提味，諺語能使語言優美。（哈薩克族）

不要對陌生人說東道西，不要對自家人虛情假意。（哈薩克族）

好漢不食言，好馬不擇鞍。（回族）

禮多人不怪，話多人不愛。（回族）

嘴快惹是非，褲長沾露水。（回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廿五）—

## —白族食品「瓦罐雞」

華 華

### 壹、前言

白族，古來自稱「白子」或「白尼」。居於雲南省大理、昆明等地及湖南桑植縣等地。白族總人口數在 1982 年調查時為 1,214,581 人，大多分佈在雲南省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帶。宋朝（960—1279 年）時期，白族在雲南曾經建立過大理國。<sup>1</sup>大理國的文化繼承和發展了唐代的南詔文化，南詔文化主要源於晉南北朝的爨文化，<sup>2</sup>爨文化則繼承著滇文化，滇文化則是受到周秦時期楚、蜀文化的影響。因此，在現代白語中還保存有許多唐以前古漢語的語音和詞匯。<sup>3</sup>例如父、母、兄、姐等稱謂，都有其歷史語言學上的淵源：

父親(父)：白語大理方言稱 a31ti33，《廣韻》徒可切。

《廣雅·釋親》：“爹，父也。”…母親(母)：白語稱 a31mo44。塗良軍博士認為，雲南漢語方言中，農村普遍稱母親為“嫫”或“阿嫫”，“這個詞與漢語其他方言應是來自藏緬語的底層詞，它與漢語的‘媽’、‘母’同源但不是同一個詞。”…兄：白語大理、劍川方言稱兄為 a31ko44。從發音上看，ko44，“與漢語的‘哥’較為接近。哥，《廣韻》古俄切，平聲，歌韻，見母。上古音屬歌部。其意之一為對同父母或同族

<sup>1</sup> 大理國盛產一種特殊的石頭，就是現代建築中相當常見的大理石。大理石是一種重結晶形成的變質石灰岩，除了有高雅的白色，可製作雕像之外，還有各種其他顏色與花紋變化，是一種常用於公共場合的建築及裝飾材料。

<sup>2</sup> 爨音ㄔㄨㄞ（竈），炊也。爨為中國古代邊疆民族之一，分布於今雲南省東部地區。

<sup>3</sup> 《白族簡史》編寫組，《白族簡史》，（昆明市：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 1 版），頁 2。

同輩而年齡比自己大的男子的稱呼。《廣韻·歌韻》：“哥，今呼為兄也。”…姐：白語大理方言 a31tci33(鶴慶 a55tci33)，古漢語中稱姐為姊，白語 tci33 應源於此。姊，《廣韻》將幾切，上聲，旨韻，精母。上古音屬脂部。《說文》：“姊，女兄也。”<sup>4</sup>

白族的精神信仰很豐富，普遍崇拜本主。眾多本主神祇外觀與漢人的道教神像十分相似，<sup>5</sup>可以概括為兩大類：一類是神靈本主，包括以原始宗教神靈為基礎形成的本主和佛教與道教神祇本主。原始宗教神靈成為本主的有：太陽神本主、天鬼本主、山本主、地母本主等。佛教與道教神祇本主則如：大黑天神、觀世音、北方天王、文昌君、關羽、李靖、二郎神等。

另一類是凡人本主，即歷史上的凡人，含傳說中的人物、帝王將相及祖先本主等，如：龍佑那、張仁果、張樂進求、細奴邏、閣羅鳳、趙善政、段思平、段平章，以及民間傳說中開天辟地的白族始祖勞谷和勞泰等。

從一般本主廟供奉神像的複雜性可以看出，本主崇拜是以本主為中心的多神崇拜。任何本主廟都以本主為主要崇拜對象，其他配神則為次要崇拜對象。各種配神有其專有的宗教功能，例如子孫娘娘可以讓人得到子嗣，財神負責讓信眾發財致富，山神和土地經辦萬物生長，五穀神王管理糧食收成，六畜神王促進六畜興旺，六部判官管轄人間善惡，祛病之神有痘二哥哥和痧麻二位，司理出水痘、出痧子等疾病控制，十殿十王掌管人死之後的歸宿等等。配神的神力是對本主神力有補充之效，兩者神力結合，可滿足人們對物質與精神生活兩方面的慾望。<sup>6</sup>

白族人對食的需求、口味，跟雲南許多民族的風味相同，都是愛吃酸、冷、辣等。關於辣，俗語說：「貴州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怕，湖南

<sup>4</sup> 楊文輝著，《白語與白族歷史文化研究》，（昆明市：雲南大學出版社，2009，第1版），頁88-91。

<sup>5</sup> 神祇音ㄓˇ（只）。

<sup>6</sup> 董建中著，《白族本主崇拜：銀蒼玉洱間的神奇信仰》，（成都市：四川文藝出版社，2007，修訂版），頁21、32。

人怕不辣。」西南地區百姓嗜辣是一種普遍現象。不過以上這份名單裡面，並沒有雲南。可知雲南地區所吃辣的程度，實在不如令人印象深刻的貴州、四川、湖南三地。至於原因，可能是雲南一帶，民族相當複雜，大家對於辣度的要求，又不一致，所以把辣度調整得比較低了一些。通常白族人喜歡的食品口味、種類有如下特點：

白族人民喜吃酸、冷、辣等口味，並善於醃製火腿、弓魚、螺絲醬、油雞棕、豬肝酢等各種味美可口的菜肴。白族人民喜喝烤茶。烤茶時，用一陶製小茶罐將茶葉烤黃，沖以沸水，頓時熱氣翻騰，芳香四溢。有客來家，必燒烤茶招待，每次只斟淺淺半杯，飲後口角留香，熱渴頓解。大理等中心地區的白族人民，還喜吃一種別具風味的“生肉”（或稱“生皮”），即將豬烤成半生半熟，再切成肉塊或肉絲，佐以薑、蔥、醋、辣椒，以宴請客人。此外，還有用糯米釀製的白酒，用蒼山雪燉梅和糖製成的“雪梅”，也都十分可口。

這裡提到了白族人常喝的烤茶。烤茶是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帶相當普遍的一種飲茶方法，據說多飲之後，可收清心、明目、利尿、去寒的功效。要飲烤茶，得先將特製的小土陶罐，放在火塘邊過火，把陶罐烤熱後，再放入茶葉。然後連續抖動小陶罐，讓茶葉在罐內翻滾、膨脹、變黃，等到茶香溢出時，再將沸水少許沖入陶罐內，這時水、茶會發出吡吡聲，頗有戲劇效果。等茶水表面蒸氣泡沫略散之後，茶葉的味道已經溶出，再加進開水，使其再次沸騰，即可倒出飲用。

烤茶的茶具之中必然包括一個耐火的陶製小茶罐。這個特點，也沿用到一般的食品之中。白族喜歡用較大的瓦罐燉雞，稱之為「瓦罐雞」，是一道民族美食，很值得介紹。這裡就簡單來說明一下白族「瓦罐雞」美食是如何製作的。

## 貳、白族食品「瓦罐雞」

「瓦罐雞」的材料很簡單，只需準備一個帶碗瓦罐、粗糠一堆、純種的土雞一隻、中藥材少許等即可。

首先，將純種的土雞一隻去毛洗淨，腹內再加些中藥材，如蟲草、薏

仁、枸杞、天麻、松茸、人參、大棗、當歸等，適量放入，視各人口味而定。認真的白族婦女會以針線將土雞腹部縫起，以保持湯汁清純。

接著是用一個瓦罐，納入整隻土雞，加些水，外面蓋上一個碗，蓋住罐口。這時再以一團濕泥，密封碗邊，可免灰渣滲入。有些人會採用揉好的麵團，仔細封罐，效果跟濕泥差不多。

再來就要讓粗穀糠點火燃燒，形成一個火堆。粗穀糠，是碾米時碾出來的粗糠，白族常用來餵雞，算是一種飼料。現在又拿來煮雞，真有點像是曹植七步詩所說的情境：「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火堆形成之前，得先將粗穀糠堆成一堆，並把那個瓦罐埋入這個穀糠堆中，點上火，讓穀糠慢慢燃燒起來。接著靜候十二小時，一般從傍晚煮起，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吃，真費功夫呢。熬好的時候，火堆的火也熄了。瓦罐出土時，還帶著一絲溫熱。打開封泥的時候，通常馬上會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濃香味飄出，讓人難以抗拒其誘惑，非得立即嘗上一口不可。因為補品的藥效與土雞的肉香，都在這十二小時裡，不知不覺慢慢熬煮出來了，而且巧妙的結合在一起。這種火侯與火候，<sup>7</sup>可不是那種「百元快炒」店裡，只花三分鐘就能做得出來的。

### 參、結語

2013年8月初，藉著參加「海峽兩岸生態文明建設與民族發展學術研討會」，去了一趟雲南省迪慶州香格里拉縣。當時與會的人士，全由雲南民族大學的研究助理白族姑娘蘇麗負責接待。8月4日晚間大會端出犛牛火鍋宴，除了犛牛肉外，還有白族瓦罐雞、生食猴頭菇等名菜，紛紛上場，讓人食指大動。不過台灣學者熊映美女士忽然有了高山反應，頭暈目眩，食慾全消。幸得蘇麗助理在餐桌隔壁休息室中施以白族推拿，才得消解症狀。後來整場宴會雖只喝了一小碗白粥，反覺得那是天下第一美味。<sup>8</sup>這件事說明了，所謂好吃與不好吃的分野，常與個人的文化背景、

<sup>7</sup> 火侯：係指燃燒溫度的高低而言。火候：是指燃燒時間的長短之說。

<sup>8</sup> 張華克，〈海峽兩岸生態文明建設與民族發展學術研討會側記〉，《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民102[2013]9月，195期），頁94-95。

身體狀況、飲食環境等因素有關，並非絕對。否則很難解釋，「白族瓦罐雞」何以會被一小碗白粥打敗。

今年四月間，雲南民族大學唐卡藝術專家劉冬梅教授來台演講，閒談中偶爾提到了蘇麗，說她已經嫁人生子，當媽媽了，讓人感到短短四年間，人事變化也真大。蘇麗人如其名，秀外慧中，貌似《唐伯虎點秋香》電影裡的女星鞏俐。但是不會像電影裡的秋香那麼冷若冰霜，拒人於千里之外。她待人和氣，熱心服務，無怨無悔，曾獲得當年與會者一致讚賞，堪稱白族之光。

因此，有詩為證。

詩云：「雲貴高原瓦罐香，漢家巾幘鬧缺氧，白族俠女施推拿，清粥情濃勝雞湯。」

##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  
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  
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  
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銚。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